

昭和危机与经济政策

专题史

[日] 中村隆英

著

王揆

译

負典編譯

UN-CANON



昭和危机与经济政策

中村隆英 著

本书译自：中村隆英《昭和危机与经济政策》（「昭和恐慌と經濟政策」，講談社學術文庫，講談社，1994 年第 1 刷；底本为 2020 年第 18 刷）；原版题《经济政策的命运》（「經濟政策の運命」，日本經濟新聞社，1967 年）。

本书由西方負典編譯組（translate@un-canon.com）翻译并整理；书中脚注均系编者所加，注末署“——编注”。

目 录

学术文库版序 / viii

序章 / 1

经济·历史·人 / 1

何谓经济政策 / 4

政策转换之难 / 7

第一章 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开端 / 9

1 金本位意味着什么 / 9

出乎预料的井上藏相就任 / 9

金本位制度的机制 / 9

国际金本位制的功能与本质 / 11

对金本位的信仰招来了悲剧 / 13

2 日本的金本位制 / 14

在出超之中脱离金本位 / 14

对华政策妨碍解禁 / 15

大危机使经济上也陷于困难 / 16

3 海外恢复金本位 / 18

热那亚会议重建金本位制 / 18

恢复金本位与平价下调 / 19

成为潜流的“回归正常” / 19

4 解禁是耶非耶 / 20

三足鼎立的解禁论争 / 20

忠实于教科书的按旧平价解禁论 / 21

维护产业利益与解禁反对论 / 22

宪政会内阁的解禁准备 / 24

倡导按新平价解禁的四人组 / 25

5 金融危机 / 26

紧缩政策下倒闭频出 / 26

银行与不良企业的孽缘 / 27

某小银行的内情 / 28

金融界的清理整顿与震灾票据处理 / 29

点燃危机的片冈藏相失言 / 31

围绕救济台湾银行的博弈 / 32

金融危机留下的伤痕 / 33

6 从田中内阁到滨口内阁 / 35

民间接连的解禁决议 / 35

政友会的微妙立场 / 36

第二章 解禁的实施 / 38

1 井上准之助 / 38

其为人 / 38

深井英五对井上的批评 / 39

作为政治家登场 / 41

押注立即解禁 / 43

2 解禁的准备 / 44

准备从削减预算着手 / 44

为解禁宣传的全国巡回演讲 / 45

3 解禁赞成论 / 46

财界主流的正统派意见 / 46

期待强化垄断的财阀 / 48

学界与新闻界的赞成 / 49

4 解禁反对论 / 50

转而反对解禁的武藤山治 / 50

实业界也因不景气的现状反对 / 51

表现出消极反对的深井英五 / 53

与财界人士感觉不相容的政治家判断 / 53

高桥是清的回想 / 54

5 解禁的实施 / 55

与解禁同时开始的黄金外流 / 55

半年即达预想两倍的流出额 / 56

6 大萧条 / 57

给“永远的繁荣”泼冷水 / 57

在全世界肆虐 / 58

第三章 大萧条下的日本 / 61

1 产业合理化 / 61

合理化的烽火来自美国 / 61

临时产业审议会的答复 / 62

相继结成的卡特尔 / 63

企业合并与裁员的浪潮 / 64

2 农村的穷困 / 66

跌价与增产的恶性循环 / 66

最大的受害者是养蚕农户 / 68

3 中小企业的危机 / 70

销路狭窄与融资匮乏 / 70

陷入危机的中小企业实例 / 71

中小企业对策以卡特尔为中心 / 73

4 失业的增大 / 75

知识阶层的失业是一大特征 / 75

劳动条件的削减与钟纺的罢工 / 76

5 政治动荡 / 78

伦敦条约与统帅权问题 / 78

抬头的右翼与滨口首相遇刺 / 80

被暗中掩盖的三月事件 / 82

第四章 危机迫近 / 84

1 井上的政策 / 84

激起波澜的井上财政演说 / 84

政友会抨击其过于乐观 / 85

呼吁紧缩财政 / 86

不顾反对削减官吏薪俸 / 88

强行推行的平衡预算案 / 89

2 财阀的动向 / 90

从一部连载小说看对财阀的攻击 / 90

财阀的说辞及其信念 / 91

财阀银行押注解禁的盘算	／ 93
右翼、军人与池田的立场	／ 95
3 德国的金融危机与英国脱离金本位	／ 96
超出预料的欧洲危机	／ 96
英国金本位制的崩溃	／ 97
4 满洲事变的爆发	／ 99
全面展开的军方阴谋	／ 99
政友会支持军方的强硬态度	／ 100
满洲事变爆发，形势骤变	／ 101
第五章 重新禁止黄金出口	／ 103
1 购买美元问题	／ 103
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各方同时引爆	／ 103
发展为道德问题，攻击财阀愈演愈烈	／ 105
2 陆军的压力与协力内阁运动	／ 107
安达内相的妥协使内阁动摇	／ 107
满洲事变的扩大与十月事件	／ 109
若槻首相的辞意与阁内动摇	／ 110
3 井上的抵抗	／ 111
强势抛售，迎战美元买盘	／ 111
政友会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决议	／ 113
深井英五的回忆	／ 115
4 第二次若槻内阁的垮台	／ 116
犬养内阁成立	／ 116
政变背后暗中活动的投机势力的图谋	／ 118
5 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与井上之死	／ 120
高桥出任藏相与深井的进言	／ 120
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	／ 122
高桥与井上的论战	／ 123
井上遭暗杀与高桥的追忆	／ 126
6 高桥财政的方向	／ 127
积极财政使景气恢复	／ 127
军部势力抬头与政党地位下降	／ 128
尾声	／ 129

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	／ 129
经济政策与政治环境	／ 134
政治家与政策的个性	／ 136
〔附论〕 历史视野中的平成萧条	／ 138
1 两次泡沫崩溃型萧条	／ 138
2 昭和危机	／ 141
3 平成萧条	／ 143
4 新的主导产业问题	／ 145
〈附记〉	／ 147
版本说明	／ 148

学术文库版序

曾经作为“日经新书”之一问世的小书，如今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得以重见天日，这对笔者而言是意想不到的喜悦。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是笔者在开始关注并回顾近代日本经济与经济政策之后，完成的第一项成体系的工作。井上准之助藏相主导的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政策，从起步到在昭和危机与大萧条的风暴中崩溃，对这一过程加以追踪，是笔者多年来的目标。另外，笔者还有一个抱负，即把经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作为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加以追踪，并以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为其素材。这一意图是否成功姑且不论，笔者对本书感情深厚，原因正在于此。

在那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以日本银行的《日本金融史资料 昭和编》为首，有关金融危机、解禁与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资料，已有许多可供利用。所幸的是，拿这些资料对照来看，本书似乎并没有犯下什么大的错误。而且，写作此书之时，笔者虽不成熟，却意气风发，正要闯进一个新的领域。为此，笔者在旧书店翻检搜寻史料，花费了数年时间，暑假里天天去闷热的研究室，才终于汇成一册。如今看来，缺陷自然显而易见，行文的生硬也让人不甚满意，但已无法找回当时那份专注执着的心情，若贸然改写，恐怕会弄得像水里掺油一样格格不入。笔者认为尽量保留旧著原貌才是上策，于是只订正了若干文字、加了些许补订，便就此交付再刊了。

不过，关于本书的书名与内容，有一点需要事先说明。初版的原题是《经济政策的命运》（日本经济新闻社），后来应出版社的要求，在第二次印刷时改为《昭和危机与经济政策》，并在序章中增写了与七十年代后半期经济相关的内容。此次复刊，为避免被误解为新著，书名沿用了当时改定的题名，但内容则决定恢复初版原样。因为笔者想保留当年写下本书时的意图。

在本书末尾，笔者把去年秋天所写的两篇小文汇总成《从历史中看平成萧条》一文，作为附论附在书末。随着平成萧条的持续，认为昭和危机会重演的人多了起来，但“历史不会以原样重演”，而且这次的萧条无论性质还是实际状况都与昭和危机完全不同，这一点却并未得到理解。因此，这篇文章指出了过去的萧条与平成萧条的相似之处和相异之处，并讨论了应当如何思考，才能从历史事实中汲取对今天的教训这一问题。

感谢学术文库出版部的铃木一守先生为旧著复刊付出的辛劳。

1994 年春分之日^①

中村隆英

① 原书以年号纪年。为便阅读，表具体年份时，全书正文与引文的纪年均已换算为公元。明治元年是 1868 年，大正元年是 1912 年，昭和元年是 1926 年，平成元年则是 1989 年。行文中的“我国”系作者口吻，指日本。——编注

序章

经济·历史·人

经济与历史的关联方式，从长期着眼时，与在短期的、具体的事件之中观察时，有相当大的不同。

政治、文化、思想等等，基本上由经济发展的程度与生产的结构所规定——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然而，从短期、微观来看，也必须承认，经济反过来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乃至登场人物的立场与性格的支配与影响。

尤其是政策的决定，容易受到政治压力与意识形态的支配。每年的生产者米价的决定，向哪个产业发放补贴、向哪个年龄层支付养老金，或者对何种所得免税等等，都可以说是恰当的例子。政治所决定的政策若违背经济的逻辑，终将失败，最终被放弃；但政策在短期内是可以无视经济的逻辑而被决定、执行的。它一旦失败，新的政策又会经由政治程序出现。

从短期的、微观的角度回顾政策决定的历程的人，将会注意到：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反复试错之上积累起来的。笔者在这里想要描绘的，其一就是这种试错的过程，也就是由政治、意识形态与人性相互纠缠而产生的经济政策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政策确实无法仅凭狭义的经济学来阐明。

本书的宗旨，在于多角度地描绘 1929 年至 1931 年财政金融政策的动态。不仅要追踪经济的实际状况与政策，笔者还想触及若干问题：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政治动态之中经济政策的地位、历史之中个人的作用等等。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经济过程，与战后增长及其转折的时代并列，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就日本而言，经济问题在政治过程中成为最大的争论焦点，是自昭和初年的这一时期开始的。1882 至 1884 年的松方通货紧缩，曾给农村以深刻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920 年的危机，带来了物价的全面暴跌与企业的破产，但它们都未曾作为政治焦点而表面化。

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井上准之助的大藏大臣，以及围绕他的政界、财界巨星们：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池田成彬、深井英五、高桥是清等人。其间展开的种种事件，是 1927 年春的金融危机、1929 年的解除黄金出口禁令、1931 年的满洲事变与重新禁止黄金出口、1932 年以后依靠公债的财政膨胀与景气恢复。而其背景，则是自二十年代延续下来、自 1929 年起加深了的长期化的世界萧条。

为了证明仅从经济的视角观察这一过程是不够的，试举二三例。如后文将详述的，引爆 1927 年金融危机的，是政友会与民政党之间的政权之争；围绕震灾票据的各项法案的审议，被选中作为倒阁的手段。尽管底层存在着以台湾银行为首的各银行经营上的不健全，以及与铃木商店等问题企业间剪不断的孽缘，根本性的整理迟早势在必行，但财界的脓疮偏偏在这一时点上溃流而出，恐怕正是出于政治时机的缘故。

又如井上准之助，直到 1929 年夏即将加入民政党之前，还说解禁是“让肺病患者跑马拉松”，但一入阁就转而主张立即实施，因而受到批判。井上当然必定也有自己的辩解，但那种批判确有事实与

之相符，无可否认。担任日本银行总裁时期的井上反而与政友会接近，倾力于“救济不良企业”，即便在野，也因致力于濒危企业的融资与重建而被称作“财界保姆”。而这位井上摇身一变成为财界整肃论者，在一片非难声中推行紧缩政策，试图维持金本位制度。此时井上的态度，可以有种种解释：既可说是站在自由经济立场上守护政策正统的信念的表露，也可说是政治权力意志的化身，又可说是超越逻辑与利害、一意孤行的姿态。

井上辞去藏相之位、继而于1932年2月倒在凶弹之下以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抄录明人夏桂州之语，供于灵前。

临危守节心无改

忍死捐生志不移

据说井上生前也很喜爱这句话，有时还写在题字方笺上赠人；它强调了井上作为有信念之人的一面。对井上而言，恐怕再无胜于此语的安魂曲了。

曾经提携井上的高桥是清，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井上的身影；而解禁政策的善后，再次落到了他的肩上。第四次出任藏相的高桥，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并敢于实行财政膨胀，以应对经济的危机。高桥一度成功了。他不像井上那样把信念与固执表露于外，而是以长久的经验与判断力处理事务。然而军部的预算要求逐年增强，试图与之抗争的高桥，也终于在二·二六事件中追随井上而去。

这些事件已有众多书籍讲述过。搜集资料并无困难。毋宁说，真实的情况是：采择其中哪些、又如何解释，才是问题所在。笔者的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多角度地复原这些过程。

何谓经济政策

在进入现实的过程之前，先就考察各项经济政策时的一般性问题，归纳陈述一己之见，或许较为方便。

第一，如人们常说的，决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政治家的工作，而非经济学家的工作。在战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无论是要防止物价上涨，还是为抵御外国资本的压迫而限制资本自由化，决定这类政策目标的都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遏制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日元升值、缓和对外经济管制等目标，情形也是如此。经济学家所能做的，只是把在那种目标之下采取某项政策时所引发的直接、间接的影响汇总并列示出来。

试想为抑制物价上涨，而姑且采取冻结大企业工资的政策，其效果如何。与不采取该政策的情形相比，物价上涨率或许会略有下降。但大企业的劳动者会为寻求更有利的职业而纷纷流出。结果，大企业的生产无法如愿提升，成本反而升高。这对于长期降低物价是否算是上策，还是存疑的。进一步说，大企业冻结工资也会抑制中小企业工资涨薪，进而连与制造业工资大致联动的米价也会被压低。然而国内的消费需求与个人储蓄的增加也会放缓，整体的增长将趋于迟缓。企业利润在冻结工资的当口，虽因成本下降而一时增加，但长期看需求趋于疲软，未必能够提高。——以上的议论是在经济逻辑的框架之内进行的。除此之外，工会的抵抗与政治上的紧张当然也必然会发生，但那属于逸出狭义经济学范围的问题，此处姑且不予考虑。

从以上的例子可知，经济学能够从直接与间接两方面分析既定政策的影响。许多政策往往只为追求直接的效果而制定，但其副作用总容易被轻视。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恰恰可以说就在于

对这种政策的作用与副作用的分析。此外，当两项以上的政策被提出时，经济学也能够分析各自的作用与副作用，阐明其差异。然而，究竟采用其中哪一个，则是经济学框架之外的问题。

第二，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效果，并非什么都能从理论上阐明。政策的效果，也有仅凭理论思考无法预测的情形。六十年代若将资本流动自由化，将有多少外资进入哪个产业，理论上并不明了。即便设定诸多假设可以作出大致的预测，在当时的阶段也不可能以此说服所有人。另外，环境不同，同一政策的效果也可能全然不同。例如，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不被认可的情况下，银根紧缩会立即造成金融市场吃紧。然而，在资本流动被认可的情况下，紧缩导致利率攀升时，反而会有外国资金流入，银根迟迟收不紧的情形也是有的。六十年代的西德即是一个好例子，八十年代以后的日本也是如此。这是政策的效果因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实例。

此外，也有政策的大方向并未改变，却因环境的变化而使政策的效果全然不同的情形。大米征购制度从战时到战后，是为确保日趋不足的粮食、抑制米价上涨的政策；而自六十年代起，则可以认为它变成了利用粮食管理制度，使农产品的价格配合一般物价水平而提高，进而以提高农户收入为目的的政策。

由这样的例子也可知，经济政策影响的分析相当困难，仍留有理论上无法预测的一面。然而问题一旦发生，就不能不采取某种政策。政策当局屡屡犯错，也是理所当然的。

据说凯恩斯因屡屡大幅改变自己的学说而常遭恶评。笔者以为，彼时凯恩斯的想法应是：环境既然变了，政策随之改变是理所当然的。凯恩斯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有着超群的直觉。遗憾的是，现状似乎是：政策当局在主张政策之际，除理论的分析之外，还必须具备熟练临床医生般的直觉力。

第三，不仅是短期的环境变化，长时期乃至历史性的状况变化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理论与经验几乎派不上用场。后文我们将要讨论的三十年代前半期的状况，正是这样一种变化的过程。经济理论在那种情形下几乎无能为力。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1936年的事，由此掀起的“凯恩斯革命”成为学界的主流，则是数年之后的事。然而大萧条自1930年已经开始，经“凯恩斯革命”而获得公认的政策，各国早已在不具备理论依据的情况下付诸采用了。当时，连政策当局也被一种想法所支配：这只是一时的处置，经济恢复常态之后即应废止。也可以说，凯恩斯的功绩在于指出：当时的状况并非反常，而是由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常态，在那里采取的政策也是能够在理论体系中得到定位的。经济政策的问题，是由如景气循环般具有反复性质的部分，与如三十年代前期放弃金本位制那样不反复的历史性变化相结合而发生的，而这就是制定经济政策困难的地方。

第四，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有许多应归因于政策制定者个性的地方。如前所见，决定政策目标的是政治家的判断。诚然，该判断受时代背景与一般性问题意识的影响，并非单凭政治家的个性所决定。然而政治家在给定的状况之下，可以强调某个问题，也可以将其淡化。池田首相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所以引发那样的热潮，无可争辩是“经济之池田”的一手导演。相反，佐藤内阁的“中期经济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后的经济计划之所以没有什么存在感，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将其视作继子般冷落，或在造势上失败所致。

如此看来，可以认为政策制定者的个性与社会状况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政策的一个个环节。第五，正如覆水难收，一度实施的政策必定留下相应的痕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来虽被放弃，但倍

增计划热潮所掀起的设备投资与重工业化的事实无法抹去。下一届内阁将在前内阁的遗产之上构建自己的政策。若是天下太平时代的小打小闹的政策，政策的痕迹或许很小；但在激荡的时代采取的政策，往往给后世留下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问题，在综合思考经济政策时，必须时时放在心上。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昭和初年的经济政策，也应从这五个角度加以审视。唯有如此，才能把经济政策当作活生生的实体来把握。

政策转换之难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经济政策自然并非与政治相脱离的东西。认为每一项政策都能顺应经济的情势、从理论上加以决定，是错误的；其中必然有对整个政治过程的考量在起作用。一经决定的政策遭到变更，对政治家而言有时意味着自杀。

井上准之助之所以试图坚守自己一经定下的政策，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掷骰子之前需要深思熟虑，但掷出之后因情势的变化而改变政策，有时是不可能的。讽刺的是，政策的变更之所以容易，是在独裁者的情形下。彼此敌视的德国与苏联一夜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正因为两国处于希特勒与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之下，即便从根本上改变政策，也不存在反对党与舆论的力量，因而无须担心政权更迭，方才成为可能。在思考经济政策命运之时，这一点给人极深的印象。当存在相对强大的反对党时，任何政权要推翻一经定下的政策，都几乎不可能。

政治上的要求与经济上的合理性，往往无法两立。于是，种种有违经济常理的举措就被强行推行。1930年、1931年的萧条，正是这样的状态。

在明治以来日本经济的历史上，可与此时相比拟的，是始于1881年的松方正义的通货紧缩政策。松方借此整理货币，谋求通货价值的稳定与统一。此时物价暴跌，农民的收入急剧减少，其痛苦至深，农民的暴动反复发生。但明治政府镇压了日趋激化的农民与自由党左派，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随着反政府运动的镇压，通货制度的确立也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把松方的币制改革看作纯粹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毋宁说重要的是：借此实现经济上的全国统一，提高明治政府的权威。经济政策无法仅仅停留在经济问题之内——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此。

第一章 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开端

1 金本位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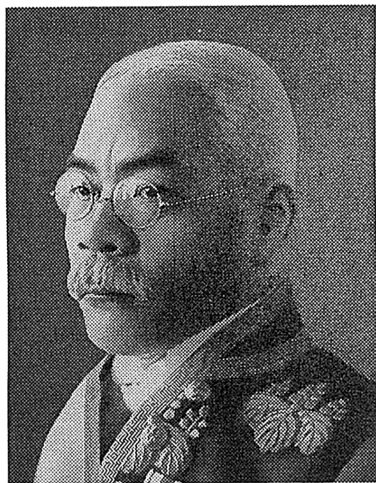
出乎预料的井上藏相就任

1929年7月，民政党的滨口雄幸内阁成立，井上准之助出任大藏大臣，这是一项出乎预料的人事安排。当时正值政党内阁的全盛时代，人们都认为除陆、海军大臣之外，阁僚理应全部起用党员。滨口却偏偏延揽金融界出身的井上担任藏相，这是因为滨口首相打算把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恢复金本位制，作为新内阁的基本政策。

解禁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以来的悬案。历届内阁几度想处理这个问题，也曾数次着手准备，但每一次都未能实现，可谓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滨口既然下决心处理这个大问题，就认为大藏大臣的位子不能交给外行。

金本位制度的机制

所谓解禁究竟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有些烦琐，还是得先简单说明金本位制的含义。所谓金本位制度，就是以黄金作为国内货币价值基准的制度。日本自1897年至1917年维持了这一制度，规定一日元合黄金二分（0.75克）。任何持有纸币的人，都可以在日本银行把纸币换成金币。因此，国内货币的供给量，由日本银



滨口雄幸

行持有的黄金量决定。实际上，日本银行并不会把这么多黄金全部放在金库里，有时也会以外汇形式存放在伦敦或纽约（海外正货^①），但原则上黄金才是货币。

自十九世纪初英国采用金本位制度以来，欧美主要国家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各国货币虽有日元、美元、英镑、法郎等各自的单位，其价值基准却都是黄金。因此，一日元若为黄金 0.75 克，则一美元约为黄金 1.5 克，一英镑约为 7.5 克，各国货币的价值都可以还原为黄金重量。一美元约二日元、一英镑约十日元，各国货币的汇率就是比较各自的黄金价值定出来的。而在金本位制下，纸币可以自由换成金币，金币和金条也可以自由输出。虽说是金本位，国内流通

① 正货指本位货币准备的实体，金本位下即黄金及可随时兑换为黄金的外汇；存放于海外者，日语原作“在外正货”。——编注

的也并非只有金币。可以说，金本位制的根本在于：货币价值与黄金挂钩，纸币可自由兑换黄金，以及黄金出口自由。

黄金出口之所以实际发生，基于如下理由。比如，假定只有日本与美国之间进行贸易。日本进口时，向海外支付日元计价的汇票或先前收到的美元计价汇票；出口时，则收到美元计价汇票或先前支付的日元计价汇票。于是当日本入超时，日本对美元计价外汇的需求增加，美国对日元计价外汇的需求减少。因此，美元与日元的交换比率会向不利于日元的方向变化。按金本位时代的含金量比较，100日元应合49美元84½美分。可是日本一旦入超，这一交换比率就会跌到该水平以下。那时对日本来说，必须比基准多付日元，所以还不如直接把黄金运往海外划算。具体来说，出口黄金要花运费、保险费等成本，但存在这样一个水平：即使支付了这些费用，出口黄金仍然划算（黄金输送点）。金本位时代，这一水平被认为是49美元38美分。日元汇率跌破此点时，黄金出口就会发生。当然，日本出超时，黄金就会按相反的程序流入日本。于是，汇率以基准汇率为中心，只能在上下黄金输送点的范围内波动，接近于固定汇率。从国际上看，也可以说金本位制度就是黄金作为国际交易结算手段而移动的制度。姑且称之为国际金本位制。

国际金本位制的功能与本质

然而，在金本位制下，国内货币量与黄金挂钩，因此随着国际交易带来的黄金出口或进口，国内货币量就会随之缩小或增大。这当然会对国内景气产生广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际交易的状况立即反映到国内金融、进而反映到整个景气，正是金本位制度的特色。于是，金本位制中产生了“自动调节作用”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国入超，黄金就会流出，国内货币收缩。于是信用趋

于不足，利率上升，国内物价下跌。其结果，出口增加、进口受抑，国际收支好转，黄金流出停止。进而转为出超，黄金再度流入。货币因此膨胀，信用扩张，物价上升，景气恢复。也就是说，只要金本位制的机制忠实地运转下去，一国因景气过热导致的物价上涨、或因萧条导致的物价下跌，都会通过黄金的流出流入，被自动调节到国际水平。

当然，这种看法潜藏着种种疑问。第一，金本位制下并非始终只发行与黄金持有额相称的货币。现实中存在纸币的超限额发行等若干例外规定，黄金保有量与货币量并非完全一致。第二，黄金开始流出、利率一旦上升，以高息为目的的外国资金就会流入，黄金的流出往往因此受到抑制。

此外还有第三个更为实质性的理由。作为十九世纪世界贸易与资本市场中心的英国，在国际收支上始终收大于支。具体说，英国的贸易虽是赤字，但运费、保险费等贸易外收支却是大幅顺差，弥补贸易赤字绰绰有余。一国的国际收支若常年顺差，其他各国的国际收支就只能是赤字，否则账目合不上。平均来看，英国把顺差部分全部投向海外，弥补了其他国家国际收支的长期性赤字，维持了金本位制度。

金本位的发源地是英国，但防止他国金本位因黄金流出而崩溃的，同样也是英国。然而英国的海外投资又会生出利息，英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因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向英国借款或引进英国企业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对英国抬不起头来。所谓英国的帝国主义，可以说就是以海外投资为支柱的对世界的支配。它与英国扶持起来的国际金本位制互为表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金本位制运转良好、自动调节作用发挥效力，事实上是大有疑问的；认为它是靠伦敦金融市场的行动来支撑、来维持的，恐怕才更接近事实。

关于英国海外投资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有一个难以忘怀的插曲。高桥是清是为筹措日俄战争军费远赴欧美、成功募集九亿余日元外债的人。其事迹在《高桥是清自传》中有详细叙述，但当时日本的地位与信用低下，募债极其困难。第一次募债好不容易谈妥时，日方提供了关税收入作为担保。即便如此，连亲日的美国人雅各布·希夫也对日本的信用表示怀疑，逼问担保是否可靠。这时，担任发行团干事的巴林商会代表雷维尔斯托克勋爵只回答了一句：“军舰！”金本位、海外投资与帝国主义三者，仿佛就凝结在这一句话之中。

对金本位的信仰招来了悲剧

那么，国际金本位制真正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它是迫使国内物价向国际物价看齐的机制。国际收支的赤字总归会产生黄金流出与物价下跌，顺差则会带来黄金流入与国内物价上升。而且以数十年为期来看，十九世纪世界黄金生产量被认为与世界工业生产大致按同一比例增长，因此生产与货币量大体成比例，物价水平大体维持不变。可以认为，国际金本位制的效果正在于此。

国际金本位制还是一种不仅支持黄金、也支持贸易与资本移动自由的制度。为促进贸易自由，必须撤废关税及其他阻碍贸易的诸种制度，但十九世纪的现实仍是高关税壁垒林立，并未出现理想的自由贸易。不过，与第一次大战以后对贸易和资本移动的诸种限制相比，可以说大战以前的限制要小得多。

在上述意义上，国际金本位制具有现实的功能。但国际金本位制之所以被强有力地维持，与其说是由于这种现实功能，不如说是由于对自动调节作用的信仰。正如已经看到的，国际金本位制内含着种种问题，实际上只有依靠英国的经济实力才能运转，却被误认为是理想的制度——第一次大战后的悲剧，其原因正在于此。

2 日本的金本位制

在出超之中脱离金本位

甲午战争获胜时，日本从清国得到了约三亿六千万日元的赔款。1897 年日本采用金本位制，就是以这笔赔款为基础的。其后日俄战争之际，如前所述，仅军费就发行了约九亿日元的外债。因此，日本的国际收支仅外债的本息支付就是沉重的负担，第一次大战前的我国苦于长期性国际收支赤字，更陷于不得不再以外债填补赤字的困境。

然而，1914 年开始的第一次大战使状况为之一变。欧洲各国忙于战争，出口余力荡然无存，只有日本和美国独占了亚洲、非洲的巨大市场，形成庞大的出超。日本的杂货和纤维制品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掉；奸商趁机出口用浆糊粘上纽扣的衬衫是在这个时期，船舶、机械等首次得以出口也是在这个时期。

大战期间的出超约二十八亿日元，黄金收入部分约二十亿日元。不过那些黄金并非实际收到，而是以英镑、美元的形式堆积在海外；总之，我国此时一举由债务国转为债权国。然而就在出超正酣的 1917 年，我国禁止了黄金出口，脱离了金本位制。

据说此时禁止黄金出口的理由是：各国在战时都禁止黄金出口，因而担心上海、香港一带的投机者从日本带走黄金；汇率异常暴涨；美国也禁止了黄金出口，于是出现了虽是出超、黄金却在流出这种反常状况，等等。

但据说还有一个更具政治军事性的理由。世界大战之下，我国也不知何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到那时，存放在外国的正货之类是靠不住的。“今后黄金不再放出，唯有加紧积蓄”（当时的大藏大臣胜田主计）。

对华政策妨碍解禁

1918年，大战结束。当时日本的黄金状况，即使立即解禁黄金出口也没有问题。日本银行持有的黄金为四亿六千万日元，与大战前持平，但海外持有的外汇已超过十三亿日元。事实上，与日本同样在大战中积蓄了巨额外汇的美国，已在1919年6月解禁了黄金出口。然而日本没有解禁。当时原敬内阁的高桥是清藏相，后来回顾其理由如下。

据高桥说，当时政府与军部的对华政策相当“咄咄逼人”。事实上，原敬内阁仍在继续西伯利亚出兵，对中国也曾召开第一次东方会议，讨论长期计划。高桥反对以武力侵略，认为“支那如今虽是国乱混沌，但终有国情安定之时到来，到那时为了治国安民，要修铁路、兴产业，首先需要的就是钱；支那这样向外国寻求巨额资金，并不是遥远将来的事”。“而且到那时，日本必须做好准备，能够立刻贷出五六亿日元。”否则中国就会向英国或美国借钱，在经济上被人征服。“存放在海外的正货，一旦有事完全靠不住，所以对内地持有的黄金要极力增殖，控制其流出”，因此没有断然实行解禁。（高桥是清《随想录》）所以，我国在大战中禁止黄金出口、战后又没有断然解禁，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理由。西伯利亚出兵的背后，可以认为，出兵当时的寺内内阁和陆军的腹案里，含有趁革命之机把东西伯利亚变成领土或保护国的打算；而不期待中国实现国民统一、反而想乘其内部抗争攫取权益的想法，也写在原敬的日记里。但是，这种“咄咄逼人”的想法，在国际政治的潮流中被击碎了。《凡尔赛条约》高倡民族自决。围绕日本占领山东，中国五四运动高涨，朝鲜展开了三一万岁运动。西伯利亚出兵也丧失了大义名分、一无所获，

只得撤兵；最后由《华盛顿条约》（1921年）实现了大幅度的军备缩减。取而代之的，是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会议外交时代。

大危机使经济上也陷于困难

阻止解禁的政治理由如上所述消失了，但那以后，这回又因经济上的理由无法解禁了。这是因为，我国经济界在1920年遭遇了大危机，再叠加解禁的冲击已变得危险；而且此后入超连年持续，我国的正货准备额开始急剧减少。如表1所示，我国持有的正货以1920年末为顶峰开始骤减。日本银行持有的黄金减少不多，海外正货减少的势头却十分惊人。而且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入超进一步增加，我国不得不再度发行外债。那是用于国内复兴和投资的资金，同时兼作补充国际结算资金之用。关东地震刚过就发行的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美元公债，因为是六分半（6.5%）的高利债，甚至被称为国辱公债；当时国际结算状况已经恶化到不得不忍辱发行的地步。由于黄金出口被禁止，汇率也急剧下跌且动荡不安。对美汇率在关东大地震之前，维持在一百日元兑四十七—四十八美元一线，但震灾之后，特别是从1924年3月开始急剧下跌，同年十一月跌到了三十八美元半的水平。此后自1926年起虽重又转向回升，但对美汇率的波动相当剧烈。在这种状况下实行解禁是困难的。就这样，我国的解禁接连撞上障碍，一拖再拖。

表1 正货存量表（单位：100万日元）

	境内正货	海外正货	合计
1912（大元）年末	136	215	351
13（大2）	130	246	376
14（大3）	128	218	341
15（大4）	137	379	516
16（大5）	227	487	714
17（大6）	461	643	1,104

(续表)

	境内正货	海外正货	合计
18 (大 7)	453	1,135	1,588
19 (大 8)	702	1,343	2,045
20 (大 9)	1,116	1,062	2,178
21 (大 10)	1,225	855	2,080
22 (大 11)	1,215	615	1,830
23 (大 12)	1,208	444	1,652
24 (大 13)	1,175	326	1,501
25 (大 14)	1,155	257	1,413
26 (昭元)	1,127	230	1,357
27 (昭 2)	1,087	186	1,273
28 (昭 3)	1,088	114	1,199
29 (昭 4)	1,088	255	1,343
30 (昭 5)	826	134	960
31 (昭 6)	470	88	557
32 (昭 7)	443	112	554

注) 据大藏省百年史编辑室《大藏省百年史》别卷

话虽如此,原内阁以后的若干内阁也曾筹划解禁,做了准备。例如,1922年至1923年加藤友三郎内阁的市来藏相着手解禁准备,抑制通货增发,打算等汇率回升后实行解禁。然而,时任政友会总裁的高桥是清提出异议,又须等待贸易转为出超,如此迁延之间,内阁倒台,关东大地震发生,机会就这样失去了。接着1926年,若槻内阁的片冈直温藏相看到汇率回升,定下解禁的方针,为此着手清理国内金融机构,却引发了后述的金融危机(1927年3—4月)而下台。

因有这些原委,解禁成了我国经济界的悬案。

3 海外恢复金本位

热那亚会议重建金本位制

这里把目光转向海外，看一看恢复金本位的经过。美国 1919 年恢复金本位之后，欧洲各国战争创伤未愈，无法立即恢复金本位。但战后苦于急剧通货膨胀的德国成功稳定了通货，于 1924 年恢复金本位；继之英国于 1925 年，法国最晚，于 1928 年下调平价后恢复了金本位。日本在 1929 年明确提出解禁的方向、1930 年 1 月断然实行解禁，也可以说是被这一世界潮流推动的。大战结束时，能否恢复金本位是个大问题。被课以堪称天文数字的三千亿金马克赔款的德国自不待言，即使是战胜的英国和法国，海外投资也大幅减少，而且背负巨额债务，偿还无望。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战后一跃成为债权国的美国向德国放款、使其产业复兴，扩大德国的出口，以其收益支付赔款，英国和法国拿到赔款来维持进口，并偿还战时以来欠美国的债务——这种国际资金流动形成之后，金本位的恢复才走上轨道。在此之前，因为无法恢复金本位，诸如另造国际货币、以实物为基础进行国际结算之类的种种荒唐方案横行。在混乱中指出金本位恢复方向的，是 1922 年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货币的决议。

热那亚会议的决议就货币问题声明：应以重建金本位制为最终目标推进经济复兴。与此同时，还附加了两个重要的新提案。

第一是：通货扩张、通胀加剧的国家，未必需要维持大战前的货币单位，也就是说，可以下调一货币单位所含的黄金量（平价下调）。第二是：虽说是金本位，中央银行往往无法准备正货，因此也可以兼采金汇兑本位制的主旨，即以维持金本位的国家的外汇充作货币发行准备。

恢复金本位与平价下调

其后，各国迅速开始恢复金本位，战时通胀加剧的各国，按照上述第一案下调平价后恢复了金本位。例如德国，把旧一万亿马克换成一地租马克，并规定一地租马克所含黄金量与旧一马克所含相同。也就是说，承认在恢复金本位时，旧一马克的价值已经跌到了一万亿分之一。虽没有这么极端，但许多国家恢复金本位时都下调了一单位货币所含的黄金量。例如意大利下调到一百分之二十七发行新里拉，法国下调到约一百分之二十发行新法郎。这种下调平价后恢复金本位的方法，当时称为按新平价解禁。

与此相反，按与大战前相同的含金量实行解禁，称为按旧平价解禁。实行按旧平价解禁的代表性国家是英国。对金本位的发源地英国来说，下调英镑的价值之类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当时英国的汇率已经下跌。按旧平价一英镑兑四美元八十五美分，当时已变成四美元三十美分上下，即下跌了约 10%。在这种情况下若按旧平价解禁，汇率就要上调约 10%。也就是说，英国出口品的价格将被抬高 10%，进口价格将被压低 10%。英国产业出口困难，遭受了重大打击。尤其煤炭业引发了大问题，1925 年至二六年间，竟酿成约六个月的总罢工。凯恩斯在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声明恢复金本位后，立即写下《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展开反对论战，但没有效果。

成为潜流的“回归正常”

如上所述，虽历经曲折，接近战前的金本位制恢复仍在国际上推进。这一潮流的背后，潜藏着美国哈定总统提倡的著名的“回归正常 (come back to normalcy)”思想。大战之前万事顺遂。如今诸多困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战争这一不幸事件搅乱了世道。只要恢

复战前原样的制度，必定会再度顺遂——这种思想被普遍接受。然而事实上，仅靠恢复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黄金过度集中于美国就是一例。美国的国际收支在战时战后一贯是大幅顺差，加之随着各国偿还大战期间所负债务的进展，黄金急速流入。

英国为了维持国际金本位制，曾把国际收支顺差的几乎全部再投资于海外，美国却没有照此办理。美国并未充分理解昔日英国所扮演的支撑国际金本位制的角色，也不打算继承这一角色。金汇兑本位制的必要，也正是从这一点产生的。各国国际收支因此愈发不稳。如前所见，美国资金经德国流向英国、法国，再回流美国这种复杂的国际资金流动之所以产生，根本上也是因为各国如上所述都没有了余裕。于是，一国的国际收支危机会立即波及其他各国——例如美国若从德国抽回资金，英国、法国也会立即受到影响——这样的机制已经成立。

美国的这种政策，法国也起而仿效。1928年恢复金本位之后，法国同样开始蓄积黄金。国际金融的流动愈发像危险的走钢丝。1929年的大萧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爆发的。然而当时察觉其危险性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

4 解禁是耶非耶

三足鼎立的解禁论争

解禁作为十年来的悬案，到1930年1月付诸实施之前，自然有种种议论。为简明起见，把这些议论按1927年春金融危机的前后分开，梳理其来龙去脉。如前所述，1923年，当时的加藤友三郎内阁的市来藏相准备解禁，却因内阁更替和关东大震灾而受挫，其背景正是围绕解禁的赞成与反对两派议论交织成的漩涡。当时的代表性

议论，大体可以分为按旧平价解禁论、按新平价解禁论和解禁反对论三种。不过按新平价解禁论迟至 1924 年 3 月，才由《东洋经济新报》主笔石桥湛山首次倡导，所以姑且放在后面，先来看关于按旧平价解禁的赞成与反对两派议论。

忠实于教科书的按旧平价解禁论

市来乙彦就任加藤内阁大藏大臣不久，即于 1922 年 9 月召集东西两地的实力雄厚的实业家，举行了关于解禁的悬谈会。当时的与会阵容，很能显示当时财界的势力配置，很有意思，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三井、三菱的代表团琢磨、木村久寿弥太；金融界的代表池田谦三（第百银行）、小山健三（三十四银行）；代表纺织业界的富士纺的和田丰治和钟纺的武藤山治；代表贸易业界的岩井胜次郎（岩井商店）、原富太郎（经营生丝出口的原合名）。此外还有日本银行正副总裁井上准之助与木村清四郎、正金银行行长儿玉谦次，其余是大藏省和农商务省的相关官员。这里没有一名重化工业的代表，产业界代表只限于棉纺业，贸易业界代表却有两人参加，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作为显示当时财界各产业地位的材料，也很有意思。

那么，席上的议论，大体上是一边承认解禁的必要、一边认为为时尚早。当时汇率在四十八美元上下，市来似乎认为，若因贸易好转再回升一些，解禁就有可能了。

然而，席上唯一主张立即实行解禁的，是钟纺社长武藤山治。当时武藤是号称日本第一优良公司的钟纺的社长，同时又倡导必须把实业界的意见反映到政治中去，1919 年创立大日本实业组合联合会，出任委员长，积极发表政治言论。这里介绍一下他的意见。

大战以来我国物价不易下跌、产业界苦于不振，是因为“战时异常膨胀的通货难以收缩”。通货之所以膨胀，是因为日本银行囤聚

了大量正货。若解禁黄金出口，通货就会收缩，物价就会下跌。由于禁止黄金出口，汇率低落，我国进口品偏贵，消费者被迫购买高价进口品，这是社会正义所不能容许的。而且汇率低落使进口品偏贵、出口品偏贱，对国民经济整体也是损失。若实行解禁，一时虽会陷入不景气，但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增进效率、厉行节约，战后经济的重建也才能完成。早日实行解禁，正货一时虽会流出，但物价下跌、出口增加，最终也能获得经济稳定。若拖延解禁，正货只会一味流出，最终恐怕会坐失解禁的时机。（《关于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建议书》，《武藤山治全集》第四卷）

武藤的这一主张，与1929年井上准之助作为大藏大臣所阐述的内容几乎相同。其思路正是当时经济学教科书的原样照搬。只要国际金本位制顺畅运转，只要各国经济朝着国际均衡运动，武藤的议论就不得不承认是正论。但是，伴随解禁而来的物价下跌与萧条，恐怕会使许多不堪承受的企业破产。武藤的这一议论，对其危险极为乐观。事实上，武藤背后的大日本实业组合联合会，是以大阪的大纺织业者和贸易商为中心的组织，是对萧条有强大抵抗力的群体的集合。武藤当时反对把限产作为纺织业界的萧条对策。他认为，既然是自由经济，通过竞争产生胜者和败者是理所当然；限产破坏了这种功能，所以反对。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个背靠优秀公司、主张教科书式理论的优等生的影子。武藤关于解禁的主张，也可以说是与此类似的优等生逻辑。

维护产业利益与解禁反对论

与背靠优秀公司的武藤相比，代表不久即将倒闭的铃木商店（神户的贸易商）的金子直吉，主张彻底的解禁反对论。在金子看来，当时产业不振的原因在于利率高。英国定期存款利率是2%，贷款利

率约 4%。我国定期存款利率是 6%，贷款利率在 9% 到 12% 之间。要降低利率，除了增发通货别无他法。这样一来，企业经营好转，新的设备投资得以进行，成本下降，物价反而会下跌。说收缩通货物价就会下跌，是谬论。

因此，若解禁黄金出口，萧条会愈发深刻，经济界的恢复无望。不仅如此，连已经在进行的海外正货出售也应停止，转而蓄积正货。增发通货、停止出售海外正货，汇率或许会下跌、国内物价或许会上升，但进口受到抑制、出口增加，国际收支将获得均衡。产业由此发展，利率一旦下降，产业界的负担就会减轻，有价证券的发行也会变得容易。（金子直吉《经济野话》）

金子直吉的意见，本就近乎偏激之论。无视国际上恢复金本位的潮流，谋求增发国内通货、禁止出售海外正货，在国际上会被视为等同于破产的状态。更何况，其提倡者既然是金子直吉，那就不得不说，这种议论终究难以被人当真看待。金子先前创立国际汽船，受政府援助，把濒临破产的旗下东洋汽船并入其中，从而免遭损失。此外，他还向台湾银行借了巨款，铃木商店的盛衰已到了足以左右台湾银行命运的地步，这一点部分财界人士也很清楚。这样的金子所提倡的议论没有被人当作一回事，是理所当然的。不过，金子的意见确是代表萧条之中一般产业和重工业利益的率直愿望，这也是事实。解禁失败之后，高桥是清作为藏相推行的政策，相当程度上与金子的意见相似。十年前的偏激之论竟能成为当局的政策，虽是国际环境变化使然，但也可以说，经济政策之难正象征于此。

宪政会内阁的解禁准备

关于解禁，像武藤和金子那样从产业立场明确表明赞成或反对的例子反而很少。问题主要是从国际金融的侧面来把握的，人们是在其中窥伺解禁的时机。

然而如前所见，关东震灾之后汇率暴跌，解禁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震灾之后，复兴所需的进口增加，出口却衰退了，我国的外汇状况显著困难。政府在英国和美国募集了五亿五千万日元外债，并出售海外正货等，稳步采取了入超对策，但维持汇率变得困难了。其实震灾之后，政府定下了把汇率维持在四十九美元的政策，继而改为维持四十七美元半，动用海外正货买入日元外汇，但到 1924 年 3 月，这种操作也难以为继，此后汇率急剧下跌。

此时出现的是两种议论：一种把汇率下跌的原因归之于禁止黄金出口，主张通过实行解禁来恢复汇率；另一种则把跌落后的汇率看作实际行情，主张按现在的汇率下调日元价值来实行解禁，即按新平价解禁论。1924 年 3 月以后，汇率到十一月跌到了三十八美元的水平，因此若在这个时期按 49 美元 84½ 美分的旧平价实行解禁，产业界当然会陷入剧烈的混乱。所以，立即实行解禁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行的。但是，正因为禁止黄金出口才招致如此程度的汇率下跌，所以应当推进解禁准备、使汇率恢复到平价水平的意见骤然增强。1924 年以后，加藤高明的宪政会内阁沿这条路线推进了政策。这届内阁的滨口藏相为防止汇率下跌，出售海外正货，十四年九月更实行黄金输送，以图恢复汇率。因此，十四年二月汇率转为上升，十五年二月恢复到了四十五美元。这样的对策，可以说是以按旧平价解禁为目标的政策的体现。



石桥湛山

倡导按新平价解禁的四人组

在汇率难以维持的十三年三月,《东洋经济新报》主张按新平价解禁。我国的一百日元,或许曾经有过能在美国买到近五十美元东西的购买力,但如今已没有那样的价值,大幅下跌了。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十三年三月的汇率既然处在四十四美元的水平,就应当把日元的黄金价值下调 10% 左右来实行解禁。按新平价解禁论的背后,有着当时金融学的世界性权威、瑞典的古斯塔夫·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说。以石桥湛山为首,高桥龟吉等几位经济学家首次提出了这一见解。按新平价,可以在不给国内经济以打击的情况下实行解禁。然而这一意见在当时几乎被无视。实行解禁时下调平价,关乎国家威信;当前的低落不过是震灾以来的一时变化;汇率虽说下跌,也不过 10%—20%,那种程度的话用不着下调平价——这类见解占了上

风。此后，始终倡导按新平价解禁的，只有石桥、高桥加上小汀利得、山崎靖纯这几位经济记者，即所谓的按新平价解禁四人组。

5 金融危机

紧缩政策下倒闭频出

1924 年成立的宪政会内阁，持续采取了以解禁为目标的政策，前已述及。在推进汇率上调的同时，国内也必须做出相应准备。若实行解禁之后入超仍持续，国内的黄金转瞬之间就会流出。为此，必须节约消费，以压缩国内对进口品的需求。政府决定率先紧缩财政、节约不必要的岁出。在这个过程中，若干企业的破产相继暴露出来。

当时产业界受到第一次大战后萧条的打击，背负着不良资产、出现赤字，却仍粉饰资产负债表、靠吃老本虚发红利（所谓“章鱼配”）的企业极多。资产负债表的粉饰手法，古今相去不远：销售虽少，却上调不动产的账面价值以挤出账面利润，或上调库存品的价格，是惯用手段。但那样的粉饰不可能永远持续，破产或减资的企业接连出现。而且当时的银行，除部分大银行外，实质上近乎个人经营的居多，银行资产被套牢在与董事相关的事业中的情况很多，因此那些企业的破产立即左右了银行的命运。在银行和企业经营如此恶化的状况下采取紧缩政策，到处暴露出烂摊子，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1925 年，大贸易商高田商会破产。这家企业在贸易投机上受到重创，最后想借入政府资金救急，却被拒绝融资，终于倒闭。同为 1925 年，政府对殖民地的纸币发行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责令其清理不良债权、停发红利，另一方面大幅降低政府资金的利率，帮助它们重建。对铃木商店等组建的国际汽船也采取了同样的

处置。然而，许多企业的伤势已经深到靠那种程度的政策无法复原的地步。其中最大的，是台湾银行与铃木商店的关系。

银行与不良企业的孽缘

神户的铃木商店，原本不过是经营台湾砂糖和樟脑的小贸易商，但自明治末期起逐渐做大，特别是第一次大战期间急速扩张，大战中其年销售额甚至超过了三井物产。主持它的，就是前面说过的掌柜金子直吉。膨胀起来的铃木商店把事业范围扩展到一切方面。贸易方面综合商社化，经营各种商品自不待言，贸易之外，还把手伸向了克劳德式氮工业、东洋制糖、帝国人造丝、播磨造船等制造业，1927年当时，拥有直系三十五家、旁系三十家子公司。其中也有一部分成绩良好的，但资产状况不良的也很多；本业贸易则因国际商品价格下跌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其全盛时代，各银行争相希望与铃木交易，但随着其资产状况恶化为人所知，各银行渐渐开始抽身，最后只剩台湾银行一家背负对铃木的贷款。台湾银行也不是不知道铃木商店的窘境，早就想斩断这段孽缘，但一抽身铃木就会倒下，贷款的回收就无望了，所以无奈只好追加贷款，实情似乎就是如此。1926年末，台湾银行的贷款总额为六亿余日元，其中三亿五千万日元是对铃木系的贷款。而存款仅一亿余日元，其余大部分靠日本银行借款和短期拆借（call，来自金融机构的短期融资）周转。当时金融虽然松弛，台湾银行却始终拆借巨款。据1926年11月的数字，台湾银行拆借的款项似乎接近两亿日元。

类似的关系也见于十五银行与川崎造船之间。松方正义的长子松方岩是十五银行的行长，次子幸次郎是川崎造船所的社长。十五银行的股东大半是华族，成了宫内省的金库。这家十五银行约三亿

八千八百万日元的贷款中，贷给以幸次郎的川崎造船为首的松方一族的资金达一亿四千二百万日元，其大半处于无法回收的状况。贷款之外，十五银行还持有松方一门不良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债三千万日元，其时价仅六百万日元。

另一家不良企业的代表性案例是渡边银行。渡边一族是东京市内的大地主，自己经营银行，又成为各种公司的大股东进军实业界；但因萧条和震灾，银行资金被套牢，于是动员关联公司的资金和信用，挪用于银行的资金周转。例如渡边六郎既是银行的行长，又是东京乘合自动车（青巴士）的社长，据说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时，他竟让青巴士发行二百万日元的公司债，把这笔钱挪作银行的融通资金。

某小银行的内情

据说，当时倒闭的某小银行的行长后来讲述了如下内情，为这类银行的危机作了注脚。“首先，手头现金仅勉强维持小额特别活期存款（现在的普通存款）支取所需的额度；所持有的有价证券，除挪作吸收拆借的担保、或备作赶赴日本银行时之用以外，大抵是连担保都指望不上的不良公司股票。所以，计入决算报告的有价证券估价虽相当高，实际顶用的金额约只有一半。其次，与资本金相比，存款较其他银行已达到相当的比率；我接手经营时，还有陆续存入的，设在某偏僻新开发区的支行的存款，常使总行金库很是热闹。尤其定期存款中，有景气时代与家父共事的人、及其关系中的资产家之类，大约存款额的三分之一似乎是固定无妨的。再查贷款方面，内情难以判明，账簿与实际无论如何都对不上。尤其收作担保的东西，似有中途被掉包的，冒出全然不同的有价证券；工厂担保、不动产担保之类，其牵强之处连我这外行都看得出来。信用放款的票据类也计入了相当金额，其大半是融通票据，可以办理再贴现的商业票

据极少。而且活期透支若无其事地进行着，问经办人员，说是家父指示，这家店与那家店各有若干若干的透支无妨云云。不过，即使是相当可疑的贷款，利息倒都按期日支付，似乎已成习惯，这方面暂时尚无须担心。另外，银行所有不动产的估价我无从知晓；据说估到了相当极端的价位，高达接近资本金的一半。”（绪方润《银行破产物语》）

金融界的清理整顿与震灾票据处理

以上所见的企业经营恶化和银行经营危机，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1926年就任大藏大臣的片冈直温，决意实行解禁，另一方面得知这些银行资产状况之糟，大吃一惊。若置之不理，它们必将在解禁后必然到来的萧条中破产。片冈下定决心，把整理金融界作为解禁的前提条件。

当时恶化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诸种问题中，最急需整理的是震灾票据（关东大地震受灾票据）问题。关东大地震时，政府以敕令暂缓支付震灾地区开出的票据，其后对这些票据由日本银行随时办理再贴现，防止了财界的危机。震灾地区的企业和商人靠日本银行的信用得到了救济。到1923年12月末的期限为止，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近四亿四千万日元。然而其后到1926年末，许多企业已经恢复，半数以上已经结清，但日本银行仍手持两亿七千万余日元的票据。震灾后过了三年多仍未结清的这些票据，大半是缺乏支付能力的。

为了准备解禁，片冈藏相认为应当把震灾票据处理干净。说起来好听，其提案的内容是：震灾票据中被认为实际无法支付的一亿日元，由政府以公债向日本银行提供担保；其余一亿七千万日元部分，政府把同额公债贷给持票银行，让票据发行者分十年偿还——所以实质上是把两亿七千万日元无法支付的票据原封不动地用

公债填补，是一项救济不良银行、不良企业的政策。而这两亿七千万余日元震灾票据之中，竟有九千二百万余日元是铃木商店系的票据，其次是久原房之助系的票据。持有震灾票据的银行，以台湾银行一亿日元、朝鲜银行一千五百万日元为首，特殊银行共一亿二千二百万日元，其余普通银行约八千五百万日元。

因此，说这个法案实际上的着眼点在于救济铃木、久原等，以及救济其债权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也并无不可。但若预料解禁后萧条将至，片冈认为必须救济这些企业和银行。铃木商店原本就与当时的宪政会内阁渊源很深。金子直吉与宪政会领袖滨口雄幸等人有深交，也是后藤新平政治资金的来源。因此，片冈的铃木救济，难免有会被疑为出于党派私利与权谋的一面。

不过片冈说，他考虑的重心与其说是台银、铃木，不如说是中小银行的清理。按片冈的打算，法案通过之后，先把持有震灾票据的十一家烂账累累的银行暂且救济，再彻底整理，另建新银行予以合并。总之，片冈为法案的通过四处奔走。私下拜访在野党政友会的田中总裁、说明财界整理的必要时，田中回答说：“经济上的事我不懂，但听了你的话全明白了。确实，不管谁干，总得闯一次难关。我方恐怕也会有相当多的议论，不过那我会设法摆平。”

实际上，法案提交议会之后，起初也是平静的，看不出会引发大争论。但当时议会的情势微妙，执政党宪政会是少数，在野党政友会和政友本党势力很大。为此，年初三党首举行会谈，约定时值大正天皇谅暗（天皇服丧）期间，应慎于政争；但政友会方面解读，其背后有着议会闭会后把政权让给政友会的默契。

点燃危机的片冈藏相失言

然而其后宪政会接近政友本党，两党联手被公之于世，政友会遂断然转为攻击，抓住适逢其时的震灾票据法案作为攻击目标，说这个法案是救济政商的法案，要求公布震灾票据发行者和持票银行。一经公布，不良企业和不良银行的内幕就会一下子暴露，政府当然不能答应。不良银行之一渡边银行无法结清票据交换的差额，行长走访大藏次官说明此意，是在 1927 年 3 月 14 日。片冈回答在野党议员质问时说，因为诸君闹得厉害，金融界陷入不安，渡边银行不得已停了业——这是当天下午的事。然而渡边银行一度提出停业之后，钱凑齐了、结清了交换差额，但称既被大藏大臣那样说了，已无法营业，从第二天起停了业。所谓片冈藏相的失言，指的就是这件事。其后金融不安加剧，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之间，中井、左右田、村井等五家银行停业，挤兑频发。然而三月二十二日，反复争执的震灾票据法案总算通过了贵族院，挤兑一度平息。

然而该法案通过时，贵族院附加了附带决议。一是关于该法案的运用，设震灾票据委员会，进行严正公平的审查；二是为特别巩固台湾银行的地位，特设调查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台湾银行的内幕如前所见危险万状，仅靠这个法案的担保还不能说安全。据说，知悉内情的井上准之助等人向贵族院私下陈说、说明法案的必要，才附加了这一附带决议。

法案通过后的三月二十四日，台湾银行决定今后不再对铃木商店新增贷款。由于上述附带决议，政府已决定不抛弃台湾银行，因此它放了心，想斩断与铃木商店的孽缘吧。

四月一日，这一事实一经报道，财界为之震动。铃木商店旗下事业的资本金超过四亿日元，借款据说达四亿五千万日元。若这些

无法回收，影响会波及何处，难以估量。台湾银行首当其冲，拆借回收蜂拥而至。三月初以来半月多，一亿三千万日元的拆借已被收回，剩下的近两亿日元也被催逼。此时最早收回拆借的是三井银行，一举收回了三千万余日元。台湾银行自然手头拮据，除了依靠日本银行的放款别无他法，但其放款到四月十二日总额已超过两亿五千万日元，日本银行提出，没有政府的担保，无法再继续放款。

围绕救济台湾银行的博弈

政府为救济台湾银行，想让日本银行放款，拟定了以两亿日元为限为其担保损失的紧急敕令，提请枢密院咨询。明治宪法之下，遇有紧急而无法召集议会的场合，政府经枢密院同意，可以公布代替法律的敕令。

然而，这一敕令未能获得枢密院的同意。当时掌握枢密院实权的，是副议长平沼骐一郎、伯爵伊东已代治等人，他们与政友会联络密切，企图通过否决此案谋求内阁倒台。片冈走访伊东私邸，说明敕令的必要、恳请通过时，伊东不作答复，指着壁龛的挂轴和摆设，说那是雪舟的什么、这是南京古渡的什么，用一通古董话把他打发了。（片冈直温《大正昭和政治史的一个断面》）

另一方面，平沼骐一郎会见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问台湾银行若倒台会对财界有什么影响。池田回答：“内地也好，外国也好，台湾银行不行的事尽人皆知，不会有人在那里存款，倒了也没多大影响。”（池田成彬《故人今人》）从台银抽回拆借、早就抑制对铃木商店融资的池田，这么回答毋宁说是理所当然的。亲政友会的平沼就把这一句话当作唯一的经济知识，走进了枢密院的议场。议场上，特别是伊东对政府的攻击猛烈至极，称紧急敕令目前尚非真正紧急、不能认可，并抓住当时随中国北伐而起的在留日侨遭暴行事件——南

京事件——攻击外交的失败。其间还流传着会后走廊上币原外相扬起袖子说“要干一场吗”的插曲，最终敕令案被否决了。

四月十七日夜，若槻宪政会内阁终于总辞职。日本政治史上，因经济问题受挫而被迫总辞职的内阁，说这恐怕是第一例也不为过。四月十八日，台湾银行终于停业。与此同时，此前经营状况恶化的近江银行等，停止支付的接连出现，二十一日十五银行倒闭，金融危机达到了极点。所有银行都遭挤兑，被储户的长队包围。日本银行为此把手头的纸币贷给各银行，到二十一日库存纸币见了底，十五银行停业后，对愈发高涨的挤兑风潮已没有任何手段。东京、大阪的银行在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不得不自发临时停业。

另一方面，组阁的大命降到了政友会田中义一总裁头上。田中为了对付这一危机，起用前首相高桥是清任大藏大臣，谋求渡过危机。高桥首先以紧急敕令实施了三周的延期偿付（*moratorium*，短期支付缓期令——五百日元以上的支付全部顺延三周，银行取款也限制在五百日元以下）。枢密院这次也认定为紧急，没有再提异议。

政府在此期间召集临时议会，对日本银行许诺为渡过金融危机在五亿日元以内担保损失，使其为救济金融机构大幅放款；对台湾银行许诺两亿日元的损失担保，合计通过了担保七亿日元损失的大胆方案。延期偿付实施后第三周的五月十三日，各银行在窗口把从日本银行借来的纸币堆成小山开业，但已无人来取存款，金融危机至此总算收了场。

金融危机留下的伤痕

然而，金融危机留下了巨大的伤痕。第一，此前缓慢推进的中小银行清理一举加速。因挤兑被取出的现金，在危机平息后重又回到了银行，但存款的去向是当时五大银行（三井、三菱、住友、安

田、第一)为首的一流银行。五大银行的存款激增,而中小银行、地方银行的存款减少了。其结果,大银行的优势愈发强化,发言权也更大了。

第二,在金融危机中停止支付的不良银行自不待言,幸存的中小地方银行也不得不接受整理。先前停业的近江、中井、村井等银行,削减资本金、董事献出私财、存款的大半也被削减,另建昭和银行予以合并(1928年)。十五银行实行减资并由董事献出私财,冻结了大半存款,接受日本银行八千万日元低息资金的融通,单独复业。台湾银行为填补三亿一千万日元的亏空,减资至三分之一,靠日本银行及政府的借款补充手头资金,不久复业。台湾银行一案,储户分文无损,而且只是行长换了人,董事未被追究责任。而未停业的银行,也迅速接受了整理。前年即已准备、四月修正的银行法,设置五年宽限期,不承认资本金一百万日元(东京、大阪为二百万日元)以下的小银行,因此中小银行急速被大银行吸收、合并。

第三,存款向大银行集中和中小银行的倒闭或合并,给中小企业的金融带来了巨大影响。倒闭或被吸收的中小银行,长年从事中小企业金融,因此中小企业因其消失而在金融上大吃苦头。例如近江银行作为近江商人的银行,与织物业界关系深厚,其倒闭不仅使业界的存款化为乌有,还使其失去了融资的门路。在东京下町拥有势力的中井银行、村井银行的情形也一样。由于日本银行向台湾银行和十五银行大幅融通资金,金融总体上虽是松弛的,中小企业的金融却反而更苦了。

以解禁为目标策划的震灾票据整理,就这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机,把片冈藏相的解禁政策吹得无影无踪。田中内阁忙于收拾金融危机的残局,根本无暇顾及解禁;而高桥藏相原本就是解禁反对

论者，前已述及。金融危机平息后接替高桥的藏相三土忠造，对解禁也同样持慎重态度。就这样，解禁作为悬案，其解决被暂且搁置。

6 从田中内阁到滨口内阁

民间接连的解禁决议

1928年10月，东京、大阪两地的银行公会作出了“政府应立即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决议。其理由大致如下。第一，由于禁止黄金出口，汇率波动剧烈，相关业者无法制定确定的计划，深感困扰。第二，世界列强都已实行解禁，我国不能独自持续这种反常状态。第三，不能坐等低落的汇率回升，最迟到明年的进出口转换期（贸易季节性转为出超的时期）之前，应公示断然实行的日期。第四，断然实行解禁之时，紧缩财政、控制公债发行自不待言，还须立足于“工商业者、金融业者及一般国民一致勤俭节约的旨趣”，务使没有通货膨胀之虞。

这一决议中，作为因汇率波动而受恶劣影响者，可举生丝业者。生丝出口在夏至秋之间迎来最盛期，一到那时贸易转为出超，汇率上升。可是，假设汇率上升，比如一百日元兑四十五美元的回升到了四十八美元。生丝出口的约定若以美元进行，生丝业者到手的日元价值就会减少。因为约定时的四十五美元值一百日元，而升到四十八美元时收款，就是 $100 \text{ 日元} \times 45/48 = 93.75 \text{ 日元}$ ，到手只有这么多。对此大为吃惊的生丝业者，早在1928年5月就自发召开了业内大会，决议要求解禁。

生丝业者的决议姑且不论，面对主要银行一致的决议，政府也不得不有所动摇。政友会内阁也逐渐开始考虑解禁了。但是，当时政友会的田中内阁倡导积极财政、扩大财政规模，再加上忙于收拾

1928年6月关东军河本大作参谋等人制造的炸死张作霖事件的残局，并不具备骤然改变财政政策的力量。不过，这届田中内阁到翌四年五月，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解禁，着手了准备。

当时驻伦敦的财务官津岛寿一，接到了回国命令，并受命探询为解禁设定信贷额度（credit）的可能性。津岛立即与英美金融界的首脑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谈。此时，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表示意见说，强行抬高汇率来解禁，会有物价暴跌的打击，这一点应予警惕；美国的摩根商会也把同样主旨的备忘录交给了津岛。但英美金融相关人士大多似乎赞成解禁。津岛怀揣这些情报横渡太平洋，在船上听说田中内阁垮台、滨口内阁成立了。

政友会的微妙立场

三土虽做了上述准备，却对此严守秘密。为此，乡诚之助、团琢磨、井上准之助三人代表财界探问其真意时，三土回答说：希望尽可能在条件稳妥、不必勉强时解禁，但不会轻率实行。1928年10月银行公会决议时，股票暴跌，五月也有解禁的流言传出，股票、商品市场暴跌。三土回答财界代表质询的发言，被认为是出于稳定市场的意图。

只是这里引人兴趣的是，井上准之助加入了拜访三土的代表行列，而且担当了向记者团传达不立即实行解禁这一意见的角色。井上此时看来也是赞成三土意见的。而这位井上仅仅两个月后就成为解禁政策的中心人物，不得不说实在微妙。

田中内阁的垮台，是因为首相曾上奏天皇，要把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责任人交付刑事处分，却迫于自家政友会和陆军的压力，想以行政处分了结，因而失去了天皇的信任。捂盖子蒙混过关的政策，招

致了天皇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愤怒，田中失去了信任。所以政变突然而起，由反对党民政党组了阁。

只是，这里只想补充一句。河本参谋虽被撤换，但当时，在满洲，关东军的中坚参谋们正以石原莞尔中佐为中心，制订以武力占领满蒙的计划。河本参谋的处分问题不仅决定了田中内阁的死命，而且此后不断累积的关东军的谋略，日后将夺去民政党内阁的生命。而且这种动向绝不限于关东军内部，并在陆军中层骨干中赢得了不少响应者。在试图乘上世界经济潮流的解禁政策和参加裁军的背后，反抗既有世界秩序的陆军阴谋正在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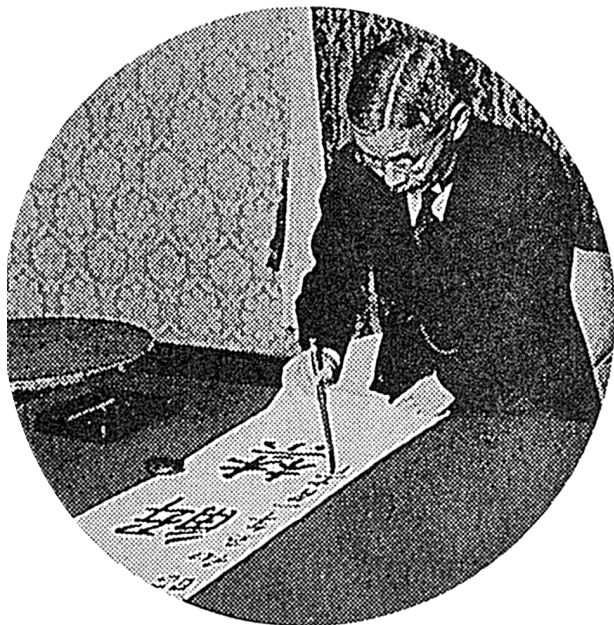
第二章 解禁的实施

1 井上准之助

其为人

民政党在 1929 年 1 月就经党内正式决议立即实行解禁。一旦掌握政权，碍于颜面也必须马上实行解禁。承担这一责任的井上，如后文所述，似乎在组阁之前很久就有人私下同他商谈，请他出任大藏大臣，因此他是肩负着坚决实行解禁的使命入阁的。

井上作为金融家，走过了一条罕见的飞黄腾达之路。他生于大分县的偏僻乡村，经第二高等学校进入东京帝大法学部，毕业后于 1896 年进入日本银行。据说在二高时代，他曾与高山樗牛争夺首席。进入日本银行不久就赴伦敦留学，后任大阪分行行长，1906 年以三十八岁之龄被破格提拔为总行营业局长。这是异乎寻常的晋升。其后一度派驻纽约，1912 年出任横滨正金银行副行长，继而任行长八年，1919 年任日本银行总裁，1923 年任山本内阁大藏大臣，其后一度下野，但 1927 至 1928 年间为处理金融危机的善后再次出任日本银行总裁。提拔井上的是高桥是清，因此井上被视为政友会系的人物。正因如此，他入阁民政党内阁格外令人感到意外。可以说，井上在成为滨口内阁藏相之前，已两度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一度出任藏相，身居金融界元老的地位。井上私生活清白，从年轻时起就是勤



挥毫书写“金解禁”的井上藏相

学之人，直到晚年仍常读英文书籍。在一度赋闲的时期，他曾在东京商大（现一桥大学）和京都帝大作连续讲演，后来留下《战后我国的经济与金融》、《我国国际金融的现状与改善对策》两本著作。但他绝说不上是学者气质的书斋中人。与井上任日本银行总裁时的理事、后来出任总裁的深井英五，以及第一银行的明石照男相比，井上始终是个实务家，毋宁说他的本领正在于政治性的一面。

深井英五对井上的批评

1920年危机之后，财界屡屡陷入危险状态。时任日本银行理事的深井英五，鉴于战后经济的困难，主张宁可收紧金融，以防止景气骤升。恰逢其时出任总裁的井上也赞同这一政策，官方贴现率维

持在很高的水平。然而井上另一方面却又大行特别融资，即在大企业濒临破产时特别供给资金的所谓“特融”。深井后来对这一政策这样说道。

“方针并未改变，但单就眼前出现的某一事件来看，予以救济于日本银行而言并非难以承受的负担，也很难说仅此便会使通货状态恶化，而破产的暴露恐将引起周围的动荡，故以此际事非得已为由，发放了特别的救济贷款。所谓特别贷款，超出常规的范围，从维持通货健全性的角度看并不可取，大体容易趋于固定化，有时还包藏着招致日本银行损失的危险。若任其累积，难免对全局产生恶劣影响；但此类措施并非作为原则来认可，而是针对一个个案件来决定的，所以只要有人着重眼前情由提出主张，就直接涉及该案件的范围而言，便没有充分理由针锋相对地反对。于是逐案被拖着走。……救济之上再叠救济，便不知何处方可轻易止步。终于使世间产生了一种观感，仿佛救济财界才是日本银行的主要工作。……可以说，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银行史的主要部分实为救济财界所占据。如茂木商店与七十四银行之例（1920年4月，危机之际倒闭——引用者），尽管日本银行给予了大量援助，终因损失过于巨大而未能免于破灭的也有，但大体上防止了破产，保住了表面的平静。此间日本银行的一举一动皆为财界所重视，在某种意义上，对日本银行而言或许不失为风光的时期。特别措施的正式决定当然均提交董事会议，但其大纲出自井上总裁的腹案，主要由理事麻生二郎氏负责执行。”（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在以上这段长长的引文中，深井委婉然而痛烈地谴责了井上。深井所谴责的，是嘴上说着“方针没有改变”、实则“救济之上再叠救



深井英五

济”、在财界风光活跃的井上，同时也是日本银行原则遭到扭曲这件事。

例如，向台湾银行发放的与铃木商店相关的特别贷款，就是在深井出访国外期间开始的。深井作为正统派银行家，对井上这种政治性的特融有着强烈的反感。深井大概认为，井上是靠扭曲日本银行的政策才在财界取得地位的。而当这个井上要推行解禁政策之时，深井却不得不以日本银行副总裁的身份予以辅佐。况且此时如后文所述，深井对恢复金本位抱有相当深刻的疑问，就更是如此了。

作为政治家登场

姑且不论这些，在结束日本银行总裁和大藏大臣的任期之后，井上一度下野，忙于“为财界奔走斡旋”。大企业间的合并问题、台湾银行的清理、董事人事的撮合，井上虽已是下野之身，工作却很多。1927年田中内阁成立时，井上曾被拟任为大藏大臣（一说为外

务大臣)，据说他从旅途中打电报推辞道：“紫云英不堪充壁龛之饰”（山下龟三郎《浮沉之间》）。就这样，井上越来越深地倒向政治。这固然是因为政界期待他的手腕，但同时井上自己也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恐怕也是事实。井上在野期间就任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理事长；金融危机后他只干了一年就辞去日本银行总裁，也是因为他不愿长留金融界，事先同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言明只干一年才就任的。在这期间，井上与民政党的江木翼等人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

有关这段经过，后来出任滨口内阁内务大臣的安达谦藏这样写道：

“一旦大命降下，由谁出任大藏大臣便是大问题。在党内物色，没有合适的人物，滨口也没有合适的候选人，我暗自为此苦恼。有一天我向滨口进言，起用井上准之助如何，滨口也大致有同意之意，于是我某日在热海山下龟三郎的别邸与井上会面，交换了几个小时财政上的意见，确认他对解禁也表赞同，随即报告了滨口。其后滨口也亲自直接与井上见过面。原本井上是解禁反对论者，到此却幡然改变了主张（此事我后来才详知），财界一方也屡屡攻击其反复无常之处。总之，关于推举井上为藏相，内中有以上经过，附记于此。”（《安达谦藏自叙传》）

井上一入阁就加入民政党，鲜明地亮出了作为政治家的旗帜。

当时的井上，似乎为这样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所支撑：解禁迟早非做不可，而当今政治家中有此力量的唯我一人。他毋宁说是主动求任藏相的吧。

然而井上此前从未主张过解禁立即实行论。他的说法是，解禁是必要的，但实行之前需要相当的准备。实际上在1929年7月1日的《钻石》杂志上，井上还曾这样说过：

押注立即解禁

“……断然立即解禁，商品行情将发生急剧变动。眼下已跌至四十四五美元的汇率骤然恢复平价，进出口商品便要相应下跌。这样一来，一部分人就要大亏。这也是令人不忍的。即使汇率恢复到同样的程度，只要多花时间，商品跌价的损失就能广泛分摊，苦痛便会减轻。以生丝为例，若立即解禁，就只有囤进了大量蚕茧的缫丝业者承担其损失。而若让汇率逐步恢复、然后再行解禁，汇率恢复所造成的损失就由养蚕家、缫丝业者和横滨的批发商分摊。所以苦痛较轻。作为政治家，必须尽量把苦痛减轻。”

此前筹划解禁的片冈藏相，想在解禁之前清理濒临倒闭的银行，结果引发了金融危机。

“癌虽因此切除了，身体却极度衰弱。值此当口，立即解禁那样的猛药使不得。……理应暂且等待身体恢复。”

井上的主张，听起来是说马上实行解禁是办不到的。而正是这个井上，一当上藏相就宣布实行解禁，并于次年1930年1月将其付诸实现。井上常回答说：他是在当上藏相后用半年时间做了准备，所以在野时期的言论与作为藏相的政策并不矛盾。形式上或许确是如此，但正如安达所说，在对当时经济实情的判断上，在野时期的井上似乎要悲观得多。排除这一切，向解禁猛进，其中正有着从银行家变为政治家的井上的一场豪赌，这样说大概不错。

2 解禁的准备

准备从削减预算着手

7月8日，滨口内阁发表了“十大政纲”。其中除刷新对华外交、促进裁军之外，还包括解禁、整顿紧缩财政、不募债与减债、确立社会政策、改善国际借贷、改正关税。解禁的实施至此确定，井上立即着手准备。

第一，1929年度预算虽已在实施之中，仍立即进行了削减（编制执行预算）。执行预算总额为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比当初预算节约九千余万日元。当时众议院中在野党政友会占多数，一旦召开议会自然没有胜算，政府就以权限在我为由，独断实行了削减，在政治上成了大问题。接着政府又计划官吏减薪：月俸超过一百日元者约减一成，低薪者减薪率更低。减薪所节约的预算不过七百万至八百万日元，但政府的盘算似乎是要借此作一场消费节约的示范。对此，各省官僚齐声反对，司法界的法官、检察官发起集体抗议行动，商工省则由年轻事务官岸信介带头，事情闹到这等地步，政府终于不得不将其撤回。不过，减薪在1931年5月再次提出，并付诸实现。

政府打的下一手是补充海外正货。滨口内阁成立时，海外正货为八千二百万日元。于是政府利用夏秋之间贸易转为出超的机会，让正金银行大量买进美元和英镑票据，到11月已握有三亿日元。同在11月，经财务官津岛寿一之手，在英国和美国设定了一亿日元的信贷额度。这是一项契约：此后一年间，政府可视需要在一亿日元范围内向英美金融业者借款。这是为实行解禁后不致立即陷入不得不把巨额黄金运出国外的窘境而做的准备。

为解禁宣传的全国巡回演讲

然而，解禁的另一项准备，是让企业和国民彻底理解解禁的意义，争取国民对政府施策的理解。井上藏相以下民政党干部到全国巡回演讲，力图把解禁普及到国民中去，并贯彻到底。据说井上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讲演时，喝彩声几欲掀翻屋顶，甚至有人计划把井上抛举起来。然而井上演讲的内容与人气相反，相当严厉。1929年9月刊行的井上的小册子《国民经济的重建与解禁》，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财政年年赤字。企业和家庭也同样，收入减少了就理应相应地节约支出，却依旧过着过去的奢侈生活。要重建经济，首先必须节约财政支出、减少公债。进而，日本还有解禁的迫切需要。由于禁止黄金出口，我国汇率偏低，汇率的波动给经济带来恶劣影响。然而要实行解禁，就需要相应的准备。

“那么准备是什么呢？政府紧缩财政，国民理解这一态度，也节约消费、振作自律起来，于是物价自会出现下跌的大势，进口也减少到相应的程度。这样一来，汇率便一路上升。……在汇率升上来的时候实行解禁，解禁本身就不会对财界产生任何影响。”

这个议论里有个陷阱。政府、财界、国民全都节约，社会需求自然减退，发生不景气是显而易见的。井上对此只字不提，只说做好准备再行解禁就对财界没有影响。解禁本身或许不会带来不景气，但他没有触及的是：解禁的准备会带来不景气。连井上尚且如此，为宣传解禁政策而奔走的执政党宣讲队中，更有许多人宣传说只要实行解禁，好景气就会一举到来。诚然，东京股票市场在解禁声明的同时已经暴跌，商品行情也在低落，景气后退已经很明显，但一般人中不理解解禁理应带来的不景气的人也很多。

经济问题成为内阁的最高政策，是明治以来的头一遭，其展开的宣传活动足以媲美远在其后的池田内阁收入倍增计划的造势运动。与之并列的主要政策，是使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取得成功。总之，滨口内阁以解禁与裁军两大政策为支柱，开始推进其政策。

3 解禁赞成论

财界主流的正统派意见

解禁政策就这样推进下去，各界对此反响如何呢？赞成论与反对论自然交错纷纭，下面试看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当然，世人谁都想依附权势，反对论为数寥寥，本在情理之中。

先说赞成论。赞成论细分起来，似可分为三类。第一，财界主流的赞成论。这里引用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和三菱银行的山室宗文的意见。这两人同处财阀银行的中枢，对金融政策的发言权极大。山室在 1928 年 1 月的论文《金融界当前的诸问题》中这样说道：

“我们倡导解禁，无非是使我国经济界脱离人为的不自然状态，恢复并稳定汇率，按照贸易及其他工商业交易的实际需要调节通货，求得物价稳定，把财界置于巩固的基础之上，以期我国产业的发展。”近来入超的幅度也在缩小，正货外流之虞减少，汇率虽有恢复，财界所受的打击也并不很大；金融危机的结果，不良金融机构的清理已经完毕，银根趋于宽松，也有助于缓和解禁的冲击。可以说，山室的主张极具正统派色彩，并且对解禁的冲击持乐观态度。

（山室宗文《我国的金融市场》续编）

池田成彬自 1929 年春起赴欧美旅行，在旅途中获悉解禁的决定。当时三井银行在金融危机后存款虽有增加，却苦于找不到适当

的投资对象。据说池田此行正是要亲自考察欧美金融市场以研究对策。池田这样回忆他在伦敦会见米德兰银行麦肯纳时的谈话：

“麦肯纳握着我的手说：‘听说你在日本金融界很有影响力，尤其在三井……是小鸟悄悄告诉我的。’接着他回答我的提问：‘日本何必急于解禁？没有这么急的必要吧？其实英国就是因为急于解禁而失败的。’我便说：‘不，日本若不赶紧解禁，汇率不稳，妨碍产业发展，令人为难。’他说：‘政府自己买卖外汇使其稳定即可，政府也未必就会亏损……总之，日本应当把汇率稳定在四十九美元再解禁，否则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他是这么说的。”

（池田成彬《财界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麦肯纳的这番忠告，与津岛寿一从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和摩根商会那里得到的忠告如出一辙。

然而池田并不完全赞同这个意见。11月回国时，“藏相井上准之助来访，……说：‘其实就等你回来。欧美对日本解禁怎么看？我想听过欧美的情形之后再公布何时实行。’我就说：‘美国和英国都不大把它当问题，只有麦肯纳先生是如此这般的意见。’把方才那番话讲给他听，又介绍道：‘另外我在纽约见到拉蒙特先生（摩根商会的代表），他说政府若在纽约的银行备好信贷额度、做好黄金外流的准备，解禁也无妨。’然后我说：‘日本若实行解禁，我们银行愿予协助。’次日或第三日，便决定于次年1月实行，这就是当时的实情”（池田，同上书）。井上藏相特意登门相商，足见当时三井银行与池田成彬的威望。

池田原本就是东西两组合银行决意实行解禁的发起人，自然是赞成解禁的。“当时在外资金虽有减少，国内还握有九亿或十亿，所以我的意见是：若不借这个机会断然清理整顿财界，日本的产业就要完了。……日本银行在总裁的讲演里大谈警戒论，可它的真实心

思并没有同政府敲定一致，一到紧要关头就拿出救济资金来。这样搞真正的清理是搞不成的。我们赞成解禁，就是主张：政府也好日本银行也好，该出的出完之后就给我真正收紧，实行与之相配的金融政策，先让大家苦上一阵。这样生产成本也会下降。由此重新起步，日本经济也会复苏。——就是这样的想法”（同上书）。在这里，池田虽不像山室那样乐观，但同样主张正统派的意见。

期待强化垄断的财阀

不过，事情恐怕不止于此。山室和池田对解禁理应带来的不景气恐怕都有所预料。然而三井、三菱的根基稳固，不必担心由此危及自身。反而，若不景气下不稳定的企业倒闭，大财阀的垄断地位将得到强化，视情况还可能将其吞并。或者，解禁使汇率稳定之后，也更容易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发现投资机会。在主张解禁之际，这些考虑不可能不曾掠过大银行领导者的脑海。至少，大银行预见到解禁不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并在此之上罩上一层正统派经济理论的面纱，才赞成了解禁。

当时，无论学界还是新闻界，都盛行使用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词。不过，这个词的含义是否照希法亭所用的那样被理解，却是个疑问。在希法亭那里，“金融资本”指的是金融与产业的勾结乃至一体化。德国的银行深入参与产业设备投资资金的融通，不仅放贷，还介入股票、公司债的募集乃至人事，其结果，银行的命运与产业的盛衰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就日本而言，大银行同样对产业进行长期贷款，而且在部分领域，也存在着产业的盛衰直接关系到银行命运的状况——这一点从前述台湾银行与铃木商店的关系即可明了。不过，台湾银行是特殊的例外，日本的银行并未像德国那样深入产业，而且银行的领导地位比德国更强。产业命运系于银行的

一个态度，而银行因此动摇的情形相对较少。像金融危机中被清理的十五银行、渡边银行那样，董事向自己关联的企业融资的“机关银行”另当别论；在包括财阀系在内的当时五大银行中，除对电力行业的长期沉淀贷款外，这种倾向很少。

因此，在慢性不景气之下，五大银行的地位极大提高。存款源源而来，经营基础牢固，产业的命运系于银行的一个判断。新闻界风行一时的“金融资本的横暴”一语，指的正是这种银行的优越地位及其干涉产业界的事实。

所以可以说，在日本，“金融资本”所指的并不是金融机构与产业的勾结或一体化，而是金融机构对产业的单方面支配，抑或拥有那种力量的大金融机构本身。这种意义上的日本型“金融资本”以产业界的整理与合理化为目标而赞成解禁，畏惧于此的产业资本则起而反对——把它看作这样一个图式，大约也能成立。

学界与新闻界的赞成

解禁赞成论当然不止这些。学界的绝大多数站在正统派理论的立场上表示赞成。新闻界也是一样。前述反对解禁四人组中的小汀是中外商业新报的记者，但该报社论也赞成解禁；山崎靖纯依托时事新报反对解禁，结果被赶了出来，只得转投读卖新闻。

不过，这些赞成论的特征在于，无不依存于古典的金本位制逻辑，止于理念性的主张——这一点不容忽视。虽有“理当如此”的主张，却对实现过程中伴随的困难和对产业的种种影响几乎未加分析。

4 解禁反对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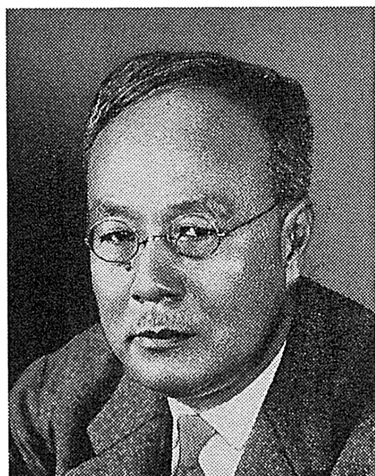
转而反对解禁的武藤山治

反对解禁的意见，除已述的石桥、高桥、小汀、山崎四人组的新平价解禁论之外，还有几个流派。与四人组见解最接近的，是曾热烈主张解禁的武藤山治的意见。武藤在阅读石桥、高桥见解的过程中骤然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这一变化大约发生在 1929 年 8 月前后。例如同年 9 月，武藤在《寄望于滨口首相、井上藏相》（《经济往来》1929 年 9 月号）中这样说道：

“井上藏相在就任藏相前不久不是还说过吗：汇率剧变会给一部分贸易商带来巨大损失，汇率恢复应当逐步进行；金融危机之后衰弱犹存，立即解禁的猛药使不得。又要紧缩财政，又不减税，还要节约消费——其结局，显然是欺压中产以下的穷人，把他们充作立即解禁的牺牲品。”

武藤又在另一篇论文（《势力的均衡与群众》，《经济往来》1929 年 11 月号）中这样说道：

国际收支问题、黄金外流、利率、不景气等经济问题，靠解禁不是解决不了吗？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维持金本位也很困难。只要国内产业和物价、利率的状况得不到改善、国际收支的均衡不能实现，解禁之后黄金就会外流，从而愈发需要消费节约政策、通货收缩和提高利率。其结果，工商业愈加萎缩，生产缩小，成本上升，出口愈加困难。“依我看来，政府这样的解禁，……是所谓政治家的生意，而不是国家的生意。借这次急速恢复金本位而得利的，只是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即那些在欧战中及其后的通货膨胀时期蒙受的损失，能在即将到来的通货收缩时期得到填补、甚而获利的人。与此相反，受害



武藤山治

最深的，是占国民多数的中小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以下的国民。这样的国家大消费阶级困顿不堪，国家的实业是无从振兴的。”

这里展开的武藤的逻辑，夹杂着对井上藏相由来已久的反感，略显感情用事，但在对后来事态的预见上并没有错。

实业界也因不景气的现状反对

另一股根深蒂固的反对论，来自苦于不景气的产业界。例如时任富士制纸社长的大川平三郎，就极力鼓吹反对解禁的意见。依大川之见，要改善国际收支，必须发展出口产业。民政党内阁的解禁声明早了约五年。要在五年之内使入超国转为出超国，首先必须实现铁与肥料的自给，并谋求麦类增产、消除外国大米的进口。这个议论明显带为本行业谋私利的味道，但可以说它显示了当时产业界代表者的危机感。

同样的解禁为时尚早论，也由日本钢管的董事今泉嘉一郎提出过。这类见解在其他一些行业也能听到。在这种场合，反对解禁者大多与本行业的利害紧密相连，因而难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作为从理论上论述反对解禁者，财界人士中除武藤之外还有各务镰吉。各务时任东京海上火灾会长，是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其地位在世界上也很高，分析力也远超当时的财界人士。他在 1929 年解禁公布前夕写下《解禁之辩》，试图判断解禁的结果会发生什么。其要点如下：

解禁之后，进口将增、出口将减。在禁止时代的条件下形成的经济界将受到整顿和调节。迄今所进行的整理是以低汇率为前提的整理，解禁之后还要按解禁后的汇率进一步整理。工资和房租理应下降，但那也要经过相当的“争议期间”之后才会实现。企业和财政也不得不收缩。这样不景气将持续下去。不景气持续，资金需求转趋疲软；若海外利率上升，“如水之就下，资金自然呈现流向海外的倾向”。过去的国际收支赤字靠外债支付，若今后不依仗外债，黄金外流恐难避免。

在以上条件下，各务作出如下预想：物价、工资低落，事业缩小，利润停滞，财政紧缩，那么“万事万物为维持通货制度都难免一时的紧缩”。“此一时之紧缩为期几何，须待国民的自觉自制与努力勤勉方能知晓，但至少须以三年为一期：最初三年是受难试炼的时代，其次三年是靠努力勤勉方始望见前途光明的时代，再次三年才是产出光明成果的时代，只能迟迟缓步而进”。（以上铃木祥枝编《追怀各务镰吉君》）

所以，解禁无异于外科手术，必须做好为此付出牺牲的觉悟。不景气的结果还会发生劳动争议，失业者恐怕也会“变成作为破坏性分子而堪忧的流浪之徒，使社会秩序恶化”。法国靠 1928 年的下调

平价稳定了经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也是如此。然而我国的经济本来就是生产没有增长而提高了消费水准，所以即使下调平价，困难恐怕依然存在。总之，现状绝不容易，币制的整顿非做不可，但也要有觉悟：随之而来的困难同样巨大。

各务的议论在当时财界人士的议论中显示了最深的洞察力。各务并不说反对按旧平价解禁，但力陈其冲击之大，暗中寄寓了反对之意。

表现出消极反对的深井英五

深井英五则出于其立场，以极为慎重的措辞述说解禁的困难。

“要以缜密的计划进行坚实的经济活动，汇率保持稳定是所希望的。为此解禁是必要的。再者，解禁也会成为使人心收敛整肃、转向健全方向的诱因吧。

然而其影响，至少一时会给财界的某些方面带来苦痛吧。若出于对我国经济界现状莫名的不满，以为做点别的什么试试局面就会好转，从这种朦胧的感想出发而寄望于解禁，又期待当局总会对其影响设法处置，那么这终究只能说是轻薄的侥幸心、依赖他力主义的持续和发展。我相信不会有这种事，但若万一有之，则非我所能苟同。”（深井英五《作为通货问题的解禁》）

深井也预想到解禁会给经济界带来非同小可的影响。出于其立场，他在不表明赞成与否的情况下，于1928年12月在大阪作了上述演说。

与财界人士感觉不相容的政治家判断

各务和深井的判断，井上不会不知道。他大概也未必像前述山室那样，对解禁的结果持乐观看法。重要的是：即便对事实的预见

没有大的分歧，对由此产生的政策效果的判断，井上与各务、深井却有所不同。对井上而言，未必是解禁的冲击越小越好，毋宁说他希望借其冲击使财界重组、实现“合理化”，这恐怕正与金融界的见解相一致。不妨认为，借不景气把不健全的经营和落后的企业整理掉的整肃财界论，就在井上的念头之中，这也不算牵强。在背后推动它的，是池田、山室那样的财阀银行代表；反对的，则是大川、今泉那样与财阀关系浅薄的产业代表。

还可以进一步这样想：各务和深井并未受缚于某种固定的思想——诸如财界该整肃还是不该整肃，或金本位是资本主义通货制度的唯一形态之类。在深井身上可以明显看到一种经济理论性的视角：把解禁的效果理解为“汇率的稳定”，从纯经济的角度考察政策的影响，测度打击的强度，再判断是否仍应断然解禁。

与此相对，已把解禁作为党的决议确定的民政党、作为在野党反对解禁的政友会，以及熟知内情而加入民政党的井上——在那里，居于首位的是政党的立场，纯经济性的考虑被排到了后面，至少可以看作不过是应予考虑的诸多问题之一。

经济政策既然是“政策”，就是政治的一个环节，不是单凭经济分析的考虑就能了结的。毋宁说，哪怕硬着头皮也要贯彻自己的主张，政治上的胜利就可由此夺得。哪怕勉强、哪怕不合理，政策得以贯彻才是政治家的生命；中途改弦更张，往往意味着作为政治家的自杀。比起冷静的分析，强烈的信念更容易博得满场喝彩，也更合乎大政治家的姿态。

高桥是清的回想

于是就有了接下藏相的井上拜访高桥是清时的一段逸事。高桥是清当时已经引退，很少论及时局，但他曾是政友会总裁，若有人

请教，他就力陈保有黄金的重要性，表明内心的反对。高桥在井上进入日本银行后不久出任副总裁，是提拔这位才子的人。所以金融危机善后时高桥出任藏相，也把井上安排为日本银行总裁。然而就在滨口内阁成立前的一两天，井上去拜访了高桥。高桥这样回想当时的情形：

“‘同滨口君一谈，为匡正现今的财界，必须靠紧缩政策狠狠逼迫，实行解禁——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所以我决定接受大藏大臣’，他来向我报告。我只是听了听原委，但在分别时对他说明：‘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贯彻自己的信念，你固然打算排除万难前进，但切不要忘记走正确而笔直的道路。’”（高桥是清《随想录》）

仍在政坛一线的政友会成员当然力陈不景气将会加剧，反对解禁政策。然而其声微弱，被政府的宣传运动淹没了。

5 解禁的实施

与解禁同时开始的黄金外流

1929年11月，政府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起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原本1917年决定禁止黄金出口时的依据是大藏省令，这次也只需废除这道省令即可，手续极为简单。若改为按新平价解禁，则必须修改货币法，须经国会审议。据说政府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按旧平价解禁，也有这种应付国会的盘算。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1931年1月1日到期的二亿三千万日元英镑公债借新还旧的时期迫近，也是急于解禁的理由之一。无论如何，民政党内阁是赌上自己政治生命来推行这一政策的。

1930年1月11日，政府照声明实行了解禁。前一年秋天的10月，纽约股票市场已经上演了大暴跌。此前夸耀“永远的繁荣”的美国经济，骤然蒙上了阴云。然而没有任何人察觉，这场暴跌正是此后延续数年的大萧条的开端。当时政府认为，纽约利率因股市暴跌而下降，将引起世界性的利率下降，因而即使实行解禁，我国资金因利率差流向国外的危险也减少了，甚至为此感到高兴。所以美国的不景气也完全没有成为变更政策的理由。

然而，刚一实行解禁，黄金的外流就开始了。

在国内把纸币换成金币的人寥寥无几，但国内外银行委托日本银行出售海外正货的却很多。据说其理由是为了偿还国外借款。解禁前在汇率低的时候卖出美元，解禁后在汇率高的时候再买回美元，仅此即可获利。这与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购买美元”是相反的手法，但无论如何，无疑是借解禁大捞了一把。口头上说道义上支持解禁政策，却立即发生这种事，暗示了政策实施之难。（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

半年即达预想两倍的流出额

既然实行了解禁，就无法拒绝黄金的出口和海外正货的出售。为了让政府的政策成功，而要求人们放过获利的机会——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行不通的。

1930年1月至5月，外国银行兑换了一亿二千三百万日元，加上其他要求，合计一亿九千六百万日元的纸币被换成了黄金；同一时期正货流出达二亿二千万日元；另外1月至3月海外正货的出售达六千五百万日元。这些黄金及海外正货的流出，不仅是投机所致，也因为解禁后汇率稳定而增加了进口。据说解禁前银行方面预计黄

金及海外正货的流出为一亿日元乃至一亿四千万至一亿五千万日元，而实际上解禁后半年之内，流出了接近其两倍的金额。

当时政府隐瞒了这一状况。议会在解禁刚过的 1 月 21 日解散，2 月 20 日的大选中，执政党民政党获得二百七十三席、政友会获得一百七十四席，民政党大胜；在此期间触及解禁的影响自然是禁忌，还屡屡有人作解禁将使景气好转的演说。然而其影响不久就不得不表面化了。

6 大萧条

给“永远的繁荣”泼冷水

1929 年秋发生于美国的大萧条，急速扩大到全世界。而且这场大萧条与以往不同，景气下跌的时期极长，美国的不景气触底是在 1933—1934 年。以往的危机最长一两年就触底、景气恢复，所以事态不能不说是异常的不景气。下面试就美国的情况稍作考察。

其综合性数字如表 2 所示，陶醉于“永远的繁荣”的美国经济被抛进了深不见底的不景气之渊。大萧条发生时，谁都以为不过是常见的衰退，无须担心。然而过了 1930 年进入 1931 年，景气也全然没有恢复的迹象。尤为惨重的是农业：大萧条以前就在下跌的农产品价格，到这一时期更是被摔打般地下落，种出来的西红柿，运往市场的运费比卖价还高，蔬菜只能烂在地里。

表 2 美国大萧条的各项指标

	1929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7 年
失业率 (%)	3.2	24.9	21.7	14.3
农产品以外批发物价指数 (1926 年=100)	91.6	71.2	78.4	85.3
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 (1926 年=100)	104.9	51.2	65.3	86.4

(续表)

	1929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7 年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 (1929 年价格)	857	590	639	846
出口 (100 万美元)	5,441	2,061	2,202	3,407
进口 (")	4,755	1,706	1,703	4,807
企业倒闭率	10.4	10.0	6.1	4.6

注) 倒闭率: 30 年 12.2%、31 年 13.3%、32 年 15.4%
U. S. Dep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银行倒闭接连不断，一朝失去全部财产而流落街头者层出不穷，也出现过动向不稳的暴徒群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要求预付将来才支付的抚恤金，进军华盛顿包围国会，拒不散去，最后闹到军队出动。产业界的停滞极为显著，倒闭者相继。据说连福特公司这样的美国代表性企业，在三十年代也几乎连年亏损。尽管不景气日益深刻，共和党的胡佛政府却几乎没有拿出像样的对策。财政支出即使在不景气之下也几乎没有增加。大萧条发展之中，企业投资锐减，失业者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若财政规模与以前无异，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顶住有效需求的减少。然而胡佛政府囿于厌恶增税和政府干涉实业界这一共和党的传统政策，无法打出新政策。直到不景气深刻化的 1933 年，民主党的罗斯福掌握政权，才断然实行新政的积极政策。

在全世界肆虐

美国的这种状况波及欧洲是理所当然的。如前所见，美国资金流入德国，德国以此支付赔偿，英法也以此偿还欠美国的债，这就是二十年代国际金融的机制。美国陷于大萧条，开始抽回资金，德国立即受到影响，好不容易走上复兴之路的德国经济一转而被卷入不景气。倒闭与失业相继，排除极右与极左的中间派政权失去根基，

纳粹与共产党的势力急剧壮大起来。德国的这种状况当然也波及英国和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金本位机制，把各国卷入了惨烈的大萧条。为慎重起见，且看各国生产的动向。程度虽有差别，各国的生产都大幅减少，被视为例外的只有荷兰。而据这个指数，日本受大萧条的影响也不能不说是最轻微的一类。欧洲受影响最剧烈的是德国。

表 3 欧洲各国生产指数（1938 年=100）

	1929	1931	1933	1935
英国	109	95	90	97
法国	117	105	95	94
德国	82	60	57	71
意大利	85	70	63	72
比利时	98	93	84	88
荷兰	83	94	88	86
瑞典	92	60	38	81
挪威	62	39	56	70
日本	48	51	59	79

注）据 OCED: “Industrial Statistic”（日本为盐野谷裕一推算）

作为大萧条的对策，各国选择的都是紧缩财政、通过生产合理化扩大出口。各国认为，在袭来的不景气中，既然海外投资不断被抽走，应对之道唯有自力更生。然而在生产已经缩小、失业者正在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和国民若进一步节约、裁减人员，社会需求将愈加缩小，短期内不景气势必加深。这是当时各国同样苦恼的矛盾。早早扩大财政支出、防止大萧条深化的，只有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权。就这样，大萧条在全世界肆虐。如后文所见，国际金本位制终将在其中被放弃；但在其初期，大萧条的深刻性尚未被理解。它固然是一场激烈的危机，却被认为终究不过一时的动荡，没有人想到它会带来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日本的民政党政权，在解禁后的

不景气已很明显之后，仍以熬过这场不景气就能开启光明的未来为由，继续推进其政策。

第三章 大萧条下的日本

1 产业合理化

合理化的烽火来自美国

1930年1月，在实施解禁的同时，政府设立了临时产业审议会，又以商工省为中心设置临时产业合理局，试图推进产业合理化。

所谓“产业合理化”，原本是指发端于美国的、为进行大量生产而改善和改良生产体制的做法。泰勒制和福特制堪称其代表性的例子。例如福特制，从汽车零部件生产到组装，全部工序都由连续不断的流水作业完成，汽车生产效率大幅提高。高效率、高工资是福特的口号。

在这些事实的刺激下，合理化运动在战后的德国也兴盛起来。当时德国的合理化运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改善：第一，统一工业产品的标准规格；第二，改进作业流程、研究作业时间、按工序使生产效率均衡化等；第三，消除动力浪费；第四，充分利用研究成果与机械；第五，改革经营组织；第六，节约因盲目竞争及消费而产生的成本；第七，作业的专业化；第八，节约劳动力。由此，一场主张我国也应学习这一先例的全国性宣传运动开始了。

然而在德国，除上述本来意义上的“合理化”之外，以排除竞争、抑制过剩投资、维持销售价格为目的的垄断组织，其形成也在

显著推进。联合钢铁股份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 A.G.）是其代表性的例子，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企业超过七十家，除克虏伯外，网罗了德国的主要炼钢公司。另一个例子是以染料为中心的化学工业中的 I.G.染料工业股份公司（I.G. Farbenindustrie A.G.）。I.G.是以巴登苯胺苏打公司为首的六家大企业合并而成的托拉斯，其触角不仅遍及化学工业全领域，甚至伸到轻金属和人造石油。然而，通过企业合并来建成托拉斯或康采恩并非总是可行。卡特尔趁机得到了强化。到二十年代后半期，钢铁、染料、煤炭等行业产量的 90% 以上，电气机械、电力、海运等行业产量的 80% 以上，都被置于卡特尔的支配之下。

临时产业审议会的答复

德国的先例成了临时产业合理局的基本参照。生产流程合理化自不必说，还必须按各个产业推进企业合并与卡特尔化；这种想法被置于当时合理化政策的中心。

例如，临时产业审议会答复说，官营八幡制铁所与民间主要炼铁公司有必要实行大合并。此外，政府还向该审议会询问：既然似乎有必要“对我国产业各部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加以统制，使之在当前的平时经济之下能够经受住国际经济竞争”，并“促进各种产业中企业的合并、联合，对中小企业加以适当的统制”，那么应对哪些产业施以何种统制才好。对此，审议会答复如下：“鉴于我国产业界极其无统制的实情，此时谋求企业统制的彻底，最为紧要。而谋求企业统制，首先应把重点放在生产者身上，宜依靠其同业者的组合团体或协定。……然而，作为当前我国产业合理的方策，仅靠修改该法律（《重要出口品工业组合法》）尚有不足之处，为谋求重

要产业的统制，作为临机应急的措施，亟须新制定一部关于一般统制的法律。”

借助这一声势，1931年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这部法律不是通过企业合并，而是通过卡特尔来达到上述目的，其特色在于：政府指定的重要产业（纺织、钢铁、水泥、制糖、制粉、造纸、电石等）结成卡特尔时须向政府申报；必要时，政府还可强制未加入卡特尔的局外企业加入。政府试图以法律为后盾，通过卡特尔压制企业的自由活动，取得产业统制的成果。

相继结成的卡特尔

应对不景气的卡特尔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说1932年主要行业的卡特尔有八十三个，其中四十八个是1930年以后结成的。这里举几个卡特尔的例子。以机制纸为例，在1930年以后的不景气中，各公司停止三成五的生产，实行限产（操短），但市况毫无好转。到1931年末，操短率竟达五成五这一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从1931年初起，各公司就根据价格协定封存库存以谋求提价，但受来自加拿大、瑞典一带的倾销影响，价格还是垮了下来，各公司被逼到利润几乎为零的地步。

水泥行业也有类似问题。这一产业从昭和初年起就急剧扩张设备。企业实力比较接近，竞争十分激烈；技术进步迅速，采用新技术者占据优势；再加上过去需求增长迅速，业界掉以轻心。这些因素叠加，导致了急剧扩张。大萧条发生后，销售卡特尔先是在地方层面、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严格实行生产限制，最终甚至缔结了禁止一切设备扩张的协定。其效果也显现出来：尽管供需关系在恶化，水泥价格仍从1931年1月的三日元十七钱，逐步抬高到11月的三日元八十钱。

另一个特殊的例子是硫酸铵。大战以后，采用战后欧洲发展起来的卡萨莱法、克劳德法以及东京工业试验所（东工试）法的工厂接连新建；即使在大萧条之下，硫酸铵产量仍在增加。然而在这一时期，以德国 IG、英国 ICI 为中心的国际氮卡特尔试图向日本市场倾销，硫酸铵市价急剧下跌。为此，日本的三大厂商组成氮协议会，与国际卡特尔的代表赫尔曼·博施谈成了协定，但因其中含有抑制日本硫酸铵出口、每年进口二十万吨外国硫酸铵、阻止日本国内出现新企业等屈辱性条件而未能正式签字；次年又以较为缓和的条件达成了为期三年的协定。与此同时，业界在国内也结成卡特尔，努力维持价格，结果国内行情暴涨。也就是说，价格从 1927 年的每吨一百二十六日元，变为 1929 年的一百日元、1930 年的九十日元、1931 年的一百二十一日元、1932 年的一百七十日元。如此剧烈的价格变动，正是卡特尔效果的体现。

企业合并与裁员的浪潮

除卡特尔之外，企业合并也发生了若干起。六大纺织之一的大阪合同纺织并入东洋纺织、王子制纸确立对富士制纸的支配权等，是其中显著的例子。其中多数是财阀系企业吸收吞并非财阀系企业。谴责财阀横暴的声音也终于高涨起来。

与这种产业组织化并行，各企业也分别推进自身的合理化。为降低成本，最初采取的措施是裁员、压低工资。尤其在工人流动性很强的煤矿和纤维产业，这一倾向十分显著。

煤矿引进了长壁采煤法这一新生产方式。过去，长长的坑道像蜘蛛网一样布满地底，几名工人（多是夫妇、父母子女等）钻进狭小的采掘面，在承包的工棚或工头（纳屋头）的管束下低效率地采煤。如今，这种面貌焕然一新。首先，采煤地点集中到煤层条件有

图1 绵糸 生産額・職工数・生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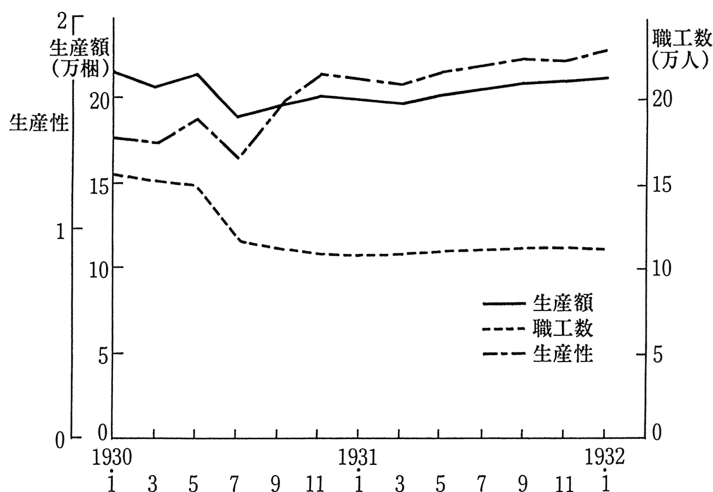


图1 棉纱 生产额·职工数·生产率

利的采掘面，众多工人在长长的采掘面上一齐作业的长壁式采煤变得普遍。随之，坑道也经归并裁撤，总长度显著缩短。在这一时期，对工人的管理也几乎全部改为公司直辖，劳动生产率大增。

自1929年禁止未成年人和妇女下井以来，这种变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坑内作业也从此时起加快机械化。采煤由一把镐头改为使用炸药和采煤机械，坑内搬运也从人力改为溜槽，进而转向皮带传送机。这种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煤矿产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没有明显增加，但工人人数大幅减少，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棉纺织业也是如此。恰在前一年，一再拖延的工厂法开始施行，妇女的深夜劳动遭到禁止；以此为契机，棉纺织业也到了应当大幅改良生产技术的时期。由于在不景气下实行限产，产量必须减少，人均生产率则必须提高。长期停滞的纺织技术也终于开始更新，引入精纺机的高牵伸化、标准动作与作业研究、恒温恒湿设备等新技术。

率先迈出这一步的是当时新兴的吴羽纺织，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然而，仅靠技术合理化终究无法完全应对不景气。进入 1930 年以后的不景气期，各公司首先削减工人，推进裁员与工资下调。以传统温情主义标榜劳资关系圆满的钟纺淀川工厂，也正是在此时发生了后文所述的大罢工。从图表（图 1）也可以清楚看出当时合理化的猛烈程度。即使各工厂没有像钟纺那样爆发大规模罢工，也都采取对离职者一律不予补充、大幅压低新录用者工资等办法，努力降低成本。

连比较稳定的煤炭和纺织业尚且如此，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事态就更加严峻。在机械工业和钢铁业，企业接连倒闭；没有倒闭的企业也只能靠裁员、减资应对不景气，已是竭尽全力。我国的合理化运动，看起来简直成了裁员的代名词。

（注） 据梅村又次编《农林业》（长期经济统计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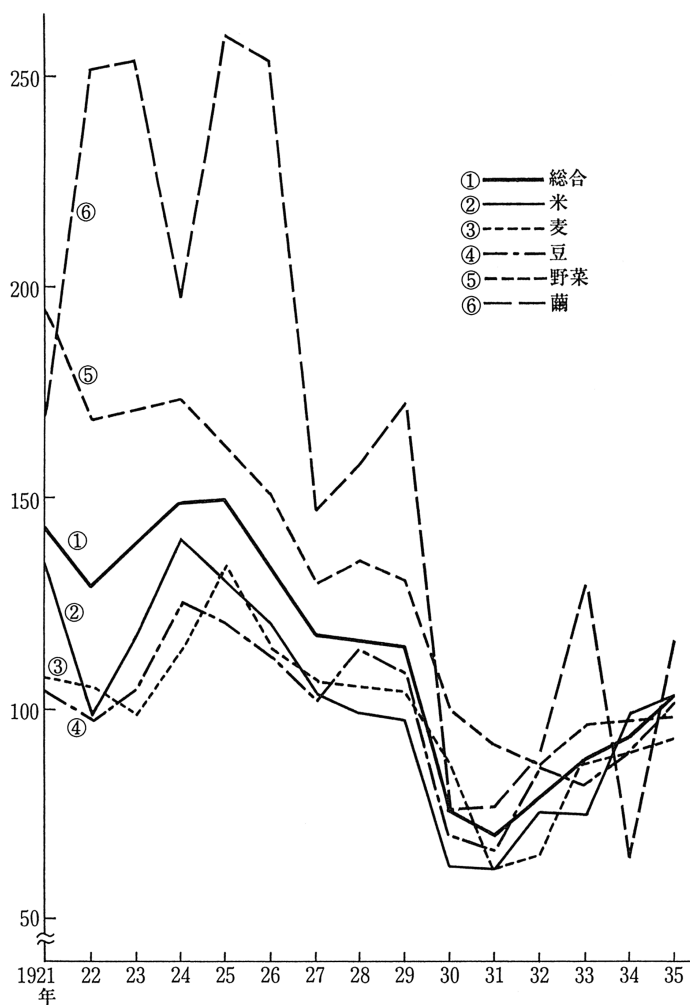
2 农村的穷困

跌价与增产的恶性循环

因大萧条而陷入最悲惨境地的是农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产品价格长期持续低落，农家为避免收入因此减少，反而持续增产，结果跌价愈发严重，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持续。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农产品过剩，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日本的农产品中，除蚕茧外具有国际商品性质的很少，但一旦外国米价格下跌，内地米价格自然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廉价外国麦和大豆的进口，也会压低国内价格。此外，自吸取 1918 年米骚动的教训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奖励外地（台湾、朝鲜等当时的殖民地）的稻作，采取从那些地区移

図2 農産物産地先価格指数(1934~1936年基準)



(注) 梅村又次編『農林業』(長期経済統計9)より

図2 农产品产地价格指数(1934~1936年基準)

入品质接近内地米的大米的政策。以朝鲜为例，大正中期的移入量约为二百万石，而到昭和初年，每年有五百万至七百万石移入内地。

图3 米と繭の生産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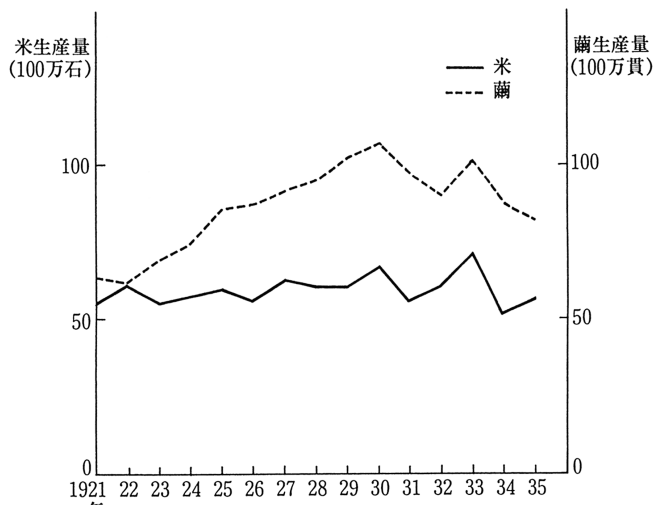


图3 米与茧的产量

这样，农业条件虽在不断恶化，政府却并未打算对此直接采取保护政策。当然，如果生丝商因生丝跌价而濒于破产，也曾出现设立收购机构加以保护的动向，但政府并未采用直接救济穷困农家的政策。

最大的受害者是养蚕农户

然而可以说，农业受到大萧条的影响最早。美国是生丝最大的出口对象，它被卷入大萧条后，生丝出口锐减，价格暴跌。农家因此遭到沉重打击。当时在野党政友会在攻击政府的宣传册《滨口内阁所推行的不景气政策的实相》中这样写道。虽有夸张，但即使打对折来看，其中所写的也是骇人的窘境。

“农村的穷困疲敝，已是无须再说的天下周知的事实。去年7月2日，一听到内阁成立的消息，米价便一下子跌了两日元，其他谷物、蔬菜等也随之如吊桶坠井般暴跌。加之解禁断然实施于美国不景气这一对我国生丝业而言最糟的时期，因此蚕茧价格跌破生产成本，每贯三日元六七十钱，有的地方甚至一日元八十钱，这是日俄战争时期两日元九十钱档、1915年欧洲大战时代三日元七十钱档以来的最低纪录。然而今年春茧产量为五千二百七十万贯，比去年增加四成二。本来没有其他现金收入途径的农家，越是不景气，而且土木工程之类的公共事业这一副业被叫停、那方面收入越是断绝，就越把劳动的余力投向养蚕，所以茧产量越发增加。为此茧价愈发低落，全国养蚕户二百三十万户，户均二十三贯，仅得七十日元上下；再扣除蚕种、木炭、桑叶费用，余额几乎为零，连工钱也出不来，结果等于白干……。

城市近郊的农村历来种植面向城市市场的蔬菜，获得比较宽裕的收入，但今年由于城市购买力锐减，蔬菜价格暴跌得完全不成话。从近郊装满一卡车运到市场，付了汽车钱之后几乎什么都落不进腰包；近郊农民半是自暴自弃地异口同声说，把长好的蔬菜就地埋掉当肥料还强些。”

农家的收入来源也与后文所述的失业有关。土木工程、打零工等副业收入减少了。由于纺纱和缫丝业不景气，女儿也无法再外出到工厂做工。为此农家多陷入赤字，负债也急剧增加。根据有关1929年现状的调查，每户负债据称约有八百至九百日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向摇会（赖母子讲）或高利贷的借款。在被债务折磨的农家中，不少人被逼入苦境，只得以数百日元预借款把女儿卖到花街

柳巷，充当为期数年的卖身佣工。与此同时，不带便当的学童和长期缺课的儿童等，也表明农村的穷困实在严重。小学教员是町村的雇员，其薪俸的来源是地方税。由于农家收入减少，接连发生地方税滞纳，结果有些地方发不出教员薪俸，有些地方还决定削减教员薪俸。

以这种穷困为背景，佃农争议也激化了。农民组合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最高潮，地主也团结起来组织地主组合，与之对抗。佃农争议的件数逐渐增加，并在这一时期达到最高潮；新潟县木崎村争议那样的历史性争议，也发生于这一时期。

以女儿卖身为代表的农村穷困，自然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青年军官参与政变始于1931年的三月事件，也大多出于这种朴素的正义感：他们在教育农村出身的新兵时，听到其出身家庭的窘境而心生同情，又觉得照此下去后顾之忧太大，无法建成强大的军队。

3 中小企业的危机

销路狭窄与融资匮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小企业显著增加。战后，在商业、重工业的分包关系以及出口杂货工业等许多领域出现了新企业，激烈的竞争反复上演。对中小企业而言，与产品销路同样迫切的是金融问题。

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在当时明显增加。以棉业为例，过去出口棉纱，从大战期间起，棉织物出口增多。其织物的生产者多为中小企业。被称为出口羽二重的丝织品和针织品也是如此。以爱知县为中心的陶器也是如此。玩具和杂货也不例外，罐头等食品的出口额也不可小觑。所以当时的出口甚至可以说是由中小企业支撑的。当然，这样断言也有问题。以棉织物为例，原料棉纱是大纺织公司的

产品，把它制成成品的最后加工才是中小企业的工作；但无论如何，依靠低工资工人的中小企业站在出口第一线，这是无可争辩的。

在国内，国民消费资料也依然由中小企业生产。当时的日本人还很少穿西服，几乎都以和服度日。无论是爱知县知多和大阪府南部的白棉布，还是前桥、桐生、伊势崎、八王子等地的铭仙，尾张一宫附近的毛织物，久留米、松山等地的絣织，以及西阵的御召等，几乎都是地方中小企业的产品。此外，味噌、酱油、酒等也几乎都是各地酿造业者的产品，龟甲万、山佐那样的大资本所占的比重还很低。在这些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有许多批发商介入。企业的流动资金也多靠批发商的预贷。增加了的中小企业，大体上是依靠不断膨胀的国内消费和出口才得以成立的，金融上依赖地方小银行和批发商金融等，但在这一时期被逼入了极度的苦境。

金融危机以后，地方银行的资金流向大银行，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充分融资，这是理由之一。随着银行合并的推进，小银行消失，中小企业在融资上就更加困难。大银行心存顾虑，不肯轻易向中小企业放款。再加上大萧条造成出口不振和国内需求锐减，中小企业遭遇了严重危机。前面引用的政友会宣传册举出几个实例批判政府的政策。

陷入危机的中小企业实例

例如西阵织物的情况。“西阵织虽是京都特有的产业，其疲敝之状令人不忍目睹。1921年高达八千二百万日元（七百六十万件），到1929年降至五千六百万日元（九百二十万件）。件数增加虽也有用人造丝的缘故，但足以知价格下跌之甚。……（1930年）三、四、五月因春季货品一度有活可做，六月以后逐渐不景气加深，产品价格仅及去年的六成半，倒闭者接连不断；即便不然，经营困难，虽略

降消费税标准价格，仍不堪重税负担，所谓弃业夜逃之多令人吃惊；从业者工钱，优秀职工最盛期每月三百日元（平时一百日元上下），本月已降至每月三四十日元左右。拖欠房租者不在少数，甚至耳闻子女做出不堪之事。”

大阪搪瓷铁器的情况。“我们的同业者，大阪、兵庫、三重一府二县合计有二十七家工厂和约八千名从业者。从业况看，去年为止每年出口七百万日元，今年如各位所见是火灭了一般的不景气，看作减半也差不离。上述出口额之外，内地需求每年约计二百万日元，但受如上影响，内地需求也遭减半的打击，价格下降了一成五至两成。然而前述二十七家工厂中八家已经倒闭消失，现在剩下的，要关闭又没有解雇职工的遣散费，可要关闭职工会闹事，只得无可奈何地被拖着，尝尽没落的悲哀。”

和歌山县黑江町漆器制造业的情况。“国内屈指可数的漆器原产地、所谓黑江涂的产地黑江町，从业户数约二千户，有二千四五百人从事此业。受到现政府节约消费、“别买东西”政策的打击，尤其解禁后的不景气极为严重。组合中也有以隔日停业谋求减产的，但就事业性质而言隔日停业几乎等于全休。因此产量减至上年的四成，金融途径完全梗塞，进入今年后货物完全卖不动。今年六月以来由町营实施失业救济土木工程，每天役使约三百人，但因原本是做家庭工业的技术工人，两个人拉一辆小车。目前让他们从事小学校园垫高地面、海岸填埋等土工，每天抽签决定上工，但再过二十天这项救济事业就将结束，之后的救济办法毫无着落，町当局者痛心不已。……融资困难自不待言，而由于前景看不到销路，批发商已完全废除预贷通融。一位师傅（制造业主人）最多拥有十五名工匠，因是专业技术人员，转业困难，必须保障其复业。”再举一例，爱知县知多郡的漂白棉布业者的情况。“做棉布漂白的是承包业，一

家之内雇入多数工匠以承包经营业务，但以今日的不景气，几乎全部处于失业状态。工匠与其他工人不同，按数年合同主要从鸟取县地方雇入，所以虽说没办法，也难以突然解雇。总户数虽有八十二户，但尽管有上述情形，完全废业者已达二十五户。好景气时代一百反以七日元左右承包，如今只能拿到两日元七十钱左右。一户使用十名左右工匠时，年收入曾有一万日元左右，现今不足其三分之一。日薪约八十钱至九十钱。现在计算原料，每百反需：漂白粉四十五钱、苏打灰十五钱、石灰五钱、食料三十五钱（每百反）、诸税十钱（每百反）、电灯动力十钱、消耗品费十五钱、煤炭四十五钱、晒场租金（柴年贡）四十钱、百反人工钱八十钱至九十钱，合计需三日元十五钱。而承包价只有两日元六十钱，则每百反亏损五十五钱。漂白业者解雇远地雇来的人太惨酷，所以尽量再困难也雇着；但若今日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终究顾不得许多，全部沦为失业者的一天终会到来。”

中小企业对策以卡特尔为中心

关于中小企业的不景气，还有许多例子。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在失业状态下维持生活。不能因为景气不好就不干了。也许有人弃业夜逃，但也有人明知不景气仍重新开业，所以中小企业的数量并不减少，反而还在增加。面对这种状况，政府采取了若干政策，其代表性方法与对待大企业一样，是让其结成卡特尔。

临时产业合理局选作中小企业合理化先驱的，是条纹三绺制造业。三绺是过去曾用于军人衬衫等的厚棉织物。价格原为一反七八日元，此时只剩三日元左右。虽说是一反，幅宽二十七英寸（一英寸为二点五四厘米）、长三十码（一码为九十一厘米），相当于窄幅织物五反。三日元销售额中，原料费占两日元三十钱；留给

工资和利润、打包费、运费以及对方国家进口税的，合计只有七十钱。商工省注意到这种状况，让其组织工业组合，实行生产数量统制，并斡旋出口的共同销售。这项计划如愿以偿，价格恢复到五日元左右，出口反而增加。另一个成功事例是棉织布（绉布）。这里也实行了大致相同的生产调节与共同销售并获得成功。继此之后，棉法兰绒、出口羽二重，纤维以外的搪瓷铁器、陶瓷器也进行了某种统制，取得了成果。然而总体来看，实行统制的只是一小部分，中小企业仍未能摆脱不景气。

在国际与国内都持续不景气之时，整体需求在减少，靠一时的政策无法拯救整体，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如前所见，明知不景气仍开业的业者在增加，就更是如此。在不堪忍受不景气的中小企业主中，盼望无论如何也要打破现状、出现新政治局面的人多了起来。同一时期，纳粹在德国兴起，其支持基础中多是中小工商业者、工匠阶层等所谓旧中间层，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日本，为军部侵略满洲及其对华强硬论喝彩的声音也出自这一阶层，这也不容争辩。不景气就这样在社会内部孕育着炸弹。

表 4 按存在形态分类的失业者数

推定失业者数

	总数	失业率	工薪生活者	日雇劳动者	其他劳动者
	千人	%	千人	千人	千人
1929	294	4.33	62	110	123
1930	367	5.23	73	134	160
1931	413	5.92	71	162	180
1932	489	6.88	82	198	209
1933	414	5.66	72	190	152
1934	374	5.01	69	186	122

注）据日本统计研究所《日本经济统计集》

4 失业的增大

知识阶层的失业是一大特征

不景气之下失业者增加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当时的失业统计并不充分，从事调查的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准确反映失业的实际状况。这里姑且看一下其数字。

从 1929 年到 1932 年，即使按这项统计，失业者数也增加了约二十万人，失业率也从 4.3% 跃升到 6.9%。当然，也有这项统计无法反映的失业状况。以大阪府为例，府厅调查的失业者数为八千余人，而大阪市社会部的数字为两万六千六百九十人，后者是前者的三倍以上。大阪府的数字与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数字几乎一致，所以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日雇劳动者。另外，群馬县的统计看来也只覆盖了实际情况的三分之一左右。失业者中也有几种类型，如日雇劳动者、工薪生活者、一般劳动者等，各自的失业状况也不相同。以大阪市为例，每天早晨五点半，就有一千二三百名日雇劳动者聚集到三处职业介绍所。但真正获得工作的只有一百人上下，九成以上的人都会落空。即使得到工作，一天的工钱也只有一日元二十钱到一日元五十钱，还要靠它连同落空的日子在内，与家人度过数日。因此，据说许多人连廉价客栈也住不上，只能露宿野外。

表 5 大企业 with 官厅录用应届毕业生情况

	报名人数	录用人数	录用率 %
1927	8,673	1,586	18.3
1928	14,911	3,024	20.3
1929	14,522	2,804	18.1
1930	18,727	2,894	15.5

注) 内务省社会局调查

然而，当时失业问题最显著的特征，是所谓“知识阶层”的失业问题。有这样一个说法：东京市社会局为了给知识阶层失业者提供工作，于1930年5月决定录用七百余人作为官厅的临时帮手，结果有五千八百五十七人应聘，难以取舍。在这种情况下，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就职门路。1930年5月，对资本金一千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和各官厅进行调查的结果，大致如下。在官厅方面，二千二百七十一名报名者中录用了二百三十四名，合格率约为10%。在大公司方面，三百二十五家公司中，完全不录用应届毕业生的占52.8%，超过半数。在录用学校毕业生的单位中，中学和小学毕业生也比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生多；而且与录用人数相比，报名人数逐年增加。名为“大学是毕业了，可是……”的流行歌由此出现，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报考人数在这一时期逐年减少，也正是以这种情形为背景的。

劳动条件的削减与钟纺的罢工

随着工厂关闭和规模缩小，解雇件数也增加了。即使未被解雇，劳动条件也接连遭到削减。当时压低劳动条件的方法包括：降低奖金、推迟加薪、缩小加薪幅度、减少各项津贴等变相的工资下调；以及缩短工作时间、增加休息日等方法，即使日薪或时薪不变，也能削减支付总额。

被称为日本第一企业的钟纺，也在1930年4月爆发了大罢工。其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给职工七成、事务员六成的战时津贴，公司因不景气宣布全部废除，改发相当于基本工资三成的临时补贴；这对职工来说，相当于工资下调约两成四。劳动者在各工厂向公司请愿，要求保留战时津贴，但未获采纳，最终爆发了历时三个月的大争议。本来，钟纺以家族主义、温情主义著称，完全

図4 産業別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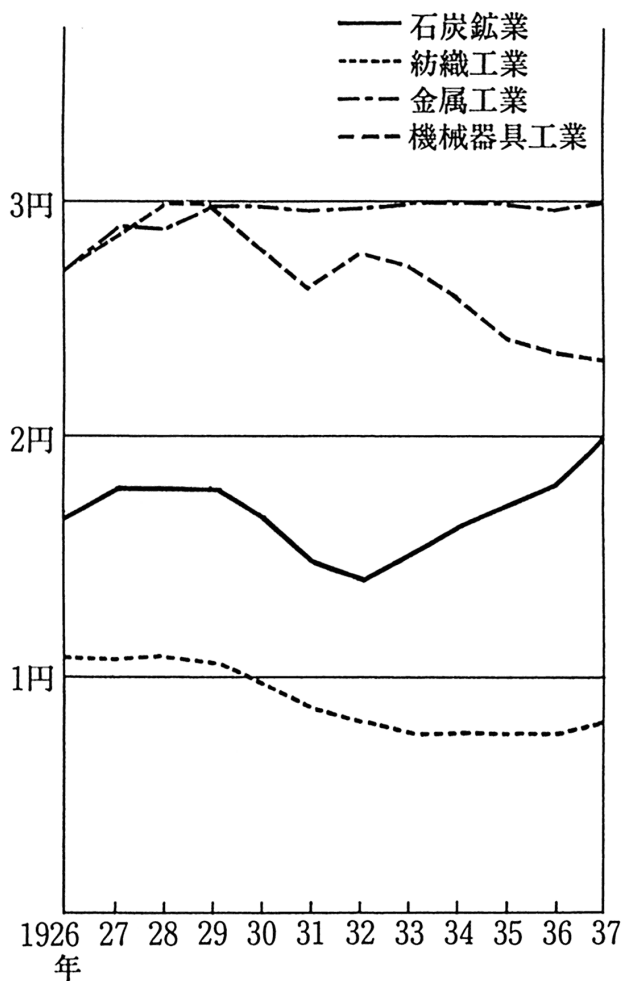


图4 分产业工资

看不到劳动运动。但一旦进入争议阶段，就出现了解雇主谋者、瓦

图5 労働争議件数・参加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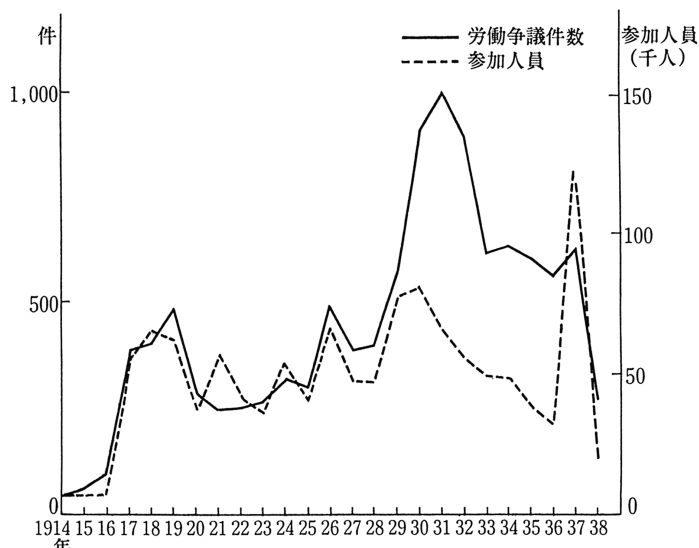


图5 劳动争议件数·参加人数

解罢工队伍、据守食堂、袭击董事私宅等极为激烈的行动。钟纺尚且如此，1930、1931年达到了战前罢工与闭厂（lockout）的高峰。为便查考，这里把当时的工资与劳动争议的数字汇总于图4、图5。

从图中一看便知，工资下调最激烈的是工人流动性强、相对不需要熟练技能的纺织工业和煤炭工业。相反，工资下调幅度相对较小的是需要熟练技能的重工业部门，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5 政治动荡

伦敦条约与统帅权问题

在剧烈不景气表面化之前的1930年2月，执政党民政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此时，政策当局恐怕还没有预料到不景气会以如此猛烈之势袭来，财界也没有表现出对井上财政的不满。只是在政治方

面，剧烈动荡反复发生。1930年2月，关于海军辅助舰艇的裁军会议已在伦敦召开。民政党政府把达成裁军与解禁并列为政府最大的政纲，因此为实现裁军倾注全力，并向伦敦派出了以前总裁若槻礼次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当时我国的要求是：辅助舰艇保有量达到英美的七成，同时增加大型巡洋舰和潜艇的保有量；这一主张很早就已公开。

然而1930年3月末，代表团发来了最终的请训。据称，谈判结果是：总吨位虽确保了略低于七成的水平，但在大型巡洋舰和潜艇方面，除非按美国六成的水平妥协，否则预计无法避免决裂。政府向全权团发出回训，令其按此方针签字。

对此，执掌海军作战的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认为，即使不惜决裂，也应坚持大型巡洋舰和潜艇的要求。但海军内部也有谋求圆满收场的动向，海军一度表示接受，事情进入了发出回训的程序。然而其后，军令部方面声称从未同意过回训，问题在政治层面扩大了。

问题的焦点在于，围绕这一决定，究竟有没有侵犯统帅权。根据明治宪法第十一条，作战用兵之事由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施行，政府不得插手，即所谓统帅大权。军令部方面的说法是：兵力数量的决定虽然主要由政府负责，但统帅部也参与其中，所以未经其同意就在条约上签字，是侵犯统帅权。对此，政府方面的见解是：根据同第十二条，兵力数量的决定是在听取统帅部意见之后由政府决定的，所以在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这也符合当时宪法学的通说。因此，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问题，但由于政友会把它带入政争、企图倒阁，事态也就势必复杂起来了。

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以及鸠山一郎、内田信也等人相继发难，追问按照该条约确定的兵力数量能否保障国防安全、条约是否违反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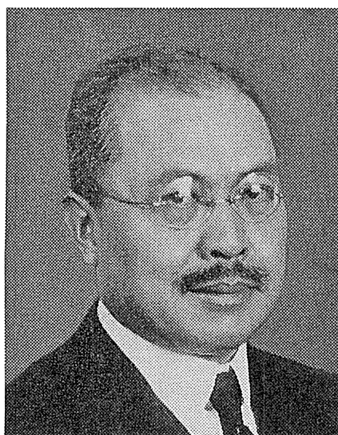
法。海军内部甚至东乡元帅也批判条约。事态纷乱，给一般人留下了滨口内阁违反宪法实行裁军的印象。右翼团体也乘机鼓噪起来。议会结束后，批准条约还须经过枢密院审议。其副议长平沼骐一郎和精查委员长伊东巳代治，正是此前在金融危机之际搞倒若槻内阁的祸首。这一次，他们也想在审议条约时将其否决，以此倒阁，并与政友会串通一气，暗中活动。然而政府态度强硬，压服枢密院强行通过。其背后有天皇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对英美协调论；西园寺激励内阁说，如果枢密院始终不肯改变反对态度，那就罢免持反对意见的顾问官，改组阵容后重新审查即可。此时，预料内阁将倒台的美元买盘也在增加。

抬头的右翼与滨口首相遇刺

这样，裁军条约的成立虽是滨口内阁的胜利，但侵犯统帅权的宣传却激起了国内青年军官、右翼团体等的激愤。

围绕伦敦条约的统帅权问题发生后，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活动骤然活跃起来。原本，实行解禁就是以遵从以英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为目的，缔结裁军条约也是为了与英美密切协调，所以这两项政策基本上具有共同的性质。遵从世界既成秩序，并在其中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是滨口首相以及币原外相等人共同的想法。西园寺支持这一点，也是因为认同这一思想。据说西园寺常说：“日本正是因为参加国际联盟也好、裁军也好，与英美协调，才能握住世界政治的指挥棒之柄。像法国、意大利那样吊在指挥棒的梢头是不行的。”

井上强硬推进金本位制复活，也与这一思想相连。然而，右翼和军人反对这种想法，认为应一举打破国内国际的既成体制，他们的活动从这一时期开始激烈起来。



幣原喜重郎

币原喜重郎

在当时普遍的不景气中，右翼势力逐渐增强。接近大川周明、北一辉的势力各自窥伺时机；血盟团事件的井上日召也从茨城县来到东京，加深与青年阶层和年轻海军军人的联络。海军上层分裂为条约派与舰队派，反条约的舰队派势力增强。由于农村的贫困，入伍的士兵们连安下心来过军队生活都做不到；目睹此情的年轻陆军军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一心认定照此下去军队的基础将被破坏、应当实行国家革新。恰逢其时的伦敦条约问题，似乎起到了把四分五裂的右翼势力团结起来的作用。

在这样的状况下，滨口首相在东京站遭到右翼一名青年的枪击，身负重伤。币原外相被任命为临时首相代理。币原是出色的外交官，但作为首相代理的手腕却不甚高明，政情愈发陷入混沌。在野党政友会把议会审议拖入混乱。其直接原因是，币原在就伦敦条约与国防问题接受质询时所作的答辩中，含有让天皇承担国防责任的内容，被指为不敬；议会为此中断审议，争吵了将近两周。次年

1931年3月，滨口因病未愈辞职，若槻礼次郎再次接任民政党总裁、首相，延续了内阁。

被暗中掩盖的三月事件

在这样的状况下，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身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要职的二宫治重（参谋次长）、杉山元（陆军次官）、建川美次（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小矶国昭（军务局长）等人，与以大川周明为中心的右翼携手，抬出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企图发动政变。他们以政界混乱惨不忍睹、照此下去国家前途堪忧为名目，联络一部分工会和右翼团体组织示威队伍，包围国会，要求解散议会、内阁总辞职，成立宇垣内阁，由军方掌握政权。大川等人姑且不论，其他军队高官对这件事有多大积极性，目前尚无定论；但至少建川和小矶一度当真，宇垣似乎也并非完全不感兴趣。

然而，这一事件未及实行，就因宇垣下令中止而被不声不响地掩盖了过去。当然，责任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所谓三月事件，就是此事。不过，事件虽然中止，演习用的三百枚炸弹已经落入大川一派右翼手中，军方后来不得不为收回它们煞费苦心；而且因为中止实行，右翼对宇垣的谴责极为激烈。另外，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中层军官组织的“樱会”（领导者为桥本欣五郎中佐），其成员开始酝酿撇开高级军官的武力行动计划。

另一方面，在关东军中，一项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两参谋为中心，通过谋略制造事端、赶走满洲的中国方面实力人物张学良、一举把满洲变为领土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桥本等中央军官集团与板垣、石原等人之间，有着秘密而密切的联络，据说反复讨论的是：先在国内推翻政府、断然实行昭和维新，还是先在满洲起事，再扩展到国内各地。陆军内部的这种动向几乎不为政府所知。连消息

灵通的西园寺元老的书信原田熊雄，都是到入夏时才第一次知道三月事件；国内外的阴谋就在上层尚未察觉之时急速发展。此外，据说三月事件还有在野党政友会的森恪牵涉其中。政友会的急进派或许也不惜以近乎政变的方式谋取政权。

就这样，在国内的不景气与军部纷乱躁动之中，解禁政策继续执行。作为经济政策的解禁问题，逐渐只能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了。

第四章 危机迫近

1 井上的政策

激起波澜的井上财政演说

1930年在不景气中过去，1931年春季的议会出现了如前所见的混乱，与此同时，围绕财政政策的论战也是火花四溅的激烈之争。尤其是政友会前藏相三土忠造与井上之间的论战，针锋相对，内容丰富。井上财政演说的大要如下。

由于1930年度的萧条，财政收入预计也将显著减少。租税及其他经常收入将减少一亿五千五百万日元，即便把其他收入合并计算，也将减少一亿四千九百万日元。因此，政府决定制定与减收相适应的岁出计划。作为伦敦裁军条约的结果，海军扩张计划被削减，1931—1936年度之间定为五亿零八百万日元，政府又进一步节约，定为三亿七千四百万日元，把一亿三千万日元有余转用于国民负担的减轻。这样，岁出预算总额为十四亿四千八百万日元，比上年减少一亿六千万日元。既然如此削减财政支出，整顿精简行政、财政制度，推迟新的事业，也就在所难免。不过，为了救济失业，计划以发行一千二百万日元铁路公债为首，开展以公债为财源的公共事业。此外，为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贷出存款部资金二千五百万日元，并作为农山渔村失业的救济资金，贷出七千万日元有余。

目前的不景气确实深刻，但自 1930 年 11 月前后起，世界性萧条也告一段落，预计不会再有更深的下滑，“我们认为正逐渐走向正常的状态。当然，这个不景气会不会突然转为繁荣，谁也不能预料，但我认为今天经济界正以逐渐稳健的步伐，在各方面显现出恢复的倾向”。当前应采取的政策，唯有进一步推进产业合理化，通过降低成本，创造新的需求，增加生产。解禁后的黄金外流相当激烈，1930 年中，日本银行的正货准备减少了二亿五千万日元，但另一方面，我国的银行、公司购入了约一亿日元的外国证券。贸易状况也恶化了，但那是由于商品价格下跌，数量上并没有多大减少。因此，国际收支、贸易两方面都不必过度悲观——他这样说。

政友会抨击其过于乐观

井上的这篇演说，可以说作为政府当局，倒是坦率地承认了财界的不景气。然而，代表在野党政友会的三土理所当然地予以反驳，抨击政府的见解过于乐观。

其要点是：现内阁的财政政策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政府犯了四个错误：解禁既勉强又无准备；作了紧缩节约的宣传；对世界性萧条的预测和对银价暴跌的预测均告失误。不景气正是这四个因素叠加而发生的，但尤其是前两项，不得不说政府完全搞错了政策。关于景气动向，政府把物价和股价一时止跌说成是景气恢复的征兆，但那只是政府一时命令日本兴业银行等强行融通资金所致，不景气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善。

就预算来看，政府的岁入估计也过大，财源不足，正用短期的大藏省证券敷衍一时。裁军带来的节约也决不算大。一面说不发行公债，一面却把公共事业费的财源依赖于公债。这不得不说是财政紊乱——如此等等。井上逐条反驳，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今天重读这场论战，当然不能断言双方孰胜孰负。可以确定的是，井上明确表达了将解禁政策坚持到底的态度。

即便不景气在国际上日益严重，它也不会无限持续下去。随着景气恢复，自己的财政政策终将得到回报——井上在这一时期是这样确信的。三土指出在大萧条开始的时候实施解禁，时机不当，这是正确的；但1930年初，谁也未能预测到如此严重的大萧条，这也是事实，井上无法接受三土的主张，也是理所当然的。

1931年度预算靠执政党的力量总算通过了，但到1930年度末（1931年3月31日），岁入远低于预算，产生了一亿二千万日元的缺口，而且清楚可见，即便扣除岁出的节约，仍将产生四千八百万日元的缺口。井上不得已发行该数额的公债，填补财政的亏空。政友会对此猛烈抨击，论战再度上演，但井上不肯承认自己方针的错误。

呼吁紧缩财政

1931年的经济，就这样继续按井上的方针推进。井上为了表明将以与此前相同的想法强行推进财政与金融的态度，于1931年4月在地方法官会议和全国无尽集会所做了两场演说。这里以无尽集会所的演说为中心，概括一下当时井上的想法。

井上首先主张，1930年秋以后，财界的状态已趋于稳定。从1930年5月到9月前后，不景气急剧加深，那是解禁当时自己所未能预料的。生丝从一千日元跌到五百日元出头，这样的物价暴跌把整个经济打入了危机的谷底。但此后价格也趋于稳定，经营优秀的企业中，生产成本少则下降二成五，多则下降三成五左右。由于不景气，降低工资、裁减人员等这些在平时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得以做到了。无论什么产业，到了不景气的时候，除了削减成本、调节生产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妙策。若考虑将来，仍有一些产业成本削减得

还不够。在未将其充分整顿淘汰之前，不可能经得起国际竞争。政府的财政也是一样，在不景气之下，光靠政府扩大岁出的话，“世人就不会行动。……人心的劲头若不用到这上面，就收不到实效”。

外国的状况也与日本没有丝毫不同。物价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已跌回大致大战前的水平。然而，对未来的不安已不多见了。最困难的，恐怕是从海外引入的资金被抽走、金融陷入窘迫的德国。这样想来，“从世界的总体大势来说，这个不景气急剧转为繁荣的时代虽然不会到来，但我认为今后也不会再怎么坏下去。我认为会渐渐好起来”。

也有人问，政策上难道没有应对这个不景气的手段吗。“然而……人的力量这种东西，在违背自然之力时，是非常无力的。顺着自然之力行事时，没有比人的力量更强大的了”。经济政策恐怕也是一样。今天是应当整理的时代，是收拾摊子的时候。“这样做，降低生产费，去除浪费，稳稳把住，使自己的事业能够自立，那么时势一旦转变，利润率就会比以往大大增加”。只是，把它整垮不算本事，用金融手段让它勉勉强强活下去，才是现在唯一可行的政策。美国胡佛的景气恢复对策也全部以失败告终，反而有残留害处更大的倾向。

澳大利亚由于持续采取既不减工资也不造成失业的财政政策，其中一个州新南威尔士停止了公债付息。联邦政府代为承担，说是要履行付息，但其信用已经扫地。到了那一步就本利俱失。“今天的日本正处于非常重大的时机，在这种时局下，全体国民必须脱胎换骨，觉悟到迄今为止的日本经济是虚假的，从此顺应世界大势而获得新生，大干一场”。

不顾反对削减官吏薪俸

1931年，岁入低于预算也几乎已成定局。于是进入新的年度，政府立即着手行政、财政的整顿，决定实行约一亿日元的节约。其内容大致是：通过恩给、补助金、官吏薪俸、工资的削减挤出四千万至五千万日元，其余五千万日元靠省的撤并、局课的整理等行政整理和物件费（办公物资经费）的削减。这些问题无一不会激起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官吏薪俸的削减，是此前已经失败过一次的问题，预计会进展艰难。官吏减俸的程度，在从首相减两成到月薪一百日元者减为九十五日元（减五分）的范围内实施。然而反对运动十分激烈。特别是夹在铁路从业人员的强烈反对与政府方针之间的铁路事务官们，竟落到全体向大臣递交辞呈的地步。法官、检察官的反对也很激烈，因此司法大臣定下了法官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减俸的规定，采取逐个征得同意的做法。这样实行减俸，节约也不过约一千万日元，但政府总算达成了夙愿。减俸旋风不仅限于中央官吏，也以同样比例适用于府县、市町村的吏员。小学教员最高减一成、最低减五分的减俸得以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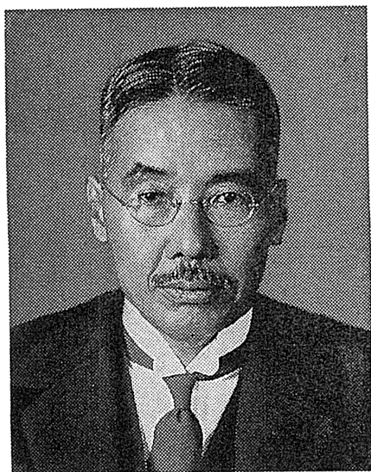
为了行政整理，撤并省的计划中，提出了废除拓务省、降格为拓殖局，以及合并农林省和商工省成立产业省的方案。各省对此反复强烈反对，还发生了夹在中间的江木铁道相辞职的一幕，但最终因反对，产业省的设置被搁置，只有拓务省的降格得以实施。由此产生的预算削减额仅五十万日元，几乎没有实效，但井上借此表明了政府的紧缩态度，想来意在追求精神上的效果。

强行推行的平衡预算案

恩给法修改问题，由于恩给领取者主要是旧军人，在陆海军省与大藏省之间激起了激烈的摩擦。井上的提案是：军人出身的恩给领取者一般年纪轻轻（陆军军人平均三十四岁，海军军人三十岁，而一般文官四十七岁）就开始领取恩给，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想让军人恩给也向文官靠拢，但陆海军对此强烈反对，结果不得不作出不彻底的妥协。

军备整顿问题也成为藏相与陆海军摩擦的原因。当时陆军中央部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兵器的发展，正在谋求充实装备，但由于迟迟拿不到预算，正在推进一项计划：由军队自行缩小军备，如废除近卫师团、把第十六师团移驻朝鲜，用由此省出的预算来充实装备。关于这一点，井上从财政的立场表示反对。他虽对陆军的提案表示赞成，但一旦实施，1932年度就需要增加相当可观的支出，因此希望把计划推迟一两年。井上一度征得了南陆相的同意，但“陆军大臣遭到小矶军务局长和经理局长的反扑，再次来到我（井上——引用者注）这里，说‘虽然一度答应了，但部内怎么也摆不平……’之类的话，事情又回到了原点”。（井上谈话，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二卷）

在编制1932年度预算时，井上也采取了强硬态度。也就是说，他不采取由阁议决定大纲、各省据此提出概算要求、再与大藏省交涉编成预算的做法，而是不交阁议、不承认概算要求，由大藏省制作概算，从一开始就强行推行。结果，井上编制的1932年度预算案比1931年度节约一亿二千万日元，为十三亿三千万日元有余。井上试图编制一份避免增税和发行公债的平衡预算。这样一来，政府岁出在一切方面都被迫大幅节约。就这样，井上强硬地推进自己的政



井上准之助

策，咬紧牙关，相信总有一天形势会大大转变，景气恢复，自己的政策得到回报。而且，即便有在野党和一部分经济学家的反对，金融界和学界也一致给予井上支持，因此他的地位和自信无可动摇。支撑这一点的支柱之一，就是构成财界中枢的大财阀的支持。

2 财阀的动向

从一部连载小说看对财阀的攻击

1930年1月至6月，《东京朝日新闻》连载了细田民树的小说《真理之春》。小说在未完的状态下结束了连载（后来在《中央公论》连载后篇），其主要理由，似乎是由于原型人物池田成彬的抗议。在这部小说中，池田成彬以生野齐信这个名字登场，任谁都能立刻看出原型。他是财阀的象征，其家庭充满丑闻，在东京和镰仓拥有豪华的宅邸，被描绘为掌握财界生杀予夺大权的典型财阀代表。例如书中写道，他的小女儿是富家阔少们通宵达旦的暧昧聚会的常客，而

那位小姐已经结婚，池田愤慨也情有可原。然而，这部小说之所以被视为引起轰动之作，自有其理由。

如前所见，以三井为首，三菱、安田等诸财阀在大战结束后的时期稳步创办新企业，或者把二流以下财阀旗下的企业收归自己手中，进而以电力公司为首，通过金融对系列外的大企业也施加强大的支配力。其中三井物产等，通过中间商从农家垄断收购鸡蛋，又通过同样的中间商兜售鸡饲料，一手经办日本贸易的两成上下，还掌握着王子制纸等大厂商众多产品的一手经销权，凡此种种，都被视为财阀恶劣面的代表。

财阀的说辞及其信念

因此，《真理之春》中那种虚实夹杂的对财阀的攻击，具有强烈打动读者的力量。然而，财阀的主事者并不打算回应这类批判。或许他们心里自认并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

例如三井财阀的总帅团琢磨，在王子制纸要合并富士制纸和桦太工业组建大制纸托拉斯时始终反对，据说那是因为担心三井系完全独占一个产业会成为问题；据说他对三井物产从军舰到鸡饲料无所不包的经营方式也持反对态度。

池田成彬也是一样，主观上似乎并没有通过三井银行支配产业界的野心。池田本人有一份题为《财阀的事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将来》的草稿，据说写于对财阀的攻击激化的1932年夏前后，其中这样说道：

“日本所谓财阀所关联的事业范围极为广泛而且复杂。涉及工业、商业、金融、保险以及其他众多领域。又，我相信财阀过去对日本产业贡献的功绩也很大。在尚未发展的产业界供给资本，供给所养成的人才，支持即将倒塌的产业并引导其走

向恢复，或者完成非大资本则终究无望成立的事业……。而看财阀成就这一大业的经营路径，主要是取得多数股份成为大股东，或以其他方法选出代表董事，掌握经营的实权，依自己的信念经营事业。……

经济界持续繁荣、财富普遍分配的时候不会发生议论，但若不然，财富分配出现失调，贫富之间产生悬殊，议论就会发生。也就是说，贫者无论怎样劳作也赚不到钱，甚至衣食之资也得不到酬报，或者想劳动也难以找到工作，只得加入失业的群体……。

财阀也依凭自己财力、人力的优越力量，以自己的信念经营事业，成就今日之大，其间毫无愧疚之处固然是当然的，但目睹社会四周的形势如同今日，不仅不能徒然安然自处，我认为对自己的立场也有再三反思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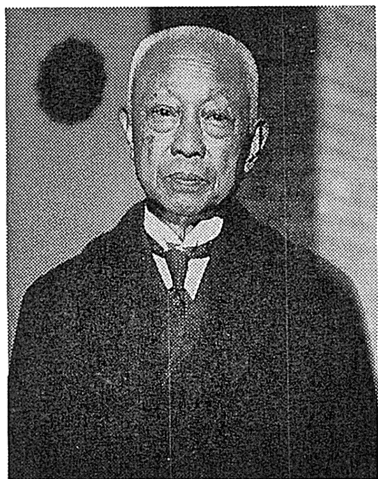
再就财阀的银行业进一言：以往银行业经营者的信念，在于任何时候都要备齐能够完全应对存款支付的准备。这个信念极为强烈，其间既无私情，也无权力的压迫。而欠缺这一信念的银行经营者大抵都失败了。然而在日本，财阀支配的银行在最近数年间，存款、贷款及其他数字都有异常的发展，于是把巨额的资力收入掌中，一举一动对产业的影响极大，从而直接或间接波及社会民众利害之处不少。看到这种情形，银行经营的方法也不应再如往昔那样，仅以存款支付准备这一个方面为满足。”（今村武雄《池田成彬传》）关于财阀的过去，池田反而高度评价了其产业发展的贡献，相信“毫无愧疚之处”。他只是说，由于不景气而出现了失业和贫富的差距，这才是问题。特别是财阀系银行的信念，在于“任何时候都备齐能够完全应对存款支付的准备”。银行的行动仅仅以这一件事为目标推进，结

果却是“把巨额的资力收入掌中”——他这样说。确实，不能放任贷款的呆账不管，于是让企业发行公司债收回贷款，进而强令清理债务，干涉董事人事要求更换经营者，视情况还要求企业整理合并。那是业务上自然的演变，并不是作为财阀统一的战略方针来做的——池田想必是这样考虑的。

财阀银行押注解禁的盘算

这种想法，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识是理所当然的，其本身不该受到非难。只是当企业巨大化、拥有了独占性的支配力而仍固执于这种常识时，其影响过于巨大，就有可能给整个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财阀系企业经营者的意识与社会一般的认识之间，就这样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财阀系银行积极支持解禁，前文已经述及，但其背后暗藏着这样的意图：利用稳定的汇率关系，或者把外国资本引入国内，有时则把国内资本运用到海外。当时的三井银行正为如何运用迅速增加的存款而苦恼。在三井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曾认真讨论过，但因调查等方面的困难，最终确曾被搁置。三井银行也确曾一手承接大阪市市债。其他银行即使没有这样显眼的活动，也同样在为游资的处理而苦恼。可以说，解禁为此创造了绝好的投资机会。

我国的利率从1930年到1931年上半年呈略微下降的趋势。特别是进入1931年后，投资完全停滞，金融松弛愈发明显。三井银行见此形势，购入了相对有利可图的外国短期证券。1931年3月至9月的购入总额达一千二百三十三万英镑（合一亿二千万日元有余）。大银行一面利用金本位制度获利，一面继续忠实地支持解禁政策。1930年，经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斡旋，有人提议安排池田与西园寺会面。两人会谈是在1931年6月。此时池田就解禁问题，从第一



西园寺公望

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讲起，说本应紧缩的地方，由于政友会内阁和日本银行一拖再拖，才造成了如今的停滞，“我的意见还是与民政党相同，即便此时给工商业带来相当的不景气，也无论如何应当解禁，同时政府财政也必须采取紧缩方针。必须实行解禁，把方针引向那里。——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这些话我讲了大约三个小时”。

西园寺一言不发地听完这番话之后，问：“高桥先生的政策错了吗？”池田答道：“我是这样认为的。或许会有工商业者来说，搞解禁国家就会垮掉之类的话，但日本不会因为那种事而垮掉。工商业不振、不景气到来，世间会骚动起来吧，但那种程度的忍耐是必须有的。不这样，日本的财界就无法重振。”

（池田成彬《故人今人》）

财阀就这样一面高举古典资本主义的逻辑，使自己的行动正当化，并以同样的逻辑支持了井上的解禁政策。对于针对财阀的攻击，他们还没有到认真对待的地步。

右翼、军人与池田的立场

不过，池田并非没有意识到外部、特别是右翼和军人的压力。“三月事件”当时，池田和平沼曾把桥本欣五郎叫来，听他讲俄国的事情。可是桥本把俄国撇在一边，始终都在攻击资本家。

“‘我是陛下的军人。政府说的话我可不听。政府有什么为难的时候，或许会来要求派兵，但我不答应。不过若是陛下的命令，我就出动。’他就是这样说的。那时我是第一次见到桥本，旁边的人介绍我说‘这是三井的池田’，桥本就说‘我们开枪的时候，可不会拿民众当对手’，然后朝我这边瞪了一眼，那态度简直像在说，要打的就是你们资本家。……后来慢慢听他说下去，稍稍试探了一下，发现这种倾向在军人中间相当浓厚。”（《故人今人》）

当时“三月事件”和桥本主持的“樱会”的内情还不为人所知，但池田已经嗅出了军中向非法运动倾斜的动向。他回忆说，见到西园寺时，他曾再三力争：您一定要见一见少壮军人。

然而，即便存在一部分这样的动向，它已经成为难以控制的潮流——这一点不用说池田，就连西园寺也没有察觉。“三月事件”的领导者们没有一个人受到处分，稳坐要职，伺机在满洲起事、推行国内革新。

对这种形势的误判，在政治上也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并使财阀成为非难的靶子，这将在后文看到。

3 德国的金融危机与英国脱离金本位

超出预料的欧洲危机

另一方面，大萧条朝着远比井上和池田的预料更为深刻的方向发展。1931年3月，德国政府备妥了紧急处分令，布吕宁首相打算前往英国，商议如何渡过这场危机。当时德国经济已濒临破产。如前所见，当时的德国主要依赖来自美国的资金流入，推进国内投资，改善贸易并支付赔偿。然而，大萧条以后，各国的海外投资急剧减少，德国由于海外投资被突然抽走，暴露在无休无止的危机之中。要渡过难关，唯有延期支付赔偿一条路。布吕宁的访英，正是为了请求暂缓支付赔偿。

试看1929年、1930年、1931年1月至5月的英国海外投资数字，分别为六千九百万英镑、七千万英镑、三千五百万英镑，1931年的锐减十分醒目；美国的情形也一样，以年初五个月的合计，从1930年的六亿美元锐减至1931年的二亿一千一百万美元。面对看不到新投资、唯有资金回收格外醒目的状况，德国努力设法防止资本流出。德国的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把官方贴现率从5%一举提高到7%，但仍在一个月间丧失了十二亿马克的正货准备。1929年各银行合计有八十五亿马克的短期借款，到1931年7月已减少到三十五亿马克。资金被如此迅速地抽走，国内金融骤然收紧，银行也不得不陷入难以兑付存款的境地。

奥地利的大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停止支付是在1931年6月。大银行停止支付自然引起连锁反应，德国遭到猛烈的金融危机的袭击。以达纳特银行为首，大银行相继停止支付，德国政府终于实施了高强度统制：由国家实行外汇管制，禁止资本流出。6月2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致信美国胡佛总统，屈膝恳求救济。

“从过去数日的事态可以清楚看出，全世界已丧失对德国经济组织的信赖，认为在难以背负的重荷下喘息的德国经济组织已无法履行其功能。外国给予我们的巨额信贷已被提走。仅在过去的数日之间，德意志帝国银行就不得不向外国支付其黄金准备及汇兑资金的三分之一。作为这些事实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经济生活被迫进一步大幅紧缩，已包含产业劳动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失业者人数势将进一步增加。从劳动的意志、能力以及德国国民的训练来看，可以相信德国国民能够忍受任何困苦，履行本国所背负的债务。然而，为使德国国民鼓起勇气直面现实生活，并维持全世界对德国债务履行能力的信赖，救济德国实在是燃眉之急……”。（东京政治经济研究所《世界政治经济年鉴》1931年）

英国金本位制的崩溃

胡佛总统立即对此做出回应，提议：美国政府把外国政府对美国所负债务的追收宽限一年，同时各国政府之间也把赔偿和战债的追收延期一年，在此期间努力使经济恢复——这就是著名的胡佛延债令（Hoover Moratorium）。

对此法国当初面露难色，但7月2日缔结了美法协定，表示同意。由于这一延债令，世界经济似乎骤然稳定，看到了恢复的曙光。然而那是错觉，以达纳特银行为首，各银行停止支付接连不断，德国经济陷入了无可挽救的危机。

胡佛延债令以失败告终时，陷入危机的是英国。投向德国的各国资金，由于停止支付和外汇管制，如今已完全被冻结；但各国资金往往不是直接投向德国，很多是经由英国投出的。因此，从德国抽回资金的浪潮转而袭击了英国。经由英国投向德国的主要是法国、瑞

士等诸国，现在为了确保其安全，它们打算把存放在英国的四亿英镑资金抽走。英国经济顿时陷入危机。

伦敦虽说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却没有足以承受那种规模支付的准备。英国政府为支付借入了五千万英镑的信贷，但那在短短十天内就消耗殆尽。

当时的英国处于以麦克唐纳为首相的第二次工党内阁之下，面对这场金融崩溃，要求成立举国一致内阁的呼声高涨，内阁总辞职了。然而，工党的主流反对联合内阁，麦克唐纳等人退党参加举国一致内阁——这一政治危机也是其中的一幕。然而即便成立了举国一致内阁，危机也未能缓和。英国政府原打算将其作为暂时性措施，于9月21日停止了金本位。由此，把英国资金带往海外的动向被遏制了，但同时，存续了一百年以上的英国金本位制也在这里结束了其漫长的生命。

如前所见，英国是金本位制的发源地，也是其保护者。英国的海外投资一直以支撑世界诸国金本位制的方式运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实力虽有所下降，伦敦仍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地。这样的英国无法承受急剧的资金流出而脱离了金本位，可以说意味着世界各国金本位制的终结。实际上，日本于这一年的12月，美国于1933年，法国于1935年各自停止了金本位，此后金本位最终未能恢复。

然而，在英国停止金本位之日，能够读出这一长期趋势的人很少。井上的悲剧从这一天开始。

4 满洲事变的爆发

全面展开的军方阴谋

如前所见，在满洲，以板垣、石原为中心的阴谋策划也终于全面步入轨道，开始推进。统治满洲的张学良政权与日本方面之间悬案堆积如山，而且新的问题又接连爆发。

其中最大的，是被称为万宝山事件的朝鲜人农民受压迫问题，为抗议此事，朝鲜出现了对中国人施加暴行等动荡不安的气氛。此外，这年6月，正在视察兴安岭方面的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一行被中国军队杀害的事件，愈发刺激了关东军。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关东军的参谋之间，无论这些事件发生与否，看准时机起事、把满蒙变为领土的准备已经在进行。例如1931年5月，板垣对新近进驻满洲的第二师团的高级军官发表演讲，在明确表明其决心之后，极言道：为了在国防上、又在确保产业资源上，与世界大国并驾齐驱前进，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它变为领土。万一不幸，我国放弃满蒙，就只能沦落为比利时、荷兰那样的小国。另一方面，中国的现状是内乱不断，各地实力派割据，看不到作为国家的统一，民众无法安居乐业。把满洲变为我国领土，也有助于民众安定其生活。当然，实行这一政策时，美国很可能进行强烈干涉，但我国海军拥有将其击破的力量。由于伦敦条约，越往后海军力量的差距只会越大，所以要开战的话，反倒是越早越好——他这样说。

石原怀有一种数年来酝酿的“世界最终战”的战争哲学。1931年4月，石原力主：在数十年后应当进行的、为了世界统一的最终战争中，日本要战胜美国，首先必须把满蒙变为我国领土，对内进行政治、经济革新，建立不败的体制；关东军的参谋部也由与石原的思想共鸣的人构成。这一构想，在中央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有赞同

者，桥本欣五郎等急进派自不必说，军务课长永田铁山等人也知道计划的大纲。奉天的关东军兵营里已经悄悄架设了二十八厘米炮。

此外，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与关东军取得联系，在奉天附近起事的同时，策划在被朝鲜北部和苏联夹峙的满洲间岛省，通过密谋制造事件，使朝鲜军出兵。政府对此完全没有察觉。

只是，曾与民政党合作的宇垣离开陆相之位、南次郎就任陆相之后，可以感觉到合作的体制一点一点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31年8月，南在军司令官及师团长会议上做了训示，并将其公开发表。

其内容是：陆军自行制定了裁军计划，但这是军队最低限度的要求，为其实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竟有“处于门外无责任位置的人乃至不深切关心国防的人，动辄把军部看成是对国家现状盲目而悍然提出不当要求”的人，岂有此理。此外，满蒙问题在帝国的生存发展上占有极为重大的位置，事态却在向恶化的方向发展。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国际政局的变化、伴随我国民元气萎靡而来的国威的衰退，以及中国排外的国权恢复思想和经济力向满蒙的发展。军人必须愈发尽奉公之诚，在教育和训练上倾注热忱与诚意——大意如此。

政友会支持军方的强硬态度

“门外无责任的人”对军备插嘴岂有此理的发言，自然引起了激烈的反驳。此外，触及满蒙问题也是对主管外交的外务省的无视，当时的报纸报道说，币原外相在阁议上向南提出了强烈抗议。然而，若槻首相担心非难此事会引起阁内分裂，真相似乎是表面上谁也没有提出质问。此外，由于训示中有“军人应主动把这些主张之所以正当的理由，在军内外彻底贯彻”的一节，于是拨发了若干预算，现役军人到处演说满蒙的危机和国防的强化。

而且，陆军的这种强硬态度博得了在野党政友会的喝彩。政友会派遣首席总务森恪等人前往满蒙，进行了实地调查，其结论是：中国政府蹂躏我国在满蒙的权益，正在进行敌对行为。若照现状发展下去，日本就不得不从满蒙收手。要不收手，除了动用国力别无他途。森回国之后拜访南陆相予以激励，说“陆相的训示，一点儿也算不上激烈，也算不上越权行为。……我对您关于满蒙问题的认识完全赞同。请务必好好干”，暗中煽动陆军与政友会携手，谋求内阁更迭。森此时似乎探知了关东军幕僚的阴谋，写下“抚剑间岛夜，天将明”这样一句杀气腾腾的诗句。

恰逢地方议会选举正在举行，据说森恪与陆军省的小矶军务局长携手，采取的办法是，师团的军事演讲会一结束，就连同场地和听众一并接管，宣传普及国防，同时使选举朝着有利的方向展开。

满洲事变爆发，形势骤变

这种情势隐约传到政府和元老西园寺公望耳中，政界上层的忧虑之色渐浓。特别是西园寺与天皇的侧近联络，策划由天皇分别召见陆海军两大臣，就军纪松弛严加训诫。9月11日，大臣被天皇召见并受到告诫。此时，南陆相反复辩解，说什么会管束年轻军官的抱团啦、不干涉外交啦、会取缔军人的演说啦。此外，在事发当地奉天，军队的频繁活动和浪人挥金如土日益显眼，阴谋的事实已很明显，奉天总领事把这一情况电告外务大臣，币原以此诘问南。南于是下令特派参谋本部的建川少将前往当地平息事态，但建川把这一使命泄露给了桥本等人，桥本等人以电报通知关东军，把日程提前实施阴谋计划。

建川抵达奉天、暂且在料亭歇脚的9月18日夜晩，以奉天郊外柳条湖的满铁线路被受命于板垣、石原的一部分部队炸毁为信号，

满洲事变的火被点燃了。当天夜里，奉天的日本军就歼灭了当地的中国军队，接着战火接连向南满洲一带蔓延。政府在批准既成事件的经费支出的同时，决定了事件不扩大的方针，传令速归驻屯地，但一心要实现当初计划的关东军有时无视中央的命令，在吉林和哈尔滨利用浪人制造事件然后出兵，中央的权威荡然无存。特别是9月21日朝鲜军企图擅自出兵满洲时，中央一度严加制止，但最终若槻首相批准经费的支出，追认了擅自越境。

满洲事变就这样发生了。国际合作与通过解禁同世界经济保持协调这一民政党内阁的方针，因大萧条而受挫，如今又因满洲事变而不得不大大动摇。1931年的夏天，是这几捆炸药被点上火的时期，进入9月，它们以满洲事变和英国停止金本位这一戏剧性的形式爆炸了。

第五章 重新禁止黄金出口

1 购买美元问题

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各方同时引爆

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政府为研究对策连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

紧接其后的9月21日，英国停止黄金出口，宣布脱离金本位。随之，不仅以英镑为结算手段的英国殖民地、属地，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同时脱离了金本位。这给我国造成了严重影响。

我国之所以恢复金本位制度，原本是因为确信世界存在重建金本位的趋势；既然作为其中心的英国抛弃了金本位，那么过去一年多所受的种种苦楚，就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更何况，如前所述，以三井银行为首，三菱、住友等财阀系银行当时都把相当规模的资金放在英国。以三井银行为例，它从1931年初开始向利率相对较高的英国和德国投资，直到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之前，始终不断向海外投资；截至9月21日，持有七千一百四十六万日元的英镑。其投资方法是先买入美元，再预先卖出远期美元作抛补，以求安全，同时将这笔资金转往伦敦。

据说，只要以英镑安全为前提，这一机制就是最有利的做法；但英国停止金本位，意味着存放在英国的七千万日元遭到冻结。然而，

在美国卖出的远期美元仍须支付，因此三井银行一得知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便在 21 日至 25 日的五天里，买入了二千一百三十五万美元的美元资金。同样在海外投资的三菱银行、住友银行也出现了类似动向。此外，以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为首的外国银行也争相涌向横滨正金银行，把日元换成美元。据说此时卖出的日元总额约为七亿六千万日元。

英国脱离金本位后，我国对美元的需求之所以一下蜂拥而至，并非都像三井银行那样出于实际需要；也有不少是出于这样的盘算：我国迟早也会脱离金本位，届时对美元汇率必定下跌，到时候再买回日元，马上就能获利。池田成彬后来辩解说，三井银行的做法全都出于实际需要，丝毫没有投机成分。但即使池田的辩解属实，也不能认为其他美元买盘完全没有投机意图；而且正如今天一样，按当时的商业习惯来看，利用汇率的变动牟利，也毫不稀奇，也是常识。在这里，且插录池田以及大矢知升、小汀利得等人的一段回忆。（池田《财界回顾》）

表 6 购买美元总额

正金银行售出美元总额	7 亿 6,000 万日元
（明细）花旗银行	2 亿 7,300
住友银行	6,400
三井银行	5,600
三菱银行	5,300
香港上海银行	4,000
三井物产公司	4,000
朝鲜银行	3,400
三井信托公司	1,300
其他	1 亿 8,700

池田 解禁这件事是失败了。不过，若要认真贯彻下去，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时，日本也应当停止，那才是正理。

小汀 1931年9月21日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时，我们这些再禁论者一面高奏凯歌，一面议论说，井上真是个走运的家伙。这是因为：日本虽然还能坚持，但连金本位的老家英国都这样做了，那就没有办法；如果说日本也停止，在政治上就是漂亮地抓住了机会。

大矢知 英镑区全都重新禁止了吧。所以只剩日本和美国。我一接到英国重新禁止的消息，便想到正金银行一定会停止出售外汇。停止出售才是理所当然，没有停售就太奇怪了。因此，我到东京站迎接池田先生，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些才到总行。听说正金在卖，所以我们已经买下了，我便说“那很好”，放下心来，把刚才的情况报告给池田先生。

池田 我这个被称为购买美元元凶的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没想到大矢知君会特意到车站来接我，只问了他要去哪里，真是晴天霹雳。不过，他说已经买了美元，我便认可那是理所当然的处置。

发展为道德问题，攻击财阀愈演愈烈

为了击退再禁论，政府以井上的名义声明维持金本位。其理由是：英国之所以不得不停止金本位，是因为信用扫地，无法避免黄金一举外流。然而，我国财政基础坚实，维持金本位毫无障碍。也就是说，找不到改变解禁政策的理由。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井上命令横滨正金银行按照需求出售美元。井上的想法是，对美元买盘要多少就卖多少，但金本位始终维持，绝不让投机者最终获利。因此，他一面让银行抛售美元，一面为了挫伤美元买盘的势头，提高

利率、收紧银根，从资金方面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对方主动提出把一度买进的美元卖回给正金银行——也就是想把局面引向所谓协议平仓。日本银行领会其意图，于10月5日一次性把官方贴现率提高二厘（0.73%）。当时，《朝日新闻》特别点出三井财阀，激烈攻击财阀购买美元，企图在重新禁止后再买回日元，以获取巨利。至此，原本属于经济问题的美元问题，一下子变成了政治问题、道德问题。舆论指责说，不顾国家危机，投机购买美元，使财政和金融陷入危险，这算什么事；必须埋葬国贼三井财阀。这里也存在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矛盾。单从经济逻辑来看，英国脱离金本位，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产生购买美元的投机。要想防患于未然，可采取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国也效仿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只要不重新禁止，产生购买美元的投机就属当然；如果仍要维持金本位，就必须一面出售美元，一面做好准备，承受由此造成的国内金融紧缩、利率高涨和国内萧条加剧。在持续恶化的萧条中进一步收紧银根，会把许多产业推入深渊。为避免这种结果，就只能在金本位的发源地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之际，我国也随之重新禁止。然而从政治上看，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意味着摘下民政党政权的头号招牌；对井上来说，这将造成无异于政治自杀的结果。青木一男（时任大藏省国库课长）这样说：“可以想见，在井上先生看来，这个问题是他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顶住政友会及其他方面的反对而实行的。因此，一旦转为重新禁止，便会有投降敌营的感觉。再加上他那特有的自信力作为支撑，我想他便坚定了百折不挠的决心。”（青木《圣山随想》）经济上看似最善的政策因政治理由而得不到采用，并由此产生不愿见到的结果，这并非始于此时；但事态的严重程度，恐怕可以说是空前的。

正因如此，井上无法下决心重新禁止黄金出口，而试图彻底维持金本位。然而，这股气势正从内部逐渐瓦解。

2 陆军的压力与协力内阁运动

安达内相的妥协使内阁动摇

满洲事变的爆发和英国停止金本位，在政治上引起了剧烈动荡。即使是把通过解禁与裁军实现的国际协调作为不可动摇政策的民政党内阁，其内部也无法掩饰动摇。

震源是内务大臣、党内实力派安达谦藏。安达为应对这一形势变化，企图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同军方妥协，并通过政党联合改变政治体制，乘此时势扩张势力。若槻首相一度似乎也大幅倾向于安达的主张。其中的情形，就让安达本人来说吧。

“1931年9月21日，《朝日新闻》以大字特报，称英国已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我当时忙于监督全国县会议员选举等工



安達謙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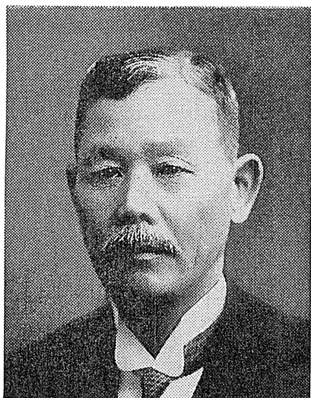
安达谦藏

作，但看到这则报道仍大为吃惊。既然英国采取这样的政策，我国便不可能独自维持解禁政策——这一信念在我心中涌起，于是决心向若槻首相提出劝告。

于是，次日22日上午，我到首相官邸会见若槻，说道：对财政经济大家而言，这也许是完全外行的想法，但我深忧难抑，斗胆陈述鄙见，希望求得您的同意。此事并非别的，正是黄金问题。昨天的伦敦电报报道，英国已断然重新禁止。英国既然再次采取此举，我国显然无力独自继续解禁；若任其发展，正货将源源外流，没有止境。处此之际，虽然这是极难处理的问题，但我认为除断然下决心重新禁止之外别无他法。尊意如何？对此，若槻挥动右手，压低声音说：这是秘中之秘，但我认为正如你的意见。不过，此事暂且要请你绝对保密。我不胜快慰，心想他不愧是精通财政的大家，便郑重承诺保密后告辞。

此后三四天，我没有拜访若槻，而是暂且静观；但没有任何消息，心中不安，于是再次前去拜访，询问此后的情况。他却仍然只是重复上次的话，完全不得要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因此我想，若槻是否先把此事同井上大藏大臣商量的；又或者商量之后，遭到井上的强烈反对，才开始犹豫不决。遗憾之至的是，我完全没有掌握任何可供判断的材料。”（《安达谦藏自叙传》）

若槻首相认为应当追随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这是一个重大事实；但关于这一点，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确证。若槻的自叙传《古风庵回顾录》对此也只字未提。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安达的回忆完全没有根据。恐怕应当认为，若槻曾同井上商议重新禁止，因井上反对而作罢。



若槻礼次郎

若槻礼次郎

井上对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毫不退让；但内阁内部一旦出现再禁论，他便只能显得越来越孤立。

满洲事变的扩大与十月事件

另一方面，尽管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满洲事变仍接连扩大，毫无止境。关东军一旦开始作战，便在事件发生后的三天内，把长春以南满铁沿线的中国军队全部赶走，此后仍没有停止前进。政府于9月24日正式声明不扩大方针，南陆相也在内阁会议上一再声明不会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但事态仍日趋扩大。关东军对陆军中央的制止充耳不闻，接连制造挑衅性事件。

例如，张学良被赶出奉天后，把大本营移到了锦州；尽管日本政府向各国保证不会进攻该地，10月8日，关东军仍派飞机轰炸了锦州。此外，11月4日，日军与满洲军在北满嫩江附近发生冲突，事变也以此为契机延烧到北满。事件的扩大，几乎全是关东军板垣、石原等人阴谋策划所致。当时隐居北京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帝），

也因关东军的暗中策划被秘密转移到旅顺，准备在独立之际让他发挥作用。

国内方面，十月事件败露。参与三月事件的桥本欣五郎等陆军中央佐官级军官是核心，部队所属军官和民间右翼也参加进来；他们计划于10月20日前后的某一天出动军队发动政变，一举暗杀首相以下各阁僚以及政党、财界首脑，建立革命政权。预定由当时深受青年军官信赖的荒木贞夫中将担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由桥本欣五郎担任内务大臣。桥本以下众人以维新志士自居，连日在新桥、赤坂一带豪饮游乐，因而很容易引人注目。参与军官中也有人担忧事态，向上级告密，主谋者于是被拘押，事件未及发动便告终结。然而，陆军首脑层已无法处分他们，反而把事情处理得极轻，摆出一副姿态：正因为现在的政治败坏，才会出现这种事；既然思想动机纯粹，就不应给予严厉处分。实际上，桥本以下十名军官只是在旅馆软禁了一段时间，随后便被从中央调往地方。

若槻首相的辞意与内阁动摇

满洲事变处理失败，又产生购买美元问题，在内部也无法处分十月事件有关人员。至此，若槻内阁看来已经走到尽头。安达逐渐倾向于同政友会组成联合内阁，建立举国一致体制。自从前述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意见被若槻压下之后，安达的想法似乎便迅速改变了。再加上若槻当时已被内外的剧变弄得疲惫不堪，“不止一次、两次，而是数次向我（安达）透露辞意；甚而至于露骨地直接向我恳求，无论如何请接我的班”（《安达谦藏自叙传》）。

在此期间，安达逐渐加强同政友会干事长久原房之助的联系，在联合内阁的构想上越陷越深。这个计划也传到了若槻耳中，10月底，若槻一度转而赞成该计划。11月1日，安达与若槻商量后，把

联合内阁的构想告诉了进京的元老西园寺。当然，井上和币原反对这一构想；政友会中，犬养总裁以及森恪等人也是强烈反对者，因此构想不可能原样实现。井上、币原轮番劝说若槻，极力主张：既然目前实行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最善的，就反对组成联合内阁、改变这些方针。11月下旬，若槻要求安达中止协力内阁运动。然而，安达此后仍继续同久原商谈，并如后文所述，埋下了若槻内阁总辞职的祸根。

井上为维持金本位而倾注最后努力的这一时期，除了面对政友会的反对，也是他同软弱的若槻以及坚持协力内阁论不让步的安达相对立的时期。不过，井上并非没有支持者。如后文所述，即使到了这一时期，他的财政政策仍得到以西园寺为首的政治中枢的支持。

至此，政友会明确下决心倒阁，或者联络陆军省、参谋本部的佐官级军官，或者深化同安达一派的合作，制造内阁内部的不一致，其运动愈演愈烈。

3 井上的抵抗

强势抛售，迎战美元买盘

面对这一危局，井上藏相以始终强硬的姿态应战。如前所述，他一面命令正金银行向美元买盘抛售美元，一面于10月5日把官方贴现率提高二厘，随后又在11月4日再次提高二厘。官方贴现率如此迅速地提高，造成了金融紧缩、市场利率上涨、有价证券市场暴跌等重大影响。井上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时期提高官方贴现率会使萧条更加严重；但为了对抗美元买盘，已经别无手段。

井上之所以下决心提高官方贴现率，是打算通过提高利率，抑制资金流向海外的高利率市场；同时通过收紧银根，使美元买盘手

头窘迫，迫使其进入协议平仓。此外，正金银行无限制地向美元买盘出售美元，也是根据井上的指示。正金银行若卖出巨额美元外汇，结算时就必须运送黄金，或者在海外买回美元。如果在结算前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美元价格便会上涨，正金银行自然会遭受巨大损失。之所以甘冒这种危险仍要出售美元，是因为井上下达了指令。因此，若槻内阁倒台时，井上为救济正金银行，制作了一份文件，说明“正金银行的统制售汇（奉大藏省之命统一对外售汇），是因执行国策之必要，由大藏大臣下令实行的；双方已有谅解，结算如有必要，准许运送正货”，并把它移交给了继任的高桥藏相。

总之，井上以严厉态度迎击美元买盘。仿佛要乘胜追击，10月10日，在政府同十五名实业界实力人士举行恳谈时，他发表演说，表明维持金本位的信念。随后，11月6日又召开第二次恳谈会，重申虽然发生了购买美元，但维持金本位仍是可能的。实业家们发表了如下“关于拥护金本位制的协议”。

“英格兰银行停止买卖黄金后，尽管我国的国际借贷关系顺利，但由于我国正货流出海外的金额极为庞大，仍有人对我国金本位制提出种种议论。然而，目前不仅不存在必须禁止黄金出口的理由，贸然实行还会因外汇行市下跌和剧烈动荡，使我国经济界的根基发生剧变。尤其鉴于目前满洲事变导致国际政局严重，我国国民此时必须认识拥护金本位制之必要，并为实现此一目的，官民一致协力。”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三井方面的团琢磨、池田成彬，三菱方面的木村久寿弥太、串田万藏、各务镰吉，住友方面的八代则彦、小仓正恒等财阀系代表，也网罗了大阪、名古屋等地的代表。第二次

会议的声明文，则由乡诚之助、池田成彬、八代则彦、稻畑胜太郎四人起草。

被称为购买美元祸首的池田参加了这次会议，甚至起草声明文，不免令人感到奇怪；但也可以认为，政府已经被迫做到这种地步，以夸示财界与政府意见一致。

政友会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决议

仅仅四天之后的 11 月 10 日，政友会决议应立即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井上立即发表维持金本位的声明，并给驻外财务官发去同样主旨的电报，指示他们向各国政府转达我国维持金本位的意向。11 月 24 日，井上又前往大阪，反复宣讲维持金本位。首先，他在日本银行分行面对他所信赖的十几名财界人士，表明了所持信念。

“维持金本位是我不可动摇的信念。对于购买美元这种非国民行径，我已经准备了一切对抗措施。提高利率是其中之一，横滨正金银行的无限制统制售汇也是其中之一。我有信心通过金融和经济压力消除购买美元。……”。

（《昭和大藏省外史》上卷）

接着，井上在近畿无尽大会发表演说；25 日，又在关西银行大会、大阪经济会以及经济更新会主办的藏相招待茶话会上演说，全都以激烈的语调宣讲维持金本位。井上当夜启程返回东京，次日早晨到兴津拜访西园寺公，似乎陈述了强硬主张。西园寺对原田熊雄这样说：

“到目前为止，我同井上大藏大臣已经见过很多次；但他常常事后推翻自己说过的话，暧昧之处很多。不过，唯独这一

次，他说得非常明确，很有条理。看来他下了极为坚定的决心，准备强行推进。”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

如前所见，井上对协力内阁运动表明了强烈的反对意志。关于这一点，时任内大臣秘书官长的木户幸一把他于11月17日同近卫文麿、原田熊雄、伊藤文吉三人一起与井上聚餐时的谈话记录如下。

“井上藏相对当前政局的意见是：近来提倡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或政民联合内阁，都不是足以掣肘并统制军部的强有力内阁，毋宁说是向军部献媚之物。思虑国家前途，绝不能赞同。若再任由军部无视国际关系推进其计划，国家必将濒临灭亡。现政府虽然力量微薄，总算正以各种手段控制军部活动。因此，虽极受军部恶评，也无可奈何。眼下无法想象能实现比这更强有力的内阁。不过，如果能够看到成立一个确可统制军部的强有力内阁，那正是此时尤其可喜之事，我并非不愿支持——以上是他大致吐露的意见。”（《木户幸一日记》上卷）井上的强硬众所周知，但这段谈话的最后一节相当微妙。他说，如果能压制军部，就支持这样的内阁；当然，这种内阁的出现事实上不可能，但同时，井上或许也终于不得不承认若槻内阁已经走投无路，才用这种表达吐露了真实想法。这样解读也并非不可。同一场合，井上还这样说：

“政友会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声明，实在岂有此理，太不像话。可以说，这就像一家银行准备开业，却事先广告说：我们这就开业，但一开业就立即停止支付。若要重新禁止，就应当在实行之前保持沉默，到时候果断一击，这才是正道。”（《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二卷）

这番话表面上是在批判政友会，但也给人一种感觉：井上心中关于重新禁止时应当如何行事的腹案，在无意中流露了出来。先前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时，还留下一段未必准确的说法：井上对若槻首相说，“如果我认为重新禁止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便不会受以往立场的束缚，而会率先举起旗帜；在那之前，我们就始终坚持维持金本位。”把这些情况合在一起看，就可以想见井上内心的苦恼有多么深。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与井上亲近的人们也不得不认识到，在我国维持金本位制已经困难到了何种地步。

深井英五的回忆

深井英五回忆说，英国脱离金本位，是“世界潮流的转变；因此，我国也应当在那之前断然改变方针，这才是明智之举。作为事后的判断，这一点没有争论余地”。我国国内保有的正货虽然减少，但仍然充裕；贸易已经改善，国际收支也保持均衡，因此不能断言维持金本位绝无可能。然而，为此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售美元，以回应美元买盘，同时加强金融紧缩。这会进一步激化萧条，所以已经超出单纯货币政策的范围，成为政治判断的问题。

“以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为重要政纲而上台的内阁，不能轻易抛弃这一政策，这一点也必须谅解。总之，由于政府坚持固守方针，横滨正金银行继续统制售汇。日本银行虽然采取金融紧缩方针，但这会使已经苦于萧条的财界更加萧条，因此政府的态度并不明朗。甚至存在这样的矛盾：一面提高利率，一面又试图通过提供产业资金来放松银根。当时向国外汇款的需求已经超出利率核算的范围，仅靠提高利率无法阻止。必须达到使资金筹措发生困难的程度才会有效；但政府担忧萧条，没能贯彻到那一步。想必另有原因，但也是因为人们没有充分体认，坚

持金本位制方针在货币政策上所应遵循的道理，以致向国外汇款的需求滔滔不断，统制售汇的远期合同不断累积。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单从货币政策出发，也不得不忧虑正货准备的前途而重新考虑。10月4日，井上先生希望在私邸闲谈，我借此机会，携带着当时为了纵览大势而编制的统计表，把它拿给井上先生看，促使他加以考虑。两人对坐约两个小时，闲谈和沉默占了更长时间，其间彼此含蓄地交换了意见。我不知道自己的意思究竟有没有传达给他。”（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

深井含蓄地说明了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必要性；但不能认为井上没有理解。然而，井上并不想下决心改变政策。时任大藏省国库课长的青木一男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青木奉特命赴满洲出差，反复思考了这一问题；回国后，他向井上报告满洲事变的前景，同时谈到这个问题，直言认为事已至此，应当重新研究。大臣或许会感到遗憾，但“这一切都是没有预料到的外部事件突然发生所致；即使改变政策，我认为也不是大臣或内阁的责任”。井上立刻说了一句：“连你也这样想吗？”此后便沉默不语。据说青木感觉自己仿佛听到了“布鲁图斯，连你也这样吗”，从此再没有提起此事。连深井、青木这样的人都在考虑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必要性，这对井上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可以认为，井上一面在政治上摆出强硬姿态，一面仍在苦苦思索究竟应当怎么办。

4 第二次若槻内阁的垮台

犬养内阁成立

若槻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总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始终坚持推进联合内阁论，而一度赞成此论的若

槻又听从井上、币原等人的意见，重新决定维持现内阁；安达于是回到私宅，不再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终于造成内阁内不统一。由于安达闭门不出，临时内阁会议开到深夜。先是内阁书记官长川崎，随后文相田中与藏相井上前往安达私宅，要求他递交辞呈，但安达没有答应。当时，首相无权罢免阁僚，而且内阁会议的决定必须全体一致；因此，只要有一人反抗首相，除总辞职外别无选择。

11日若槻内阁总辞职后，元老西园寺公于次日进京，奏请由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继任首相。犬养一接到组阁大命，便选定声望很高的原政友会总裁、原首相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已经引退的高桥，就这样再次出面应对这一难局。13日犬养内阁成立，当天便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民政党内阁的解禁政策未满两年便宣告终结。犬养内阁任命深受青年军官尊敬的荒木贞夫为陆军大臣，又任命同军方关系密切的森恪为书记官长。政局在这一天发生了根本变化。

犬养内阁的成立及其政策留待后述；这里先更详细地看一下若槻内阁终结的事实。按安达的说法，若槻一度企图成立协力内阁，却中途变节，这是导致这一事态的最大原因。他还说，中野正刚等人不守秘密，向各方面泄露计划；富田幸次郎甚至同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交换文书，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然而，即使若槻没有变节，这个计划也很难实现。如前所述，政友会未必赞成联合，民政党内部的大势也是反对；因此必须说，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很少有实现的可能。话虽如此，到了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若槻内阁已难以长久维持。它既无法压制军部，萧条又日益严重，若槻内阁的不受欢迎也尽人皆知。原田熊雄说，西园寺常说“若槻就不能照这样好好干下去吗”，他则回答：“如今人们只要听到若槻、币原的名字，心情就不会好。总之我认为，此时必须使气氛为之一变。”（《西园寺公

与政局》第二卷)因此,若槻内阁寿命不长,是可以预料的。只是此时必须考虑的,只有12月12日^①这个总辞职时机的问题。

政变背后暗中活动的投机势力的图谋

卖给购买美元一方的美元,都是年内交割的。政府认为紧缩的效果已经显现,宣布既有合同的协议平仓,只限于12月15日以前提出申请。这个决定于12月10日见诸报端。因此,美元买盘通过协议平仓向政府屈服的期限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如果美元买盘是出于投机而不断买进美元,那么只要不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不仅无法获利,还会把利息等全部赔进去。所以,美元买盘要想获利,无论如何都必须在15日以前促成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为此,又必须在那天之前使若槻内阁垮台。据说正因如此,美元买盘向安达和久原提供了巨额政治资金,以协力内阁运动为名,一举推翻了内阁。关于这一点,直到今天真相仍不清楚。只是内海丁三留下了一段片断记忆,说当时安达派的聚会场所,是一位同政界、财界关系很深的某大实业家的私邸。(《三井银行购买美元事件》《文艺春秋》临时增刊)

这种推测作为故事来说,确实十分巧妙。被称为购买美元祸首的是三井,而三井同反对党政友会的领袖个人关系很深,可以想见政治资金曾以某种形式流动。即使不直接交付现金,也可以让对方开票据或借据,把钱借出后不再催讨;也可以用真品的价格买下赝品古董。总之,认为美元买盘以某种形式向安达、久原一派输送资金,促使他们强行在年内倒阁,这种解释仍有成立的余地。当时,政

① 若槻内阁总辞职在1931年12月11日,本书前文亦作11日;此处原文作十二月十二日,系原书内部表述不一,照录。——编注

治评论家马场恒吾向 1932 年 1 月 4 日的《朝日新闻》投寄了一篇文章为《左右政局的人们》的文章。

“二三十年后的日本人，会怎样看待这次从若槻到犬养的政变呢？当一切杂音消失、脱离利害感情时，只会留下一个记忆：这次政变促成了重新禁止黄金出口，财阀由此赚了几千万日元。日本永久失去金本位制，恐怕也正是由此开始。

那是一场巨大的投机。他们预见日元行市下跌、美元行市上涨，卖出三亿多日元，买进美元。如果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使日元行市下跌两成，就能赚到六千万日元。如今已经跌了两成以上。

买进美元之后，要把利润拿到手，就必须促成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然而，民政党内阁坚决不肯实行。为了让政府重新禁止，就必须发动政变。政变果然发生了。作为政变结果而出现的政友会内阁，在就职当天便重新禁止黄金出口。那天，某财阀的董事甚至给自己大楼里的服务员、勤杂工都发了庆贺的小费。被卖出的是日元，被买进的是美元；被卖出的是内阁，被买进的是内阁。也就是说，被卖出的是日本，被买进的是美国。而平日最喜欢摆出忧国者面孔的，正是这伙人。”暂且不论马场的文章是否揭示真相，它确实表现了当时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西园寺并非不知道这种意见。原田熊雄说，西园寺反而认为财政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比以满洲事变为中心的外交问题更加重要。“不管人们如何批评若槻内阁的外交，原则上还是币原的做法更好。财政也因萧条而困难。即使国民中到处有人批评政府消极、没有起色，大体上说，井上的方针终究还是不错吧。”西园寺抱有这样的感觉。因此，若槻内阁总辞职时，他似

乎也曾考虑只接受安达的辞呈，把其余辞呈全部驳回，让若槻内阁继续存在。但据说他担心，如果采取这种手段，官僚、军部和政友会就会团结起来，不仅攻击政府，还会攻击宫中天皇身边的近臣，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原田熊雄辩解说，考虑到那样做会给官中招来恶评与恶感等后果，即使是财政政策和外交方针的变更，也不得不容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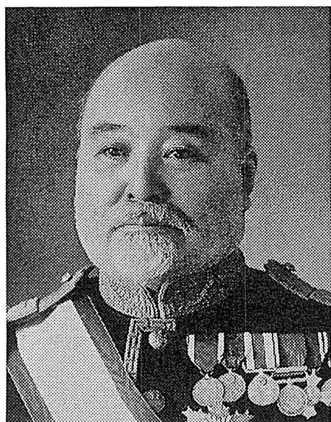
对于试图维持大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天皇制的西园寺来说，必须避免宫中受到伤害。说得更刻薄一些，他是宁可牺牲理想的政策，也要避免批评波及包括自己在内的天皇与宫中。笔者读到《原田日记》中的这一节时，总不免产生复杂的感慨。

5 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与井上之死

高桥出任藏相与深井的进言

12月12日，接到组阁大命的犬养退出宫中后，造访高桥是清宅邸，请他以藏相身份入阁。高桥也没有二话，当即接受。前一天，内阁下台一经确定，井上便托付关系亲近的《国民新闻》记者唐岛：“我有一件事拜托你。你到高桥是清先生那里去，同他谈各方面的问题，好吗？”唐岛直觉到内阁即将崩溃，继任者将是高桥，便去拜访了他。会谈后的印象是：这位老人什么都不知道。井上皱着眉头说：“这可难办了。”随后沉默片刻，又说：“英国有一句话：不要以国家为牺牲来赚钱。日本的财界若不格外注意，可就麻烦了。”（唐岛基智三《井上藏相的回忆》《昭和大藏省外史月报》）

井上卸任藏相时，眼前的急务是处理他命令正金银行进行的统制售汇善后事宜；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另一方面，高桥是清接待了日本银行副总裁深井英五的来访。深井的判断是：维持金本位已



高桥是清

高桥是清

不可能，我国也必须借这次政变之机脱离金本位；但与此同时，维持币值稳定仍是日本银行的使命。于是，深井同病中的土方久征总裁商议后，于12月12日下午到赤坂宅邸拜访高桥是清。深井把当时进言的内容概括如下。

“我先询问了政变的方向。高桥先生说，虽然尚未确定，但如果组阁大命降给犬养，自己应当会被推荐为大藏大臣。于是我先说明，既然如此，事情极为紧急，请他姑且当作假设听取，然后进言了以下两点。

一、过去政策的得失暂且置之不论；人心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已经绝无可能继续维持金本位制。因此，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宜尽快断然实行，组阁之后，即使是深夜，也应立即发布命令。

一、按照今天的形势，仅靠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恐怕难以收拾局面。因此，如果宪法上允许，应尽快以紧急敕令停止兑换。

我说明以上两点是土方总裁和我的共同意见，请求把它作为燃眉之急加以考虑。随后，我又另以个人的意见，提出以下两点供参考。

一、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后，为妥当地维持通货价值，防止人们对通货的信用发生动摇，货币政策必须更加慎重；原则上绝不能因为摆脱了金本位制的束缚，便忽视对通货发行的节制。

一、视外汇行市的走势，或许有必要以立法实行外汇管理。

我个人意见中的两点，并非需要立即提出方案、当即决断的事项；但伴随重新禁止黄金出口，我希望他尽早把它们作为问题放在心上。”（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

深井进言的要点是：维持金本位制已经不可能；如果稍有迟延，要求把纸币兑换成金币的申请便可能蜂拥而至，因此在停止黄金出口的同时，还必须放弃金本位制本身。高桥接受了这个进言，但对于意味着脱离金本位制的停止兑换，感情上似乎难以接受，主张设法采取别的办法，避免使用“停止兑换”这一表述。高桥曾在横滨正金银行任职，并参与甲午战争后金本位制的确立；对他而言，亲手停止金本位实在于心不忍。

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

总之，高桥听了深井的进言后确定了方针；次日13日，到亲任式结束时，他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高桥在记者团“问题的交叉火力”面前毫不畏缩，

“会重新禁止吗？”

“会。”

“那么，之后也会停止兑换吗？”

“会。”

他以这样的语气，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重大方针。“记者们只得扑向电话机，向总社大喊：‘号外！’”（今村武雄《评传高桥是清》）。当天夜里的内阁会议决定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制度上改为大藏大臣许可制，但实质上等同于禁止）；17日，又公布了停止兑换的敕令。脱离金本位制度，随着政友会内阁的成立一举实现。

井上准之助只能默默看着这一变化向前推进。井上辞职后不久，大阪的伊藤忠兵卫进京拜访了他。伊藤在井上任职纽约期间成为知己，又作为后辈得到井上提携，可说是井上的亲信之一，也是不久前在大阪日本银行听过他热烈宣讲维持金本位的人之一。然而，此时的井上没有平日的气概，说了这样一段反省的话：“解禁的成败如何，后世的历史自会评说。我们做的事究竟是好是坏，抑或政友会的做法才是正确的，我已经开始感到怀疑。”伊藤说，他听到井上亲口说出这番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昭和大藏省外史》上卷）。井上或许是承认自己的努力已化为泡影，多少有些感伤；或许是重新深切感受到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错位。这位被称为强硬之人、信念之人的井上所说的话，被隐藏了三十多年，直到1967年3月出版的前述书籍中才终于公开。然而，井上没有闲暇始终沉浸于感伤。安达离去后，井上成为民政党首席总务，也是众人一致认可的下一任总裁。他在公开场合仍然主张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激烈谴责政友会的政策。

高桥与井上的论战

转入攻击的井上，其发言中最有分量的，是1932年1月21日在贵族院同高桥藏相展开的论战。高桥说：滨口内阁以解禁为主要政纲，强调财政紧缩、整理国债、节约消费。我国经济界因此日益深陷萧条。制造东西便招致损失，卖出去又进一步招致损失，这样的物

价下跌是不健全的状态。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战后财政整理，专心恢复金本位。结果，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物资供给与国民购买力之间失去了平衡。物价异常下跌，产业衰退，失业者增加。大萧条就是这样发生的。我国却在这一过程中实了解禁。我们当时虽然反对，但既然已经断然实行，便没有争论余地，只能暂时静观。然而，萧条愈发激烈，正货外流，产业极度不振，社会思想上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财政也因岁入不足，不得不靠增税和公债来弥补。“前内阁的解禁政策以及此后的财政经济政策，全都事与愿违，我国国民经济极度困急，陷入了前途黯淡的状态。”

于是，现内阁断然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相信这是匡救时局的第一步；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无论当局喜欢与否，都已经处于很难继续维持金本位的形势。”高桥以上内容作为前提，进而论述：我国正货准备已经减少，美元外汇统制售汇的总额达到七亿五千四百万日元，其中两亿多日元尚未结算。因此，即使现在也不得不继续运送黄金。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后，此前被不正常地抬高的外汇行市下跌，物价在国内上涨、对外下跌，从而刺激产业，贸易也已好转，出现了打破萧条的曙光。对此，井上从议席上站起来，提出紧急质询。第一，高桥藏相说维持金本位已经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解禁后，正货确实外流了，但另一方面，以外币支付的证券也在增加。这与英国一下子流出四十亿日元外国资本的情况不同，日本根本不存在任何无法维持金本位的理由。第二，政府针对美元买盘的对策正在稳步奏效；如果按照原有政策继续推进，协议平仓完成后，也许就不必再运送黄金。然而，政府却在12月13日禁止黄金出口，反而因此产生了运送黄金的必要，不是吗？美元买盘也因此获利。这难道是正当的施政吗？第三，即使重新禁

止黄金出口，在世界萧条之下，出口也未必会增加。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不可能是恢复景气的特效药。

也就是说，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在政策上完全没有必要，政友会却把它付诸实行。

高桥站起来答辩。按今村武雄的说法，他的答辩“相当不把对方放在眼里”。高桥说：您似乎认为金本位是国民或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即使这一点正确，维持金本位靠的是国力，勉强实行解禁是错误的。欧洲新兴各国之所以采用金本位，是因为需要引进外国资本。日本和中国的贸易，日本是金本位，中国是银本位，却并未感到什么不便。

认为不是金本位国家就无法立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井上君自己在担任大藏大臣之前，不也反对立即实行解禁吗？有人说，本来只要完成协议平仓，就可以不必运送黄金；但不能说购买美元全都是投机，因此是否果真如此，当然还是个问题。如果那时不重新禁止，我国的正货还会进一步外流。如果维持金本位并收紧银根，农山渔村的人们就会遭受更大困扰。今天，各国都采取“把本国产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把贸易放在第二位”的国策。我国也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外汇行市应当根据一国的经济实力来决定——这就是高桥的答辩。

高桥的答辩大而化之，有时甚至包含超越逻辑的部分。然而，这一议论是高桥一贯的主张，也是他过去担任藏相时不实行解禁的理由。此时，对萧条感到厌倦的国民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高桥的主张。这场论战刚一结束，众议院便解散，选举战开始了。

井上遭暗杀与高桥的追忆

井上作为民政党首席总务，被任命为选举委员长。民政党把“重建金本位制”列为第一条口号。井上立即站到选举运动的最前列，不仅发表声援演说，还亲自撰写小册子《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与我国财界的前途》，详细说明他向高桥质询的内容，日夜奔走不息。

1932年2月9日晚八时左右，井上前往为民政党候选人驹井重次举行的演说会声援，在本乡追分的驹本小学后门下车时，一名男子从人群中冲出，用手枪对准井上，接连开了三枪。井上当场倒下，随即被送往东京大学医院的青山外科，但于当夜八时十五分去世。

暗杀井上的，是名叫小沼正的二十二岁青年。小沼是日莲宗行者井上日召的门生，也是血盟团的一员。血盟团以井上日召为盟主，高呼国家革新，计划以“一人一杀”的方式，打倒数名被视为误国的特权阶级代表人物的政界、财界巨头。这个集团随后又刺杀了三井的团琢磨；井上日召被捕后，又发展为一部分海军士官暗杀犬养首相的五一五事件。井上准之助就这样结束了六十四年的生涯。

井上去世后，高桥是清发表了悼词。其末尾一节如下：“现内阁成立、交接事务时，我见到井上君，他说：‘我实在担心这个难局究竟会怎样，有时甚至睡不着觉。’这是我间接听来的话：据说井上君担任大藏大臣时，曾对自己信任的官员说：‘如果我被杀了，就立即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看来井上君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听过井上君演说的人说他‘实在傲慢’，但在我面前从来没有那样。我本期待他今后积累各种经验，成长为出色的人物，实在令人惋惜。”（高桥是清《随想录》）

6 高桥财政的方向

积极财政使景气恢复

井上之死,使解禁政策彻底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高桥,在1932年夏天的临时议会上,一举下决心增加财政支出。在满洲事变的影响下,军费从1931年的八千七百万日元膨胀到二亿五千万日元;为救济构成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深层根源的农山渔村,预算也一下膨胀起来,从1931年的十四亿九千万日元一举增加到十九亿五千万日元。

这种膨胀全都必须靠发行公债来弥补。全部公债先由日本银行承购,再在金融市场宽裕时转售给民间,这就是日本银行承购发行。它把当时极度匮乏的资金输送到民间,确保政府所需的财源,并降低市场利率,堪称“一石三鸟的妙手”(深井英五)。凭借这一政策,沉滞的经济界开始逐渐恢复。当时,高桥同日本银行合作,极力降低利率,扩大通货发行量,抑制增税,专心致力于恢复景气。

另一方面,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以后,对美汇率持续下跌,到1932年底眼看要跌破每一百日元二十美元的关口。高桥此前没有采取任何外汇对策;但为了防止资本流向国外,他首次着手管理外汇,制定《防止资本外逃法》,对此加以规制。1933年又制定《外汇管理法》,以谋求外汇行市的稳定。大约一年内,外汇行市从每一百日元约五十美元下降到约二十美元,降幅达六成;随后在略低于三十美元的水平稳定下来。我国的出口由此迅速增加。

可以说,这些措施决定了“高桥财政”直到1936年高桥遭暗杀为止的方向。高桥提出的方针是:暂时扩大财政支出,放松银根,对外防止资本外逃,并把外汇行市稳定在低位。管理通货制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采取这些政策后,经济稳步恢复。出口的恢

复尤其显著，国内景气也随之好转；在各国都为萧条所苦时，日本景气已明显回升。

与此同时，国内金融趋于宽松，资金周转变得容易，大银行对产业的支配也逐渐减弱。军需等各类新需求出现，使重化工业的利润增加，新的设备投资接连展开。这一方向与井上财政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就是这位高桥，后来也因削减军费而招致军部怨恨，最终在二二六事件中追随井上而去。

军部势力抬头与政党地位下降

从政治上看，犬养在五一五事件中遇害后，政党的政治地位大幅下降，再也无法组阁。犬养内阁的外务大臣芳泽谦吉慨叹，满洲事变以后的政治，已经到了受日本最大政党——陆军——的意向左右的地步；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切政策都不能无视军部意向的局面。军部的要求接连累积：或者干预外交政策，阻止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以举国一致为名，要求实行包括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被告在内的大赦；或者以反对天皇机关说为名策划倒阁。军部展开了超出明治宪法框架的政治行动。五一五事件后的斋藤、冈田两届内阁，都试图抵抗这股激流。高桥作为两届内阁的支柱，同军部周旋，试图防止军费扩大；又由于他曾在原内阁时代主张废除参谋本部等缘故，招致军部反感，终于倒在凶刃之下。

关于继井上之后高桥的政策和行动，这里没有篇幅详述。以下仅在同井上政策的对比中，间接论述高桥财政的意义，以此结束本书。

尾声

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

此前我们循着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与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过程，一路看到高桥财政的起步；在这里，让我们重新思考它的意义。就此而言，仅仅在经济政策的框架内思考是不充分的，还必须把它放到政治过程中，进而作为井上个人的人格问题来思考。

首先思考其经济上的意义。若局限于经济层面来看，井上的悲剧在于：尽管古典经济理论正在与现实背离，他仍要强行推行教科书式的经济政策。那正是与井上最亲近的金融界、特别是大银行一致要求的东西，其依据是一种古典的信念：只要把经济界逼迫到痛苦不堪的境地，合理化就会得到推进。

然而，井上政策破产的首要原因，是他没有正确认识全世界的金本位制正面临穷途末路这一事实。

作为国际结算手段的国际金本位制，依靠其祖国英国的细致政策，直到第一次大战为止都得以安然无事地维持，如前所述。英国不在国内蓄积黄金及金汇兑，而是将其再投资于各国，以此维持国际金本位制，并借此采取增加本国投资收入的政策。然而这一体制因第一次大战而崩溃。大战后金本位制虽以金汇兑本位制的形式得以重建，但黄金及金汇兑偏集于美国、其次是法国，英国未能恢复往昔的地位。

英国已无力发挥自身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调节作用，各国都为国际收支的调整而苦恼。美国也未能理解，自己应当代替英国，承担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责任。整个二十年代，国际金本位制一直在钢丝上迈着危险的步子，来势凶猛的大萧条，就要剪断这根细绳了。特别是英国，一面竭力维系国际金本位制，一面在国内投资上落后于德、美，于是在十九世纪以后的经济停滞——也就是增长率放缓——之中，酿成了重大问题。所谓重大问题，指的就是长期性失业增加、设备投资疲软、生产率增长乏力、企业利润下降这一类。这样的经济停滞并不限于英国，全欧洲各国都是如此；至于美国，二十年代也决不是一个没有失业的时代。

这种停滞的事实意味着什么，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未能看穿。就连《自由放任的终结》的作者凯恩斯，其二十年代的议论与三十年代相比也不够彻底；而其他经济学家则试图这样解释失业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因工会的压力而僵化，作为劳动价格的工资变得难以变动，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变得难以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

生产的停滞与利润的减少，他们也认为可以用价格机制功能的不充分来解释。其结果，应当采取的政策建议，除了寄望于市场功能的恢复而什么也不做——硬要说的话，就是限制工会的工资谈判力——之外，很难再找到别的。即使在大萧条爆发之后，占上风的仍是这样一种思想：那不过是一时的回落，倒不如听任事态发展；而且发行公债会诱发通货膨胀，因此应当极力压缩财政。

在这样的一般条件之下，井上的财政政策宛如古典派经济学的模范答卷。当然，现实中他也曾投放救济资金、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公债，但从根本上看，井上实施的是一种模范答卷式的政策：笔记整理得井井有条，却几乎没有加入自己的意见。

不过，井上并非仅仅受经济理论引导而实施财政金融政策。在井上、池田等财界领袖人物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以国际金本位制为基础的英国及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信赖。正因如此，全然未曾预想的金本位制崩溃，成了导致失算的原因。以池田主持的三井银行为首的财阀系各银行，直到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为止，一直把巨额资金存放在英国，最终遭到冻结，也可以说是那种过度自信的表现。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的合著认为，井上的解禁政策是追随以英美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这一政策的表现，并评价说，对于作为二流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而言，那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政策。在上述意义上，这一评价尖锐地点破了解禁政策的一个侧面。（《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

与此相对，高桥是清并不那么看重金本位制的意义。毋宁说，对高桥而言，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或者说国民所得水平的维持与提高这样的目标受到强烈关注，他似乎坚定地认为，金融与财政应当为此协力。这种想法也表现在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后他对井上的答辩中；在这里，让我们从高桥 1929 年 10 月就解禁所发表的感想中概括出下面一节。

要讨论紧缩问题，必须分清国家经济与个人经济的区别。假如一个有能力过一年五万日元生活的人，节俭地以三万日元度日，剩下的两万日元存了起来，那么对他个人而言，储蓄增加是好事，但从国民经济来看，由于他的节俭，某处对物资的需求就减少了两万日元，国家的生产力也就相应下降。“因此从国家经济来看，有余力过五万日元生活的人，还是让他过相应的生活为好”。叫艺伎作陪、吃奢侈的饭菜，从国民经济来说，也会成为厨师的薪水，成为食品生产者、运输业者和商人的收

入，艺伎的收入也会作为食物、纳税、衣服、化妆品等的代价而支出，所以“那笔钱辗转流传，移到农、工、商、渔业者手中，又在各种产业上发挥二十倍、乃至三十倍的作用”。

若不再到待合茶屋游乐而改为储蓄，这样的经济活动就不会派生。同样，由于紧缩政策，议事堂、内务省、警察厅^①等建设工程全部中止；但如果停止进行中的工程，过于急遽而难免产生弊端，势将招来不景气与失业者。工程中止的结果是，承包业者及其雇员、材料生产者、经手材料的商人等相继失业，而且他们购买力的减少还将波及全部产业。（高桥《紧缩政策与解除黄金出口禁令》《随想录》）

这一节中可以看到令人想起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的波及效应构想。而高桥进入犬养内阁之后的政策，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这一思想。按照这种想法，将对外汇率维持在 100 日元兑 49 美元 84.5 美分的旧平价解禁，未必是必要之事。通过下调汇率来扩大出口、增大国内需求，反而被认为是可取的政策。这种看法自然通向如下批评：井上的解禁政策人为地把汇率设定得偏高，自招萧条的加剧。据说高桥就任藏相之后，曾邀请主张按新平价解禁、批评井上的石桥湛山、高桥龟吉等四位记者，慰劳他们的辛苦；可以说，高桥的本心正在于此。

对于井上财政，到了战后，更有下村治愈发严厉的批评。在成为所谓“下村理论”出发点的 1954 年《金融紧缩政策》一文中，他一面考察当时的 360 日元汇率，一面在与之对比的意义上，对井上财政提出批评。其大要如下。

① 原文如此。日本的警察厅设立于 1954 年；1929 年当时的中央警察机构为内务省警保局，东京的警察机关为警视厅。——编注

可以认为,1934年我国经济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大体达到了均衡;以此时点为基准计算1928年的购买力平价,则为100日元等于33.4美元。这一计算依据的是1934年的平均汇率每100日元29.51美元,以及1928年的物价与1934年相比日本高14%、美国高29%这一事实。另外,效率工资平价为每100日元16.22美元。井上决定按旧平价解禁时,市场汇率本已从46美元逐步下落,但“未能察觉在世界萧条的漩涡中可能达成均衡的汇率远低于此,必定是井上财政失败的最大理由。……这种实际形势的恶化虽为大萧条所强化,但井上的紧缩财政正是这样一种以如此缺乏现实性的汇率为前提的国际收支均衡政策”。(下村治《为实现经济增长》)

高桥对井上的批评,乃至下村的批评,在今天大概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然而,要期待井上具备那种先见,或许本来就是强人所难。高桥是清的财政政策,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他死后,都被批评为滥支财政、通货膨胀财政。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论说国家对经济政策的积极介入,主张在背负大量失业者的经济中,应当积极扩张财政支出、努力救济,甚至宁可牺牲国际均衡,也应优先国内均衡——那正是在高桥去世之年,1936年。

凯恩斯主张把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影响隔绝开来,无需期待汇率的稳定;然而他的这一构想,在当时也曾成为激烈论难的对象。

即使高桥是清先行实践了其思想的一部分,那也只是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当然并不确信应当长期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要求井上做到那一点,更是本来就办不到的事。

世界资本主义在大萧条中迎来历史性的转折,转向了管理通货体制。解禁政策若在十年前实施,想必会作为贤明之策博得赞誉;却因时机的错位而以失败告终,这只能说是悲剧。

经济政策与政治环境

再让我们在政治的维度上思考这一问题。解禁政策是加藤高明内阁（1924年）以来民政党（当时的宪政会）的主张。也因为怀有与高桥所属的政友会对抗的意识，民政党是正统派色彩极强的财政政策支持者。政党要大幅改变自己的政策，除非特殊情况，是很困难的。继田中内阁之后滨口内阁成立时，民政党内阁背负着必须实施解禁的竞选承诺。同时在外交上，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协调政策是其基调，并处于必须促成裁军条约的境地。民政党内阁的政策决定，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

以滨口首相为中心，井上、币原等人的这一内阁为完成其使命而奋力迈进。断然实施解禁，明知海军军令部乃至其背后整个军部的反感仍缔结伦敦裁军条约，又不惜与枢密院正面冲突而赢得了条约的批准。这一内阁背后确有元老西园寺与宫中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仍不能不说是强推硬干的政治手法。那种强硬，也表现在井上强行推行一度失败的官吏减薪上。然而这种强硬的政治态度，使滨口内阁（后为若槻内阁）树敌众多。政友会时而高呼统帅权问题与军部联手，时而联合枢密院，展开激烈的倒阁运动。政友会忘却了过去对藩阀与军阀的反感，与之携手图谋打倒对立政党，自掘了政党政治的坟墓。陆海军内部也逐渐兴起直接行动的风潮，它化作三月事件、满洲事变、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等接连不断的政治恐怖计划显现出来，终于连政治的安定本身也告崩溃。而且可以说，这一时期政党与军部的内部，中心领导力正在丧失。身为首相的若槻在阁内自身动摇，压制不住南陆相；在党内也无法制止安达派的活动。政友会方面，犬养总裁也只能坐视森恪、久原房之助等人彼此反目，又各自与军部联手、急剧右倾。陆军内部，以宇

垣陆相为首的当时首脑层在与三月事件有了某种关联之后，不仅再也无力抑制青年将校的阴谋，甚至反而表现出火上浇油的动向。海军方面，伦敦条约缔结之后，首脑层分裂为赞成条约的所谓条约派与反对的舰队派两派，逐步以派阀人事排挤条约派；青年将校中也出现了与井上日召联手、图谋直接行动的人。萧条导致农村与中小企业的疲敝、工人阶级的失业，带来了以其为温床的工人运动激化与无产政党的兴起，但另一方面也成为右翼抬头的温床。各种政治主体各自丧失了领导力，而且统一政党与军部的机制也已丧失。山县有朋等元老死后，无论制度上还是个人层面，都已不存在能统一政党、军部、官僚并发挥领导力的人。已经无力阻止各方各行其是。唯一幸存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缺乏那样的力量，也不是那种肯亲自站到台前谋求统一的人。西园寺力图通过支持民政党内阁来维持其理想中的英国式君主制议会政治，但他的力量是微弱的。井上试图实行解禁，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

井上的政策加剧了萧条，因此政治反对势力愈发强大。在这种状况下，经济政策就不再仅仅是经济政策，而转化为赌上内阁与政党命运的焦点议题。就经济理论而言，经济政策本应随外部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即使不改变政策的根本，也应调节其力度。然而，一旦转化为政治议题，经济政策就已随之僵化，即便采取随机应变的政策在理论上是可取的，在政治上却意味着失败，从而陷入这样的矛盾。

井上所处的正是这样的环境。反对越强，就越必须固执其政策，这就是政治的逻辑；井上在政策上已被逼到骑虎难下的境地。就连像三井的池田成彬这样支持井上政策的人，看到英国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后也改变了想法，井上甚至斥财阀为国贼。政治局势时刻变幻，满洲事变违背政治的意愿而扩大，军部缺乏与政治的协调，恐怖阴

谋频发，内阁的基础大为动摇。井上必定判断：此时若采取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政策，就是政党的败北，将招致内阁的垮台。解禁政策在政治上不得不维持到最后一刻。

政治家与政策的个性

最后，想谈谈井上个人的性格。据说井上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有时甚至被称为傲慢不逊，是个不肯向人低头的人；即使在处理大藏省事务时，也有独断的一面：召来主管课长亲自裁断，把次官、局长撇在一边。这是一般对井上的批评，但池田成彬等人指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池田这样说道：

“井上离开银行、进入民政党开始搞政治之后，我总觉得他的性格完全变了。在银行做事的时候，他反而小心翼翼，从我们看来该说是消极、软弱。不过从一开始就是才子，头脑相当敏锐。只是总嫌消极，让人觉得差点意思。所以我多次说过：‘你总差点意思，做法是不是有问题’之类的话。但他是那样爽快一个人，三井银行去借钱，他立刻就说‘好’一口应承。……那股干脆劲儿非常好。只是因为他消极，同伴之间常说，井上还得再强硬一些才行。可他一旦进入政界，搞选举之类，从各种人那里拿了钱，就成了那种做派。相当勉强地把一切事情都强行推进。尤其在针对购买美元的政策上是勉力为之的。所以银行界的朋友之间，至今也弄不明白，井上进入政界后性格怎么会变成那样。但若勉强找条道理的话：他原本是个消极的人，可一旦被逼到那个地步，就自然而然不得不如此。比如针对购买美元的政策，恐怕也是出于自卫才那样的吧；而且到头来他在民政党里保住了相当的地位，那种强硬的做法，也是不得已才变成那样的吧。——不过从性格来说，我不认为他是那样的人。

他是非常明敏的人，却是个软弱的人；突然之间不知为何变得像个出奇强硬的人，我想那终究是被逼到那个处境才变成那样的。”（池田成彬《故人今人》）

笔者总觉得这段长引文切中了井上的本质。

总辞职之后，他说“我们做的事情是好是坏，还是政友会的做法才对，我自己也开始怀疑了”；西园寺公望会见辞职前夕的井上时说：“与井上大藏大臣迄今已多次见面，但他常常事后推翻自己说过的话，暧昧之处很多。然而唯独这次，说了极为清楚、条理分明的话。”这些似乎都在印证池田的这段批评。西园寺明知如此，仍将写有“临危守节心无改／忍死捐生志不移”的题字方笺赠给井上遗族。这样看来，井上的解禁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但这一失败实在是由众多因素复合造成的失败。经济政策实施之时，有时会产生当初未曾预料的涟漪，越过实施它的当事人，继续走自己的路。井上准之助的解禁政策，正是如此。

〔附论〕历史视野中的平成萧条

平成萧条的尽头还看不见。起初人们并不认为这会是一场多么严重的萧条，而一次又一次的紧急对策也未能奏效，想必自有其相应的理由。依笔者之见，平成萧条有两个特色：一是所谓“泡沫”的后遗症，二是主导产业的停滞。因此，且回顾近代日本的景气循环，考察几个事例，与本次萧条作个对比。这或许也能成为思考今后景气动向的他山之石。

1 两次泡沫崩溃型萧条

作为泡沫崩溃型萧条而令人想起的，有两个例子。第一是 1920 年萧条，第二是 1973—1974 年石油危机后的萧条。首先，就从回顾前者开始吧。

1918 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大战景气随即急转直下。然而到了翌年 1919 年春，由于欧洲的复兴，出口增长，景气的前景转趋明朗，终于演变成狂热的繁荣。

一般物价和股价暴涨的同时，增资与设立新公司的热潮也兴了起来，各种商品的期货交易投机也愈发激烈。如表 1 所示，自同年春起的股价与物价上涨十分显著，显示出这场繁荣的异常。这场繁荣之所以崩溃，是因为缴纳股款和投机所需的资金需求增加，金融陷入了异常的紧张。股票市场出现抛盘、发生暴跌，以此为契机，各种商品的行情也一齐急跌，危机骤然全面展开，是在 1920 年 3 月。

此后约半年间，各种行情跌至峰值时的一半左右，与1919年春的平静期相比也下跌了三成上下。大战景气彻底远去了。

此时的危机进展迅速，且如表1所示，一般商品价格也出现剧烈跌落，在这一点上与本次萧条不同；但催生出了巨大的泡沫，这一点是共通的。个人也好企业也好，都背负着所持资产（库存品、有价证券、不动产等）的贬值损失，为坏账债权的处理所困。

1920年以后的景气，由于1919—1920年实际工资高涨等原因，消费需求坚挺，1921年甚至显示出反弹的势头。然而各种物价只是在危机后的水平上上下下波动，个人和企业背负着账面亏损，像阴郁的梅雨天气一样沉闷的景气持续了下去。

1973—1974年石油危机后的萧条，是抑制通胀而采取严厉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的结果。从1972年下半年起，对各种商品和不动产的囤积收购开始了，股价也一路猛涨，从1972年1月日经平均的2802日元涨至1973年1月5256日元的高点。日经商品行情指数也从1972年7月的91（1970年平均=100），到1973年12月升至171，1975年1月回落至144。同业拆借利率在1974年到1975年之间连续十九个月超过10%，最高达13.5%。

表1 1920年危机前后的价格变动

	纤维品价 格指数	农产品价 格指数	金属价格 指数	批发价格 指数	股价指数
大战后的 谷底	244 (19年 2月)	314 (19年 3月)	190 (19年 3月)	131 (19年 3月)	170 (19年 2月)
大战后的 峰值	444 (20年 3月)	489 (20年 3月)	276 (20年 3月)	208 (20年 3月)	245 (20年 1月)
危机后的 谷底	234 (20年 10月)	223 (20年 12月)	136 (21年 2月)	123 (21年 4月)	110 (20年 6月)

纤维品价格指数·农产品价格指数·金属价格指数：1900年10月=100

批发价格指数：1934—36年平均=100

股价指数：1924年1月=100

（资料）藤野正三郎·五十岚副夫《景气指数：1888—1940 年》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统计文献中心

1971 年日元升值后异常的金融宽松，首先带来了股价和不动产的上涨，不久又急剧波及各种商品。1973 年春开始的紧缩政策尚未显现效果，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战略就在 10 月发动，给通胀火上浇油，迫使当局采取强力紧缩。历时两年的紧缩的结果是，“狂乱物价”平静了下来，但与此同时高速增长也告终结，企业和个人资产也贬值了。

此时的萧条通常不被称为泡沫型，大概是因为石油冲击的印象实在太大了。其后的萧条伴随着泡沫崩溃带来的所持资产贬值、债权坏账，账面亏损的处理耗时长久，这与 1920 年萧条是相同的。

试将这两者与平成萧条作个对比。八十年代后半期那场繁荣的特色，首先是：由于急剧的日元升值，以石油为首的进口原材料降价，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物价却多少有些走低。作为日元升值对策的金融宽松虽长期持续，但由于进口品价格下跌，物价保持平稳。

其例外是股价和不动产价格。在这种特殊的资产通胀之下，投机也集中在股票和土地上进行，但重视一般物价的金融当局下决心紧缩的时机却迟了。

除了上述泡沫崩溃型萧条之外，这类萧条也并非没有出现过。1951 年朝鲜战争停战后的回落、1961—1962 年设备投资繁荣（岩户景气）后的萧条，更早还有日俄战争后的 1908 年萧条等，至少部分地具有泡沫型萧条的性质。

2 昭和危机

昭和危机的谷底在 1931—1932 年，它与大萧条的前半期相重叠。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代，从世界范围看正处于第一次大战后重建金本位制的时期，物价趋于下行。尤其是农产品，因世界性的生产过剩，自二十年代后半期起价格持续下跌，萧条一直持续。世界的金融是靠美国对德国的投资支撑的。用这笔资金，德国向英法支付赔款，英法再向美国支付战时公债的本息，这样的循环得以成立。1928 年，美国股价高涨，资金开始撤离，欧洲的金融顿时紧张起来。

日本的二十年代，也并非世界潮流的例外。物价、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屡屡发生的金融动荡，以及接连不断的银行破产，支配着这一时期。不过，在这一时期，虽然并不显眼，水力发电事业迅速兴起，随之出现了中小企业引进电动机、电气化学工业和电气冶金工业的发展、机械工业和电气机械工业的技术进步等，重工业化不断进展，为下一次飞跃做好了准备，这也是事实。由此，日本实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

在恢复金本位（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一事上，日本已经落后；而下定这一决心，是在 1929 年 7 月滨口民政党内阁成立、延揽井上准之助出任藏相之时。井上藏相为防备按旧平价解禁后国际竞争的激化，削减财政支出、提高利率、呼吁国民节约消费，实行了强力紧缩政策。因此，日本经济自 1929 年秋起遭遇急剧的景气后退。始于美国的不景气的波及，就紧接在那之后。昭和危机，是由为恢复金本位而采取的紧缩政策与海外的大萧条这双重原因带来的。

若用一句话概括这场危机的特色，可以说它是一场与平成萧条全然不同的价格危机。表 2 概括了农产品、工业制品以及股价的动向，可以看到，到 1929 年 12 月为止的半年间，各种物价下跌了 15%

左右。这可以看作国内紧缩政策的结果吧。1930、1931 年的进一步跌落，主要可以看作大萧条、特别是美国危机的反映。生丝行情的暴跌是其代表性事例，此外，新闻纸、硫酸等外国产品的倾销压低了国内物价的事例也数不胜数。

表 2 昭和危机期的物价（昭和 4 年 6 月 = 100）

	米（深 川中 米）	生丝 （横滨 现货）	棉纱 （20 支 赤富士）	棉织物 （粗布 龙 C）	钢材 （圆五 分）	木材 （秋田 杉四分 板）	股票价 格指数	对美汇 率（每 100 日 元合美 元）
昭和 4 年 12 月	94.5	89.0	74.1	84.7	87.6	81.0	86.5	48.971
昭和 5 年 6 月	92.4	64.7	46.6	53.4	78.5	76.2	71.2	49.375
12 月	60.4	47.7	54.2	60.1	60.2	71.4	68.3	49.375
昭和 6 年 6 月	61.8	40.4	58.2	54.0	62.4	76.2	70.7	49.375
12 月	64.0	43.0	59.0	54.0	64.5	72.4	66.1	49.375
昭和 7 年 6 月	74.0	35.7	50.2	55.8	61.3	45.2	67.2	30.351
12 月	77.7	70.2	83.3	85.9	110.8	95.2	100.3	20.648

商品行情与汇率：东洋经济新报《物价 20 年》（1938 年 1 月）

股票价格指数：藤野正三郎·五十岚副夫《景气指数》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统计文献中心（1973 年 3 月）

就这样，随着萧条日益严重，从滨口首相遇刺事件开始，政局与社会情势的不安加深，1931 年 9 月，满洲事变爆发，英国脱离了金本位。预料日本将重新禁止黄金出口，购买美元的投机活动愈演愈烈。井上藏相提高利率以对抗美元买盘，但到 12 月，民政党内阁倒台，政友会的犬养内阁成立。新任的高桥是清藏相断然决定重新

禁止黄金出口，放任汇率下跌，降低利率，试图以增加财政支出来恢复景气。所谓“高桥财政”就此拉开帷幕。

3 平成萧条

平成萧条常被称为“泡沫萧条”或“存量萧条”。其远因在于1986—1987年应对日元升值萧条的对策。金融宽松不断推进，官方贴利率降至史上最低的2.5%之后，景气恢复，设备投资的热潮兴了起来。然而，也是出于对1987年9月世界性股市暴跌的顾虑，金融宽松持续了下去。由于日元升值和石油价格下跌，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大幅下降，出口物价也随之下调，国内批发物价趋于下跌，消费者物价持平，日本银行也因此放松了警惕。虽说有对1987年9月世界性股价暴跌等的顾虑，但银根宽松的状况长期延续，酿成了股票和不动产价格的异常高涨。这就是所谓“泡沫”的发生。

其背景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膨胀。 $M_2 + CD$ （现金通货、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以及可转让存单的合计）的同比增长率，自1987年4月升至10%之后，到1990年10月为止，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持续保持高水平。这一增长率以实际增长率加上2~3%为基准，因此若实际增长率为4%左右，则最高也以7%左右为宜。在平成改元前后的时期，超出基准增长率3%以上，一度甚至超出6%。

进口物价因日元升值而走低，与此同时出口物价和面向国内的物价也偏于疲软，在这种趋势之中，可能发生投机性变动的只有股价和不动产价格，想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问题在于金融当局没有把这一事实看得那么严重。说到物价稳定，人们总会意识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股价和不动产价格则被轻视。确实，在通常的通胀时期，资产价格也与一般物价同步上涨。1972—1973年第一

次石油危机的情况就是其典型事例。日元升值繁荣期资产价格的高涨，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现象。

即便如此，看看1985—1989年间全国银行贷款增加部分的构成比：金融保险业15%、不动产业18%、服务业21%，合计达54%。对这些领域的异常贷款增加，无疑是所谓泡沫的一个原因。制造业的设备投资资金等多利用股权融资筹措，不求助于银行，因此国内外富余资金的相当大一部分流入了股票和不动产。

金融紧缩始于1989年，起步太晚这一点难以否认。因此，资产价格涨过了头，不久，不动产金融的总量管制也从1990年3月一直实施到年末。紧缩解除之后，一时之间萧条感并不那么强。开始意识到其严重性，是1991年下半年以后。萧条并非一下子显露出来，而是一点一点地袭来的。

表3 法人企业的资产保有额（单位：万亿日元）

资产	年	全产业	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	不动产业
股票	'90年6月	26.4	7.38	5.42	6.45
股票	'93年6月	21.6	8.21	5.53	2.92
土地	'90年6月	81.3	20.1	17.6	19.0
土地	'93年6月	121.4	27.3	26.0	25.6

据《法人企业统计季报》

其理由之一，笔者以为在于：泡沫崩溃后，家庭和企业的、尤其是企业的资产状况，随着地价和股价的持续下跌，恶化得比表面上看到的严重得多，而其处理需要相当的时间。例如，如表3所示，法人企业持有的股票和土地的账面价值，从1990年6月到1993年6月的三年间都在增加。例外只有不动产业持有的股票。已贬值的股票和土地的处理，是今后的课题。在企业采取积极行动之前，恐怕需要先处理这样的账面亏损吧。金融机构也背负着这类不良资产，而且还应认为它们持有相当多难以收回的贷款。金融机构放贷消极，原

因之一可以认为是这类问题残留在其内部。随着资产价格下跌、持续低迷，痛苦正逐渐加剧。现在的萧条若属这种性质，那么恢复费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4 新的主导产业问题

确实，本次萧条的特色在于：它作为资产通胀的结果而产生，因此紧缩的启动也迟了；当初人们不认为有多严重，但恢复不见起色，其严重性才逐渐被意识到。除去这一点，无论“1920年萧条”还是“1973—1974年萧条”，在后遗症长久残留这一点上都与本次相同。恢复的契机，前者是消费需求的扩大，后者是出口的增加。

然而，在本次萧条中，这两者暂时都难以指望有大的增长。这一点稍后再谈，先考虑另一个问题——主导产业的停滞。

战前以来的经济增长，一直为各个时代主导增长的产业所支撑。战后也是如此：五十年代有复兴的纺织产业，以及电力、造船、钢铁、石油化学产业等的发展；六十年代又加上了机械工业，特别是电气机械和汽车产业；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汽车和电子工业的增长引人注目。它们首先从满足内需起步，成长为出口产业。

然而，主导产业并不能永远保住其地位。钢铁业和石油化学产业依靠廉价而丰富的海外原料发展壮大，但石油危机以后丧失了这种优势而陷入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原材料依存度低、高附加值型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在经济增长之中，主导产业不断更替，兴起、发展、停滞的过程反复重演——已故赤松要教授将其命名为“雁行形态论”，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观点。

作为本次萧条的特色，除泡沫后遗症的存在之外，笔者还想关注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的增长趋于平缓这一点。由于萧条，加上繁

荣期购车过度带来的回落，汽车产业正经历连续两年的减产；电子设备也走向减产，正在失去过去的势头。

支撑了过去二十多年增长的这些产业，也可以说迎来了不可避免的成熟时期吧。当然，景气恢复的话生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必须看到，像截至八十年代那样作为主导产业的增长，已难以指望。

要预测九十年代的增长，当然必须考虑新的主导产业出现的可能性。遗憾的是，眼下还看不到能立即取代汽车和电子产业的大型新兴产业。

不过，回顾历史，如日俄战争后一九〇〇年代后半期到一九一〇年代前半期的情形，或1920年危机之后的二十年代那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许多小型新产业出现，它们的发展汇合起来，使增长得以持续。既有大型产业增长力的放缓，由以信息产业和服务业为首的小型产业，或者以廉价消费品的开发与进口为武器的零售业等来补足——这难道不正是九十年代景气恢复过程的图景吗？

与此同时，作为另一个因素，人们期待日元升值的正面效果显现出来。1993年年中开始的日元升值，对使用进口原材料的产业具有相当大的降低成本效果。不过，其效果要显现出来，至少还需要半年左右吧。1985—1987年的日元升值使面向内需的产业收益增加，到带来景气好转，花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这一事实记忆犹新。

另外，“昭和危机”的情形，既没有泡沫，也看不到主导产业增长转弱的迹象。作为新主导产业的重化工业，正等待登场的机会，持续积蓄力量。

回顾过去、思考现状，萧条的走向绝不容乐观。暂且以紧急对策防止进一步的跌落，同时等待小型成长产业的出现和消费的恢

复，以及公共投资的效果与日元升值正面效果的显现——这是笔者的判断。

〈附记〉

本附论是将以下两篇小文合并而成的一篇文章。

《读历史看摆脱萧条·小型产业补足增长》（日本经济新闻，1993年10月26日）

《昭和危机与平成萧条》（学士会会报，1994年 I）

本书以《经济政策的命运》（日本经济新闻社，1967年刊）为底本。

版本说明

中村隆英 (Nakamura Takafusa, 1925—2013), 生于东京,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 历任东京大学教授、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教授。著有《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与循环》《战前期日本经济增长的分析》《金融政策》《日本经济——其增长与结构》《明治大正期的经济》《昭和和经济史》等多种。1993 年以《昭和史 I、II》获大佛次郎奖。

本书原题《经济政策的命运》(経済政策の運命),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67 年刊行; 后经作者增补附论并改题《昭和危机与经济政策》(昭和恐慌と経済政策), 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 (1994 年 6 月 10 日第 1 刷)。本译底本为该文库版 2020 年 7 月 7 日第 18 刷。

全书纪年已统一换算为公元纪年 (换算基准见学术文库版序首注); 书中脚注均系编者所加, 注末署“——编注”。

[编辑: 西方負典編譯組]



中村隆英
昭和恐慌と経済政策